

多列士著
朱世綸譯

多列士自傳

傳記叢書之三
新知書店印行

多列士自傳

著 士 列 多
譯 綸 世 朱

新 知 書 局

傳記叢書

斯大林傳

巴比塞著
徐懋庸譯

尼赫魯自傳

尼赫魯著
畢來魯譯

拜倫傳

鶴見祐輔著
陳秋子譯

多列士自傳

多列士著
朱世倫譯

列寧傳

蘇·馬恩列學院編

新知書店印行



士 列 多

目次

第一章	覺醒	一
第二章	學習	三一
第三章	走向團結	五九
第四章	人民戰線的勝利與罷工	八五
第五章	忠誠於綱領	一一一
第六章	處在希特勒危險前的法國	一二一
第七章	共產黨人所要的是什麼	一三九
第八章	誰出賣了法國	一五七
第九章	維琪的一羣	一六七
第十章	人民的苦難與反抗鬥爭的開始	一七三
第十一章	法國人民的英雄戰鬥	一九三
附錄	人民的考驗	二〇九
譯後誌		二一九

第一章 醒 覺

我的父親和祖父都是礦工。對於兒童時期的一切，能想得到的也就是那些艱苦的工人生活：痛苦是很多很多，值得歡欣的是極少極少。平時所看到聽到的乃是黯淡的工人宿舍，石塊砌成的走道，和被幾百公尺長的地道走得疲勞了的礦工們彳亍的步伐，有時聽到手提琴的演奏，賽跑遊戲，和逢會時呼嚕呼嚕的音樂。在這樣單調無趣的地面上，最強烈最尖銳的刺激着我的，是那些染着黑色或是青色斑點的車布的行列，它延長着放在廠棚裏的那些白木棺材的遠景。我看到無數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子在廣場上來回的奔跑着，碰撞着，擁擠着。憲兵們守着廠門，衝散那些哭嚷着擁來的人羣……以後我的記憶系統了些，清楚了些，景物和色彩也就顯得更明顯清楚了。我是差不多同這個世紀同時生的，——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生的——那時我只有六歲呢……

……一天，我也同往常一樣，正在同鄰居的孩子們在玩耍，突然聽到一聲震耳的轟炸聲響，繼之而來的是遠處嘈雜的釘鞋踏着碎石的聲響，這引起了我們的驚訝。大家都急忙的向着同一方面奔跑！我也同他們一道跑去。覺得這種跑着跳着是很好玩的，一時趕上了氣喘着的老人，又趕過了抱着嬰兒的女人。人們在叫：

——這是在谷里埃！是美里谷礦阱！有一千三百人死了！

這是在一九〇六年三月十日，那天，我用盡小小腿腳的力量，在冰冷的濃霧裏跑了七公里，從諾埃勒·歌多的工人宿舍，順着到朗斯的大路，跑到美里谷。在附近村莊裏的礦工都停下了他們的工作，婦女和小孩子們互相碰撞着，互相詢問着，圍攏着，混雜着，激動着，像一羣處在死亡陰影籠罩下的潰軍。

到了美里谷，開頭我沒有看見什麼。人潮停止在高插着鐵柵的長磚牆的前面。在鐵柵後面一些黑色的人們在那裏忙亂着，他們把頭套在一種奇怪的面具裏面。遠處，在霧色朦朧中，露出礦阱上的鋼骨架子，機輪已是靜止着不再轉動了。飄動着的潮濕的煤氣、燒焦氣味、火烟氣味，更加重了這種情景的悲慘。很快就盪起了一陣哭號，咒罵，女人們披頭散髮的狂叫着，激盪着。大家叫着要衝進鐵柵。憲兵騎在馬上向人羣衝來。但是密集的人羣却寸步也不肯讓。四面八方盪起着尖銳的叫聲：

——告訴我們真實情形！……告訴我們出了什麼事情呀！……讓我們親自看看！……讓我們進去！……

——我的丈夫在阱裏啦……

——我的孩子們在阱裏啦……

——我的一家人都在阱裏啦……

我記得以後我同別的孩子們弄得筋疲力盡回到村裏，我們經過了很久的時期，沒有玩耍沒有吵鬧……

再後幾天，我又到美里谷去。在那裏，有很多的憲兵，人們都戴上了黑紗。許多人家的門前都有人在哭泣着，孩子們緊緊的靠在母親身邊。在附近村莊上，在沙洛密內，在比里·蒙底尼，都是一樣的情景。到處都把車棚變成了停棺材的地方。人們帶着驚嘆的口氣在談着從外斯特法里來的救護隊。

再以後就是在雪中舉行的悲慘的大出喪，不幸的犧牲者們的安葬禮。

這個可怕的災禍震動了整個法國。在很久以前，這一羣黑色的人民（礦工）就怨訴着他們的工資不夠生活，工作太苦，安全條件不足。他們憤怒地責備着廠方。而這一千三百人的阱下慘死，又增強了這種憤怒。在死者安葬以後不久，貪心的廠方調派其他工人接替死者的工作，去作新犧牲品。失望和騷動從這座工房流到那座工房，這些殘存的工人們一致拒絕；罷工於是爆發了。

形成了一支真正的佔領軍似的佔領着礦區。

在路上，在村莊裏，這些罷工的工人組成隊伍，凝結在一起，列成長長的隊伍。這不像三月十日那樣瘋狂似的紛亂了；有些人們面帶悲愁的喊出他的憤懣，有的以低沉的聲音談着那些最近

長眠在墳地裏的死者。

有一次的示威遊行，紅色的旗子高舉在前面，在埃南——里埃達的路上，遇到了憲兵。這一天我母親進城，帶着我同我的妹妹和弟弟。我們參加在游行隊伍裏前進着。突然，隊伍前面猛然停下，發出喊叫聲，口哨聲，人羣中起了猛烈的騷動，狂奔起來。這是憲兵們襲擊了過來。當我看見巨大的馬的身影從我頭上跳過的時候，我昏眩地跌倒了，母子們也被衝散了。

我爬起之後跑到一個人家門後面躲着，看見一個巨人舉着他的指揮刀，放縱他的坐騎衝進一隊逃走的人羣裏去，把他們衝倒，像短木棍似的在地下滾着。有的罷工工人拖住了馬的韁繩，其他的人們躲進了院子裏面。在遠處，士兵們刺刀上在槍上，帶着他們藍紅色的帶子，他們也像我祖父的那張關於佛密屠殺照片上的情形一樣。（佛密是法國北部一個地方，一八九一年五月一日，罷工工人向市政府請願，廠主指使軍隊向示威者開槍，打死了十個工人。）……

整天，憲兵在我們的村裏巡邏着，傲慢地從窗外張望人家的房裏。我母親終究找到了我，她把窗簾拉上。我們都在房裏，在黑暗裏，聽着指揮刀碰在別的東西上發出響聲……有些示威者被捕了，有些受了傷。

罷工支持了近兩個月——整整的五十二天。這是極苦痛極貧困的兩個月，是悲愁與憤怒交織的兩個月。這就是礦工的命運：平時作着疲勞的夜間的地下工作，遭到殘廢、壓死和毒氣毒死。

等到極度苦痛的時候，他們喊出他們的不幸來，可是武裝來了，來壓着他們就範！

在罷工的時期中，我的祖父克萊蒙·博德里會盡了他所有的一切力量。他是一個工會老會員，在巴斯里（Bastin）開始創辦工會時他就加入了。我很歡喜聽他的敘述。他向我敘述他的生平和他所經過的鬥爭。他的一生，差不多完全埋沒在黑暗的礦井裏，但是却比在日光下所過的一生還要更輝煌些。在他一生中最光輝的一點就是他對於工會和工人階級的深愛。那些罷工、戰鬥和奮鬥，那些反抗工頭、廠方、憲兵和軍隊的頑強鬥爭，都還鮮明的留在我的心頭，在這些使人興奮的記憶中，巴斯里和蓋斯德（Guesde）的名子，像一面閃耀着的光輝的旗幟。聽了這些敘述，使我很早的成熟了起來。

祖父強烈的反對「假兄弟」（工賊）和「青年」總工會，他擁護巴斯里和拉芒丹（Lamendin）的「老」工會。這兩個工會對立的很厲害，時常打架，並且在法國北部，舊的幫口的對立是牢不可破的，時常互相殺害。我不明瞭爲了什麼礦工如此的互相攻擊，但是我深深佩服他們的勇敢剛強，那種毫不吝嗇的爲工人理想而服務的英勇精神。祖父和他的同志們不感疲倦的從這個阱到那個阱，從這座工房到那座工房不停地去徵募會員；他們要爭取每個人，他們企圖克服有些礦工的不正確觀念，拔去他們的漠不關心，奴隸性和愚昧無知。他們遭遇到有些工人的頑抗，遭遇到有些工人的畏懼胆怯，遭遇到礦主的憤恨和威嚇，也遭遇到工人間的分化不和——在朗斯和谷里埃

兩地「普魯蘇份子」(Brouchoux的總工會會員)的影響是很大的。我的祖父在一九三一年因積勞成疾而去世了，他死時是七十一歲，一直是工會的會員，他在我的心裏刻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引導我走了第一步，他教會我從事於鬥爭，我要在這裏向他致敬，向一個樸素、勇敢、完美、忠實的戰士的活的化身致敬！

他是帶着無保留的情感，熱烈的信念，無限的忠誠，爲了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供獻出他的一切。在他微薄的工資裏，雖然這點工資還要養活十個孩子，但是他毫不吝惜的首先拿出應繳的工會費和捐款；其次每週拿出二個「蘇」(錢名)買他愛看的報紙「北方的晨鐘」。

在他年老的時期中，他經常讀着共產黨的「團結」報。

我們所住的房子，同其他工房一樣，它那單調的形式和一線的排列，更增加了這北部平原上的單調和憂鬱氣氛，那些泥土和木板造的房子，那些污穢的東西，以及工廠烟囪吐出的黃色和黑色的煤烟，使得景象是那樣的悽愴。諾埃勒·歌多在大戰前是一個住着三千人口的村鎮；住的是礦工、鑄工和「納稅者」，就是說，一些種地的莊稼漢。

杜熱的第四號礦阱在戰前有一千多礦工。鉛和鋅的冶鍊廠是建築在上德勒運河岸上，它是屬於馬爾非達諾和旁納瓦亞礦場的。礦砂用運貨船從水道運到冶鍊廠裏去。

我的祖父在礦阱上工作，我的父親是在廠裏工作，就在那裏他得下了鉛毒症。他本想逃避那

礦辦的毒瓦斯而在廠裏工作，可是終於還是中了毒。

四歲的時候，我上了小學。第二年，在我的生命中遇到了一件大事：第一次我在無產階級人羣的面前說話，這裏應當說明一下，這是在學校紀念日孩子們演的戲劇裏面說的。

在家裏，我也同其他工人家庭裏的孩子一樣的過着尋常的生活。從懂事的時候起就作起事來，礦工的孩子們懂事是懂得很早的。用我父親的工資，和一個小菜園，二十幾隻兔子的收入，我母親維持着一個小家庭的生活。大人給我的任務是很容易作的：到田裏拔喂兔子的青草，到路上拾糞上園子，以及照應我的幾個小弟弟。

在我們貧苦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快樂的閃光：節日、逢會。啊！逢會，我們事先長期的等着它的到來，等到第一聲行商的車子一響，我們就坐不住了。一出校門，我們就急忙的跑去看人家騎木馬和那些木板造的小商店。用手指頭大胆的去觸木馬的鼻子，拉它的尾巴，尾巴是真的馬尾毛作成的哩！有一個「蘇」就可以騎在木馬上跑一次！我們聽到音樂，打靶子的槍聲，壓彩店的輪盤轉動聲，咖啡店裏醉酒人的快樂的歌聲，村子裏野孩子們的喧嘩聲。我們瘋狂似的過一天兩天的生活。以後又恢復先前的灰色的生活……

在我家裏也同在別的工人家裏一樣，大人們差不多每天在談着日常困難。物價不停的在漲着。在一九一〇年九月裏，礦區爆發了一個反對漲價的運動。

這個運動很快的傳到了我們的村裏。家庭主婦們從這家到那家的跑着，想組織這個鬥爭。我的母親就是其中最積極的一個；在一次的會議上，她被選爲我們鎮上的代表。

示威的人在鎮裏各街道游行着，前面打着紅旗，人們喊着：

「牛奶四十「蘇」！」

「牛奶四個「蘇」！」

「雞蛋廿六「蘇」！」

（雞蛋一項是指十三個蛋的價錢。也就是一百個雞蛋的八分之一，或半個四分之一。那時是這樣賣的。）

人們從這個商店跑到那個商店，要求他們實行這個價錢。

有一天是逢市，幾個村鎮的主婦們決定到埃南·里埃達城去。在他們到後不久，賣主同主婦們爭吵起來了。有一個陳列商品的案子被推翻了——這是信號，於是到處蘿蔔、馬鈴薯、水果飛上了天。我們小孩子們於是雙腳跳進雞蛋筐裏；在這快樂的破壞時候，凡是什麼好的東西被我們看見，碰在我們手裏，就被像拋炸彈一樣的亂丟。

我們當時不懂得物價高漲真正的負責人乃是大資本家、投機者，他們這種人又一次成功的把消費者的憤怒，轉向到那些可憐的小商人身上發洩去了。

在反對物價高漲的示威過程中，在比里·蒙底尼，警察打死了一個名叫第厄當奈的工人。爲了帶孝和表示抗議，所有的婦女都戴上紅色和黑色的帶子。

我到了工人兒童開始作工賺點錢幫助家庭的年齡了。

村裏的農人僱這些孩子們幫他們鋤草。我們拿着一個小鋤頭，一道的去鋤，眼睛町在地上，兩公尺兩公尺的去鋤除那些白朮和野草。在農人的監視下，我從太陽出一直到太陽落，作的筋疲力盡的走回來。一天得到的報酬是十四到十五個「蘇」（十二小時）的工資。在這時我會第一次同僱主發生了衝突。

——多岩斯小鬼，你比別人都小些。我不能夠給你一樣多的工資。給你十個「蘇」吧……

除了學校的課程之外還有教理問答的學習，我的父母雖然不信上帝，但是大家的慣俗都是這樣，小孩子們要受洗禮和舉行初次領聖餐禮的。本堂教士選我作合唱隊的隊員，我在這裏也可以得到幾個「蘇」的報酬。

一九一二年七月開始我生活上的新時代。我領到了畢業證書，不必等到十三歲就可以到礦上去工作了。我在學校學習的成績（第一名）使得我可以提早一歲到礦場去工作。我於是被僱用在第四號礦井上作檢石子的工作。

工作並不複雜，但是要很當心才成，鐵篩篩過的煤到了面前，就得很快的檢去上面的石子。

這是按件付薪的工作。一個好手一天可以賺到二十五到三十個「蘇」。

十二月四日，這是礦工們每年要慶祝的節日——聖·巴伯節。在十一月下半月，爲了多賺幾個錢，礦工們每天要多作半個工。在十五天長時間的工作中，他們可以從九十、一百個佛郎增加到一百八十、二百個佛郎，我當然也同別人一樣的增加了工作時間；在這十五天裏面，我每天要作到十二、三個鐘點，工資從十七個佛郎增到三十個佛郎。

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當聖·巴伯節前加工的十五天一到，罷工爆發了。人們把這個罷工叫做反對「長途賽跑」（指長時間工作）罷工。巴斯里的老工會同總工會混合起來了。這個被共同領導着的罷工只罷了幾天，地下工人工作八小時的法律於是被尊重了。

消遣的機會是很少的，許多青年工人加入了市的音樂隊，我學吹的是小喇叭。我們戴着漂亮的鴨舌頭帽，列隊在路上走着，吹着最悅耳的調子。差不多每個星期日，我們都要到鄰近的城鎮去演奏。後來有一次快樂的出遊機會，是到海邊去演奏，可是事先要一些準備，於是一星期有幾次的演習。

有一次演習完畢之後，隊長向我們報告沙拉孚的刺殺案（奧國太子斐迪南被刺），這是在一九一四年六月的一個晚上。

有些人感覺到戰爭的危險，但是大部份人都不相信因這會爆發戰爭。

——戰爭？你想像的！在我們這樣的時代，這是不可能的。用現在的武器來打仗，只要打兩個月大家都要被打得乾乾淨淨……

八月一日星期六，教堂打起了總動員的鐘來。一羣一羣的人站在到處所貼的白紙佈告前面。我的叔叔萊翁第一天就出發了。從此我就再也見不到他了，聽說他是一九一五年死在布塞若的。我的另一個叔叔愛德蒙在開戰後第三個星期中就受了傷，這是在冒昂熱的戰場上，後來被俘了去。他被俘後送到西里西亞鐵礦裏去工作，因在被俘的期中得了肺結核，不久也就死了。還有一個叔叔，是祖父的第十個兒子，遠在一九〇八年就得急病死在宛杉地方的聯隊裏。

動員之後，礦上還是開工，但是礦工的數目很快地在減少着。不久也就停了工，因為接到命令要把礦阱裏的馬運上去作軍用。

憂慮統治着村鎮，消息都是壞的。正開始時我們想戰爭離我們還遠呢，還在東部的幾百公里之外，在阿爾薩斯，在羅蘭呢。到德軍侵入比利時，才引起了大家的驚慌和憤怒。比國的列日和納繆的堡壘大家都認為是不可攻克的，可是被德軍佔領了。有一天早晨，大家聽見砲聲，軍隊在路上開始巡邏。這是八月二十六日的事。在那時當地還沒有連續的防線；只是杜埃的後備軍防守着這個地方。第三天德軍開向朗斯。

一九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當德軍洶湧難擋的時候，我同祖父離開了諾埃勒。凡是十八歲到四

十八歲的男子和健全的人全體撤退。我跟着祖父就此離開家鄉。我母親留在家裏，她在我臨走時給了我她全部的財產，一共四塊一百「蘇」的錢幣，（共值二十個佛郎），因為她覺得再見面的機會是太少了。以後，在四年之後我才重見家人。在這四年多的時期中，我沒有得到過她們一點消息，她們也是一樣的，毫不知道我的下落。我們住的那個鄉鎮，就是處在德軍戰線的緊後邊，到戰爭結束時，它已經差不多全被毀壞了。

我同祖父離開諾埃勒之後，在北部省的路上流浪了一個月的光景，被軍隊的浪潮沖來蕩去。我們流蕩在巴德加萊省，北部省和阿芒蒂埃、聖鮑勒、貝丟納等地，好像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它把我們縛住在這個我們出生、成長、和工作的故鄉，雖然戰爭幾次的把我們驅逐，但是這神祕的力量幾次地把我們拖回，拖回這我們不願離去的故鄉。

不幸好像還不够深似的，憲兵們還追逐着我們，壓迫着我們，不使我們走向那被血染的、毀壞的、凌亂的戰地，雖然這都是我們的國土。在夜裏，我們睡在穀倉裏。我們吃的是從地裏拔出的馬鈴薯。在路上碰見英國士兵，他們就分給我們一點他們的罐頭牛肉。在奧賽勒地方，一個社會黨的礦工把我們留在他家裏住了幾天。

我認識了戰爭——這並不是那些埃比納書店（Epinal）的名畫，不是第一帝國的衛兵，不是埃區蘇芬（Reichshofen）戰役中的騎兵（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時的），不是戴魯賴德（Deroulede）法

國沙文主義詩歌家)的軍歌——而是可怖的戰爭，是吞食人民的惡魔，是恐怖以及死亡的播種者！

戰爭，就是家破人亡，就是無家可歸，流浪在街頭，無衣無食無錢無工作的生活，就是普魯士的機槍掃射和憲兵的壓迫；戰爭，就是可憐的士兵們的被殺，睡在戰壕裏和路上，就是一些倒斃的馬屍，荒蕪的田園，冷落無人的村舍，洞開的房屋，滿載傷病者的救護車；戰爭，尤其是，在火光照得發紫色的天際裏映出的人的行列，在這個人的洪流裏，人們用手車推着女人，孩子和老人，帶着無數的包袱，裏面裝着一些可憐兒的雜七雜八的東西，或是在車子上匆忙地堆上一些可憐的家具，破褥子同鳥籠放在一起。一些瘦弱的馬拖着當地式的沒有把手的長車子，上面堆着櫃子桌子和鍋碗之類的廚房用具等等……。女人們，有的用裙子包捆着小孩子在哭，有的糊裏糊塗的嘴裏在骨碌着同樣的話語，有些老年人粗野的嘴裏在磨着陳舊的麵包屑子。我發誓要用我一切的力量來反對這種恐怖的災禍——戰爭，反對那些準備戰爭者和那些以戰爭爲生的人們，我要用盡一切力量，去保衛人民，他們永久是戰爭的犧牲者！

我們走到納萊密納和維黑干地境時，一天夜裏突然被機槍聲音驚起。我們已經處在戰爭中間地帶了。我叫起睡在枯葉堆成的洞裏的祖父，在戰火穿照着的黑暗中逃走了。

母親給我的那四個一百「蘇」的錢幣，已經用去兩個，還有兩個是縫在我身上穿的背心裏面

的；一天，我發覺沒有了，背心被撕破了，我於是丟掉了我全部的財產。

最後，我們又被憲兵捉住，他也不要我們一切的請求，把我們帶到奧賽勒的市政府去，以後又把我們和其他在路上捉來的不幸者們，一同裝上運貨汽車，開到聖鮑勒去。在聖鮑勒，我們又被裝進火車的貨車廂裏——八匹馬同四十個人擠在一起——火車於是搖擺地慢慢地向法國中部開去。一個月來，我始終沒有離開祖父一步，我們兩個一同向着茫茫中前進。一些經過的火車都裝滿着士兵。雖然離開了前線，可是戰爭還是呈現在我的眼前。這種可怕的戰爭影像，經過了幾年都不會消失。

一個長期的旅行——五個整天——之後，我們的車子在克厄茲省的省會蓋埃停下。後來，在十一月二日死人節那天，我們的車子開上支道上去，在經過的每一個車站上，把「難民」留一部份下來。我同祖父被留在熱諾意拉的車站，同陣的有七十多人，還是分配給克呂納的。

在鎮上，給我們住的房子很壞——四個人住一小間。居民對我們倒很同情：這些貧苦人民的關心和幫助，使我們減少了許多流亡中的苦難。

這個地方的風景是很美的，是個樹林蔭翳和山巒起伏的地區。美麗悅目的崗嶺充滿了禽鳥和泉水的歌聲，這同那些被戰爭破壞和多霧的憂鬱的北方平原，完全成爲相反的對照。

冬天來了，多雨而又寒冷，並不益於長途的旅行者。村鎮上有個學校。我去找教員，請他允

許我進學校讀書。我那時離開學校已經有兩年了。教員是一個善良的人，名叫賽勒文，他接受了我的請求。於是我又開始了我的學業。

賽勒文先生很關心我。他積極的培養我，並且鼓勵我參加一九一五年三月的懸賞考試，在這次考試中，我的作文得了頭獎。作文的題目是「對戰爭的感觸」。我只要寫出我的回憶就得了，因為這是我所親眼看到的，並不是報紙上用文字描寫和觀念化的戰爭，而是在恐怖的战斗中所看到的戰爭。

賽勒文對我的成績非常高興，他要把我送到蓋埃城去繼續求學，他堅認為我將來有成為教員或者教授的才具。但是我拒絕了。我雖是歡喜求學，但是我確信戰爭很快就要結束，我將回到諾埃勒·歌多去找我的親人去了，但我願作工和賺幾個錢。

祖父是在一個農家作工。附近的一個種田人要我到他家去做一個「打雜」。在夏季，我一個月拿到十八個佛郎的工資，在冬季是八個佛郎一月，外加伙食。就在這時我開始認識了農民。我是認識工人了，認識他們可憐的命運，認識他們對任務認真的精神，以及他們的豪爽和勇敢。我認識父不就是眼前的一個鐵證嗎？當我和農民一同生活的時候，我認識了他們堅持的品德，他們的刻苦耐勞，他們的堅韌剛毅，他們的正直公平。農民是工人的兄弟，他們和工人是一對不幸的

樣受壓迫受剝削，一樣的在戰爭的大屠殺中作犧牲品。

戰爭給了克呂納這個小鎮一個很大的打擊：在一九一一年有兩千居民，到一九二一年時，只剩了一千三百個了。健壯的男子都上了前線，剩下的只是些婦女、老頭和少年人們：但是他們還是一樣的盡心竭力的工作以保證生產。

我早上很早的起來，服侍牲口，打掃牲口的柵圈，把母牛牽上草地吃草。

當割草的季節來了，還要學割，學磨刀；收穫時期來了，小麥蕎麥都要用鐮刀割了檢了細了起來；以後，陰雨季節中在打濕了的泥土裏拔馬鈴薯和糖蘿蔔，作秋季的耕種工作，播種和幫着鋤麥子。跟着來的是作雜事的季節。當初寒凍麻了指頭的時候，要去砍伐木柴、拔菜，到了冬季將盡的時候，又要剪荆棘的樊籬，修橡樹的枝材，掃地上的落葉，疏流水的溝渠。遇到雨雪的日子，則蹲在倉棚裏修理農具、車子、鋤頭、犁耙、鐮刀等等。在晚上，在這漫長的冬夜裏，大家剝栗子。牛奶煮栗子這是每天的晚餐。

我現在認識了本村和附近隣村的每個人。這裏除了幾家富農外，他們都過着窮苦的生活。他們從來吃不到肉。我在工作的這家小地主是住在否熱村裏，離克呂納鎮只有一里半路。晚上我就回到克呂納祖父那裏；可是不久以後我就獨住在否熱村裏，在狹小的倉房裏放下一張小床睡着。

在冬季的長夜裏，經過一些書籍和一些討論，開始了我對政治的教養。

克厄茲省是一個很進步的省份！在一九一四年，它在社會黨的選票中佔第二十六位，（居民

與票數之比是千比一·六，——在佔首位的北部省，居民與票數的比例是千比六·五——在這裏非但社會主義思想很普遍，同時這裏的戰士們也都很積極勇敢，在運動中總是起着先鋒的作用。造成這種特別情形的部份原因是因爲當地居民太窮，他們因爲沒有足夠維持生活的土地，於是每年要有一部份時間到巴黎去謀生，去作泥水匠、磚匠、石匠，作了一個時期之後，回到家鄉來耕種他們那小塊土地和織布。在留居巴黎的時期中，這些泥水匠和磚石匠們的政治認識提高了，他們加入工會，閱讀工人報刊，參加會議，受着工人政黨的影響。回到家鄉之後還是經常的收到巴黎報紙，繼續着他們的政治和工會的生活。

我的僱主是閱讀「人道報」的——這個報紙那時是厄諾代爾（Renudel）在主持。梅納齊伯，一個養了十個孩子的老泥水匠，他是傾向革命的。他是個極端主義者，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目的，要求迅速訂立不併吞不賠款的和平。他同我談到新美瓦爾德，談到齊昂達爾〔註〕，這是兩個在瑞士山中的小村鎮，在一九一五和一九一六年，衝破戰場上強烈的烟火，第一次在這裏發出了一小隊社會主義英雄的聲音，他們忠實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忠實於革命。

〔註〕新美瓦爾德（Zimmervald）是瑞士的一個小村鎮，靠近伯爾尼。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到八日舉行了一個社會黨人的國際會議，其中有列寧參加。這會議指出了社會黨的領導者們爲帝國主義服務的行動，號召各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戰爭。第二次會議是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九日在齊昂

達爾（Morbath）瑞士的一個小城市）開的。

我們的討論，和社會主義者的再度團結的初步努力對於我的影響，以及我個人的往事回憶，都引導着我一天一天更堅強的走向反戰。我經常的讀着少數派的報紙「中部人民」。

在我們目前發生的情景，使我的政治教育更爲容易。我們住在離前綫幾百公里的地方，可是戰爭在我們的身邊表現着，它在各地天天增加着戴孝的人和苦痛，它剷削着民族的精英。我的祖父已經死去了一個兒子，還要每個星期日寄一包食物給另一個被俘的兒子。他認爲戰勝德國是必要的；至於我，我反對一切延長這種屠殺的人們。

我一方面注意政治的教育，同時以各種文學書來增強我一般的教育。我讀着一切落在手邊的書籍。

——垃圾堆上發現一片字紙，他都要馬上跑去拾來讀一讀，祖父這樣說我。我讀了徐勒·外納的作品，大仲馬的作品，雨果的「悲慘世界」和「海上勞動者們」，歐琴·勒·吳瓦的「賤民查哥」，徐勒·瓦萊的「反叛者」。這些書都是教師賽勒艾先生借給我看的。

「兩千里海底航程」這本書（徐勒·外納作品）最感動我。我對於奈蒙艦長冒險事件並不太感興趣，但對他的性格倒感到更高的興奮。他表現出偉大的科學天才，戰勝了一切，——當科學不再被資本主義所奴役的時候，它可以轉變世界和轉變人類。我自己說，最好能有這樣一個奈

蒙艦長，一個打抱不平的英雄，掃蕩一切戰艦，強迫鬥爭員們放下武器！

以後，我又讀到了「蒙特·克里斯托的故事」。這本書使我最感興趣的是金錢在社會上的魔力。當黛這個人，因為他發現了寶藏之故，於是成了一個超人，罪惡受到了處罰。我同時歡喜讓，瓦爾讓的善良，一個悲慘命運的犧牲者。尤其是在「悲慘世界」一書裏，有一個加弗羅斯，這個非凡的加弗羅斯，衝過磚石的防禦工事去打擊軍隊，關於他的歌曲，響亮在革命的上空裏。

在「海上的勞動者」一書裏，關於海洋的描寫以及在幾里阿特的鬥爭，使我充滿了興奮。經過雨果所寫的書篇，海上狂暴的吼聲直達到我的面前……

幾年過去了。祖父在遺遠離故鄉的偏僻鄉村裏，深深的為孤寂所苦惱着。若是說他希望公開的慘酷的報仇，希望澈底粉碎德帝國主義，槍決「老兵威廉二世」(Gullame II)（如同有些記者經常說的），他同時希望着儘快的結束戰事，可使他早回故鄉找尋親人。在他無法再忍耐下去的情形之下，他決定離開克厄茲省向北部省走近。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我們在布沙克乘上火車回巴黎進發。

這是在戰爭激烈的時候，我第一次看見巴黎。德國軍隊離京城只有七十公里，「圖伯」飛機時時的來丟炸彈，氣氛是悲愁和緊張。我們到北部省難民招待總部，住在一間醜陋的得利亞式小

板屋裏。當天晚上我們就又動身到阿密安去。

我們是已被德厄意·萊·阿密安地方一個鋸木廠的老板僱用了，我祖父的一個兄弟在那裏作工，他也是北部省的逃難者。

在火車上我們同幾個假滿回前線的士兵和幾個同去一地工作的木工一道。這個旅行是很悲愁的。士兵們已經是厭倦了戰爭。大部份都受了傷，他們希望再一次受傷，以便走出這個地獄。

在德厄意·萊·阿密安，廠主布律奈先生派我們作駕駛運木船的工作。在索姆河上，從高比到阿伯維勒。

我們很快的就學會了掌舵，丟船纜給岸上趕馬的人（馬是拖船的），使用長的包鐵的篙，以及很快的把船纜收捲在木軸上。我們睡在極小的船艙裏，吃東西都在船板上吃。雖然不是小說上的奈蒙艦長，也不是幾里阿特，可是我至少部份的實現了埃克托·馬洛小說「流浪者」的夢想：在一個「泛家浮宅」上游覽着法國各地，認識它各種不同的面貌。

索姆河上比加底的肥沃土地，和克厄茲省的多石山地，是多麼不同啊！在河的兩岸，尤其是其在阿密安的周圍，鋪滿了「菜田」，寬大的水溝，圍繞着小島，溝裏裝滿着水，居民在水上划着長而扁平的船，船上裝滿着各種菜蔬，以及成捆的麻和苧麻。田地是肥沃而多產的，似乎在這塊肥沃的地上，居民們都應當是富足的了。可是我很快就打破了這種誤解。我認清了此地居民也是

同其他地方的一樣窮困。

沿河兩岸，除了棋盤一般的菜田之外，還有許多大工廠：布廠、棉廠、麻廠、絲絨廠等等。可是廠主們豐足的財富是建築在對老百姓的殘酷剝削上的。索姆河流域，（埃里·皮克尼·木蘭布勒·隆浦萊·蓬萊密·阿伯維勒以及更北部的佛里克賽活·聖吳安昂·布瓦勒）的勞苦人民，都是被那無情的損傷身體的以及悶在工廠裏的工作，把他們弄得疲憊不堪。一天工資最多超過不了四十到五十個「蘇」。在這種窮乏的情形之下，北部省的礦工、工人以及克厄茲的農民生活雖然很苦，反而使我感到羨慕。

父親、母親以及到了工作年齡的小孩子，都到紡織廠裏工作着。星期天他們煮一大鍋肉湯，吃一個星期，因為婦女也進工廠，沒有時間下廚房。在人口麋居的市區裏和村鎮裏，到處是些瘦弱，佝僂，憔悴的孩子們在擾攘着。不正常的孩子的數量是很驚人的。因為窮乏，一部分勞動人民用酒精作他們忘憂消愁的藥劑。

一九一八年八月間，我到兵役署去檢查身體，和我同去受檢的有德厄意地方十五個青年，有十三個人及格。但是在剝削工人最兇的埃里秀·索姆，二十五個人受檢，雖然醫官的檢查並非嚴格，但只有五人合格。

漸漸的，在我的心裏，社會問題同戰爭問題聯繫了起來。它們的因果一樣，犧牲者也是同樣

的人們。

十月革命在俄國打倒了沙皇和資本家的統治。解放了的俄國人民向世界宣佈和平。

我對俄國革命的熱烈同情心使我要求參加戰鬥行動。我狂熱的要知道俄國情形，於是找各種報紙、雜誌和小冊子看，可惜的很，總找不到我所要知道的東西：這是因為政府、資產階級和報紙，都在盡力製造謠言和以誣蔑來反對這個新生的制度。

可是雖然謠言和誣蔑橫流，但在工人羣裏得不到他們所預期的效果。工人們，就是文化水準最低的工人們，都混統的覺得，在俄國所建築的，就是他們的共和國，覺得俄國共產黨人們以偉大的鬥爭以及生命所進行的事業，就是他們的事業，就是全世界工人們的事業。並且，在雙方敵對的戰壕裏，在被蹂躪和焚燒了的城市裏，在被砲轟搶掠弄得一片荒涼，只有一些劫後餘生的區域裏，到處喊出馬克斯的偉大號召，這個號召就是被俄國革命重新喊了出來的：

「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

我每次在船到碼頭的時候，就上岸去找社會主義戰士，去同他們取得聯繫。在阿密安有一羣無政府主義者，影響是相當大，可是他們一點也不了解俄國革命。

在我們的船上，我和祖父可以免除廠主的日常監督和麻煩，我們只在船上很少次數的見到他。祖父是個老礦工，是個賦有法國工人的品質：愛好自己所作的業務，歡喜和高興自己的勞

動。他愛自己的工作並且願意把它作得很好。他廉潔高尚，對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很負責，但是他不允許人家挑揚他所作的事物，尤其是他自認爲作得很對的事物。他非常易於激動，總是對不正的事情抗爭，常常突然的暴怒起來；他能毫不皺眉忍受着飢寒，但是我看見他在路上爲了看見一個受凍的孩子而感動得流淚。他是一個工會會員，堅強的爲着他們的要求而鬥爭，認識他的責任，帶着工人本有的不怕斥責的正義感說：「我要有在廠主面前說真理的權利」。

一天，在裝貨的時候，廠主不停地虐待力夫；在我父親的身邊轉來轉去，而照工作原則上說來，我祖父乃是船上唯一的負責人。整個下午，這個老人忍耐着，他長長的白鬍子被氣得發顫；到後來，他終於忍耐不住了，他要把廠主丟在河裏。從那天以後，再也不見廠主上船了。

一九一八年三月，當德軍大舉向索姆省進攻的時候，軍事當局的命令到了。像我這樣年齡的一批青年，都要馬上集合成到哥朗德維里埃去。這對於祖父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我是他最後的唯一的希望，他的忠實伴侶，他的一切親人都被這戰爭的風暴所捲去了。他看見我走，竟哭起來了。

我步行到烏瓦茲省的哥朗德維里埃埃城，離阿密安城有三十多公里。在一個月之內，我們作着挖戰壕的工作。當他們再沒有什麼事給我們作的時候，把我們辭退了。

德軍就在阿密安的附近；砲彈天天向着用沙袋保護着的教堂打。我還記得，我當時對這種摧殘文化的行爲抱着極大的憤怒和憂慮。我並非過去的拜物教者，但我始終愛好着石器。我特式鑿

術的細緻花紋，使我異常驚慕的認為是與現代的不可比擬。以後不久我才了解只有在一個大時代——社會主義時代——才能創造偉大的文化，並且才能產生出一些新的傑作來，如同中古時代的教堂，表現出當時彫刻藝術上的宗教信念。

我剛到十九歲，已經換了三種職業，礦工、僱農和船夫。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起，我又開始作麵包店的學徒。工作條件是很苦的，烘麵包的房子很狹，又充滿了蟑螂蟲。我要作的是扛一袋一袋的麵粉，幫忙麵包店的工人工作，搬運木柴和麵包以及每天澆刷的工作。

終究有一天停戰的日子到了。人們開始吐了一口氣，又重新作人了。

我知道我的家人在德軍敗退的時候，逃到比國朗格聖去了。我不能忍耐的想去重見和擁抱那被長期戰爭所分隔開的他們。

從阿密安到杜奈，差不多有一百二十公里。我同幾個青年結伴步行了一大半的路程，走過被戰爭毀壞了的區域。

我們所經過的地方，佈告上的地名有如神頭上光圈一樣地空洞無物了。這些地方都已成了廢墟，都是一模一樣的廢墟；過去生活的不同，現在已經被同一的毀滅與死亡所消滅了。粗大的白楊樹橫隊在大路上，丘陵翻了身，凹地佈滿了爛污泥，坎坑裏的黑水面上露着鏽得發綠的廢鐵，雜亂的鐵絲網羅，鉛粉質的峻崖成爲急流的缺口，地下佈滿着迷宮似的戰壕，被鐵絲網、壕溝、

障礙物等等以及難以越過的土谷……多麼可怖的景象！這裏該是村鎮吧，人們在猜想，因為它已成了紅色的灰燼，凌亂的磚瓦，被砲彈粉碎了的石塊，乃是過去走道的標誌，我們將無法辨別方向，若是沒有這一塊那一塊豎着的牌子，牌子上歪歪扭扭寫着地名：比里克爾奈，里埃宛……每一把泥土都是被血和淚所浸潤過的。我們踏着骨骼，這就是過去的軍隊。有些名字好像幽靈一樣的顯在我們的面前：洛埃特聖母教堂，蘇賽，阿拉伯的尖角碧……我們終究到了朗斯。這是一大堆被毀壞了的房子，地下室成了露天的水池。

一天晚上，我們到了在諾埃勒·歌多我們的老家。這個我度過童年的村鎮，也已受到強烈的摧殘。我們住的房子雖然還存在着，可是旁邊叔父們住的房子被一顆炸彈炸毀……啤酒店和工廠都被毀滅了。我會經作過工的第四號礦井已成廢墟，成了一個磚石、鋼骨、車輪、廢鐵等的垃圾堆。在德軍開走以前，用炸藥炸毀了礦場的防禦設備以至礦井淹沒了。

我們在一間霖雨的小房子裏過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悽愴的離開這裏到比國去。到處都是廢墟，一樣的情景。以後到了比國邊境的俄希城，過了杜奈，過了阿特之後，最後到了朗格聖……在那裏可以找到我的親人。我再也感覺不到經過無路區域行走的疲倦。一步一步走近父母的歡喜，給了我新的氣力。四個年頭的分離，苦痛的憂慮，一切的變遷和一切的危難，都被立刻忘却了。我踢出了惡夢，開始了新生。可是在這個惡夢中，我已長成了大人！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日，我們全家一起回到諾埃勒的老家。在這廢墟上，我們又勇敢的開始了工作。

開始時我被僱去重修朗斯到杜埃的鐵道，以後又進了杜熱礦場第四礦開去工作。

漸漸的，政治成了我關心的主要問題。就政治上說，我同樣覺得一切都要改弦更張。

每個星期六，我賣工會機關報「論壇」；我回想我最滿足的一天，是那天賣了三百二十四份報。德國的政治和經濟情形在無產階級中間很快的引起一種革命的精神狀態。生活品的繼續漲價，佛郎的跌價，運輸、煤炭、糖、巴黎區電力的等等危機，由戰時生產改變成和平生產轉變的困難等等，這一切引起了一個激動，克里蒙梭政府雖然被迫通過了八小時工作的法律，可是也無法使之平靜下去。

工潮泛濫各地，並且帶着政治性質。但是因為沒有一個堅定的集中的革命政黨，這種工人階級意識的醒覺，當它轉變成具體行動的時候，仍然是無秩序的紊亂。

當時法國無產階級所缺少的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以及一種革命的理論。列寧曾經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然而，工人階級，仍然在戰前惡劣的傳統的障礙之下，在無政府工團主義和平主義的束縛中，找尋他們的道路。加入社會黨和工會的人在不停的增加着。社會黨在一九一八年是三萬四千個黨員，到一九二〇年增加到十五萬；總工會增加到兩百五十萬會

員。無產階級要求停止對蘇維埃的干涉，要求立即復員，要求大赦軍事犯和政治犯。他們向昂德來·馬爾梯（Marty）領導的黑海叛變（一九一九年四月）致敬。他們懂得俄國英勇羣衆所舉行的鬥爭的一切意義，並且努力的給以幫助。

我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加入社會黨和工會的。在黨裏，我是擁護加入第三國際委員會的一員。在工會裏，我是爲使獨立工會加入總工會而鬥爭。這個時期是一個緊張的政治行動和激烈爭辯的時期。諾埃勒社會黨支部，在有一次公開大會的幾個星期之後，以六十六票對五票通過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在這次大會上瓦意揚·古久烈（Valliant-Couturier）發表了演講。這一決議是個大勝利，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區域：是社會黨舊領導者們無法阻止退出第二國際而企圖延遲加入第三國際的區域。

在一九二〇年二月斯特拉斯堡代表大會，巴·德·加萊省的四百七十九個代表中，三百六十二個代表聲明退出第二國際，一百一十七個代表主張不退出。最後，巴·德·加萊的代表分成兩派：一半人（二百三十二票）擁護改組（中間派，代表是龍蓋）另一半（二百四十七票）擁護勃魯姆（Blum）的改良方案（右派）〔註〕有些無廉恥的政客們盜取了黨員給他擁護第三國際的委任票。於是我們繼續着鬥爭。

〔註〕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社會主義國際的破產和坍台。除了俄國布爾塞維克黨之外，第二國際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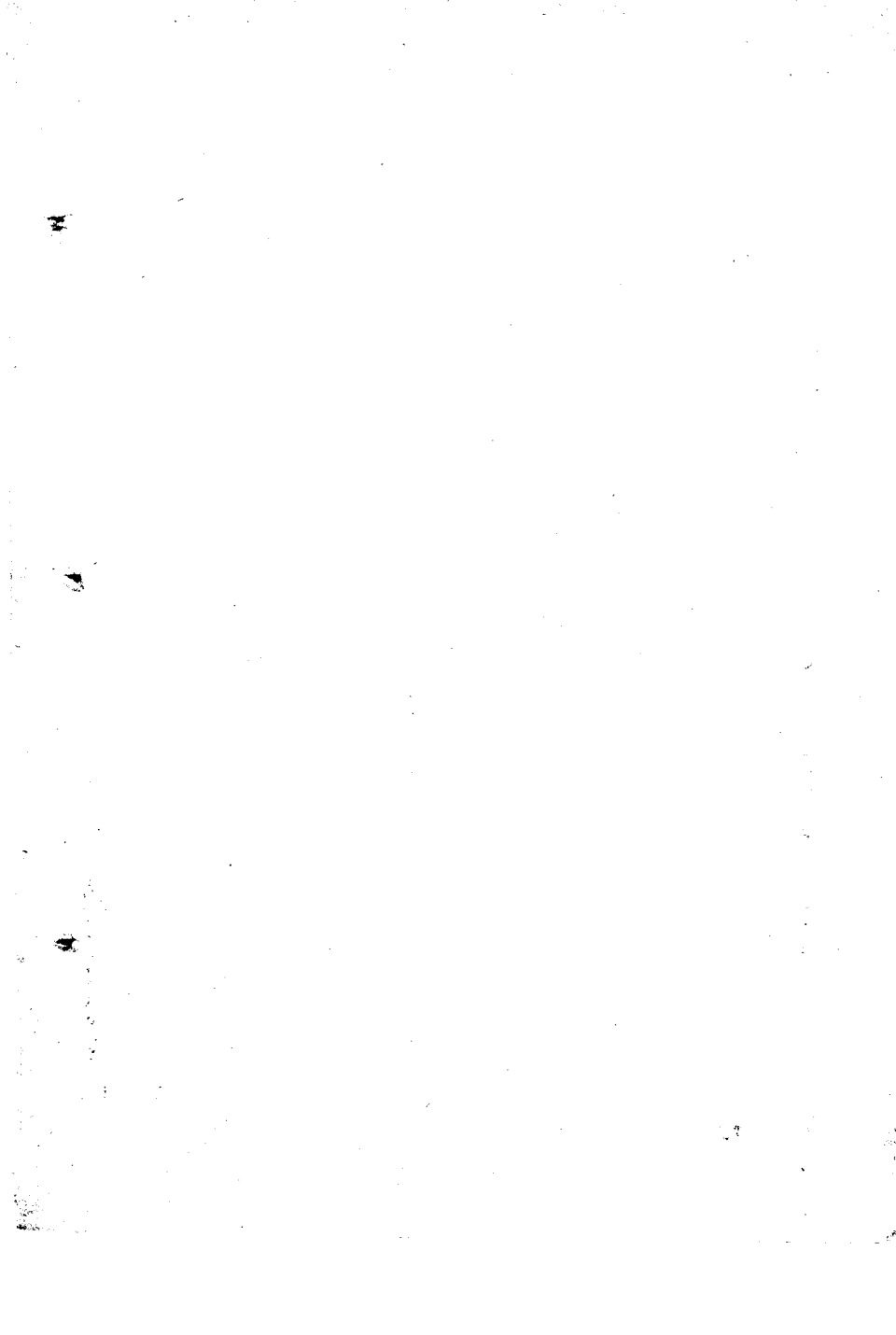
國的黨，都淹沒在戰爭政策裏面去了。每一個國家的社會黨都支持它本國的資產階級。列寧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就喊出「第二國際已經死了……第三國際萬歲！」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共產主義的第三國際創立了；在布爾塞維克黨的周圍自動的團結起一切願意復活革命的馬克斯主義原則的各國工人政黨。

那些改良主義的領袖們，提出重建一個國際，這個國際包含着那些落在與資產階級合作政策泥坑裏的社會黨及其領袖們，企圖用這一個國際，來對抗脫除了機會主義障礙的第三國際。

在巴·德·加萊省，一九一九年曾經發生過許多罷工和各種衝突。參加被破壞地域重建工作的礦工和工人，也加入了鬥爭。一九二〇年的鬥爭也是一樣激烈的進行着。

一九二〇年三月，正在罷工緊張的時候，並且那時我剛被任爲諾埃勒地方工人委員會代表的時候，我被召入伍，編入步兵第七十二聯隊，第一年在第三大隊，駐在阿伯維勒，第二年我被調到另一隊，駐在阿密安。在一次請假期中，我第一次穿着軍裝在一個公開會議上演講。我擁護第三國際反對當地社會黨下議員。礦工們很高興的聽到在他們跟前長大的一個本地孩子說話，關心和擁護他們的日常利益，關心他們瑣細的憂慮，以及經常的窮困，同時向他們指出列寧所指出的走向幸福的大道。「你知道，他們用膀子碰一下旁邊的人說，這就是多岩斯小鬼頭！現在長大了……」在軍隊裏，我繼續着工作、閱讀、以及積極的鬥爭。晚上，我們在房裏討論俄國革命和第三國際。我們寄了一封信給「人道報」，主張加入第三國際。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我用極大的熱情去靜聽着杜爾（Durr）全國代表大會的辯論。偉大的克拉阿·蔡特金女士，（Zetkin），避過了邊境警察的注意，出現在代表大會的演講台上，她那火熱的演講，以及加善（Gachin）的輝煌演講，使我們充滿了興奮。巴·德·加萊省聯合會在這次，最大多數代表聲明加入第三國際：擁護加善和福樂沙的主張加入第三國際的有二百六十七票，擁護龍蓋和波爾·福爾有保留權的加入第三國際的有一百四十五票，擁護勃魯姆主張的（反對參加的）只有六十七票。這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勝利！法國的工人階級終究從長期睡眠中醒了。我們這些年青的戰士們，吸了滿肺的這種流動的活生生的新鮮空氣。但是在共產黨面前的還是一條要走的很長的道路，還是一個艱苦的學習工作。作為政治人物，就要學習認識和鑑定他四的周實真情況，學習鬥爭經驗的取得，學習在法國特殊環境裏面取得勝利！



第二章 學習

當我服兵役的時候，假期中回到諾埃勒·歌多，去下礦井工作。工頭爲了更安全計，把我兩黃色份子放在一塊，這些份子在每次選舉礦工代表和選舉救濟基金保管會代表時，總是反對工會所提出的候選人。

當我從軍隊裏回來之後，沒有人再僱用我了。我當時只得作些雜工，先是作建築工人，後來作漆牆的油漆匠，油漆匠工作乃是接手我哥哥的工作。

在這些期間中，我盡很大的努力作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活動和礦工統一工會的活動。一九二二年八月間，在一個罷工的過程中，四個工人在哈佛爾被打死了。統一總工會宣佈在八月二十八日舉行二十四小時的總罷工；雖然通知到遲了，但我們礦場的礦工仍然在第二天執行了這個號召。我那時成了本區的宣傳者。在白天工作之後，晚上騎着腳踏車從這個會議席上到那個會議席上。在一九二三年，發生過兩次礦工的罷工，一次是在二月，一次是在十一月，我當時擁護第一次的罷工，可是反對第二次的罷工。

二月十五日的罷工是在法軍武裝佔領萊茵區的時候爆發的。那時德國運交法國的煤暫停了，

薩爾區的煤礦工人正在罷工。情況是很有利於我們罷工的。

經過幾天的鬥爭之後，就獲得增加工資的勝利，於是礦工統一職業工會全國總會下令復工。這是一個相對的勝利。

在十一月間，許多區域裏，工資的增加已在罷工口號發出之前就實現了。在這種條件下，那些改良主義礦工和未參加工會的礦工們，拒絕參加罷工，而這些人在二月間會部份的參加過我們的罷工。罷工運動於是失敗了。我這個青年戰士，在這兩次罷工的經驗中，得到了一個革命的實際主義的教訓。在礦工統一職業工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辯論的時候（一九二四年，八月，在蒙特梭·萊·密納開的）我說：

「一個革命者，不能以他的願望當爲革命的實際……一個革命者，首先應當在事件的一切現實上和真實性上去認清事件……我認爲在某種情況下應作某種決定，當情況變遷得不同了，也就要採取與前不同的決定。若是勝利的條件顯得不够，就應當一面作戰一面撤退；相反的，若是成功的機會很好，認爲應當迅速的完成這一運動，那麼就立即戰鬥起來。總之，不應當被束縛在一定的公式一定的決定上；這樣就不會使我們的運動受到損害了。」

我時常想到列寧曾多次發揚過這種思想：

不應當停留在工人階級的後面，同樣的也不應當，就真實的字義來說，留在他們的身邊。而

是應當站在他們的前面，可是也只是站在他們前一步。

祖父同我在政治上是有分歧的，可是我爲工會作工是受到他的尊敬的。這也就使他愛護共產黨人。要是有人在他的面前攻擊共產黨人，他就會喊起來說：

我不准有誰說共產黨人的壞話！

在一九二一年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號召「到羣衆中去！建立統一戰線！」我們巴·德·加萊省共產主義聯合會的工人戰士不懂得統一戰線這個戰略，他們把它看成這是對改良主義領袖的投降，甚至等於叛變革命。我在聯合會裏，在阿維翁代表大會上，都是擁護統一戰線的。一九二二年十月，在巴黎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我們巴·德·加萊省聯合會的代表給了反統一戰線一百四十六票，擁護統一戰線的只有四十票。我在大會上是少數派的代表。

幾個月之後，多數派同意了我們的觀點：他們本來是擁護共產國際和它的團結的旗幟的。

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國武裝佔領萊茵區。共產黨號召反對浦安加埃(Poincaré)這種罪惡的烏塞政策，這是一種暴力政策和戰爭政策，它大大的助長了以後希特勒主義的發展。『德國工人們是你們的弟兄，同他們親善起來！』共產黨的這個宣言發到佔領軍裏面去，很快的就看到了效果。在杜斯堡、在道特門德地方，法國士兵唱起了國際歌來，領導着革命的示威，在埃尚，他們拒絕向衝進市政府的失業工人開槍。

壓迫是很兇的。共產黨和統一總工會的領袖們——加善，蒙梭梭，塞瑪和其他——都被控爲陰謀不軌而關了起來。美揚斯地方的軍事裁判廳把三十七個同志判了一百三十三年的監禁。

在這個時期，黨的書記福勞薩離開了我們的隊伍。但在這時我們有一個光輝的加入者：「火線下」的作者巴比塞加入了共產黨。

在這種戰鬥與壓迫的時期，在各種風暴打擊黨的時期，我被任爲巴·德·加萊省黨部的領導者，起初是副書記，後來，在一九二三年任爲正書記。這時我丟下了漆牆的油漆刷子，成爲專門給黨工作的人員，成了一個職業革命家了。

環境和政治鬥爭使得黨很快的委付我一些新的責任。一九二四年在里昂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我被選爲共產黨中央委員。在一九二四年十月，我被任爲法北局的書記，法北局包括着北部省，巴·德·加萊省，索姆省三省。我始終還是礦工統一聯合會總會的委員。

* * *

* * *

* * *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寧死了。

國際無產階級和他的戰士們受了嚴重的打擊。一種無限的悲哀吞蝕着我們。我突然感到成了孤兒。列寧不再有了！

可是，革命在繼續着。一個整個階級——無產階級，已接受了列寧的教誨。列寧死了，但是

列寧主義活着，並且勝利着！

至於我，也和我同代的一切戰士一樣，無限的擁護列寧。他那多麼深刻和明確的思想，是很容易爲無產階級所接受。我一有機會就教勞動者們讀「國家與革命」和「左派幼稚病」，他們很了解並且常常以同樣的語句對我說：『多麼好！多麼簡單明瞭！』

列寧的著作是多麼的豐富，一個戰士在那裏面可以不斷的找到關於政治問題和事件的新的光明啟示以及值得反省的新問題。

一個人若是不研究「左派幼稚病」，如何能够學會戰勝西方革命運動發展中所遇到的障礙和困難呢？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理論。

列寧，第一，就是擁護和平的鬥爭。在帝國主義戰爭全面展開的時候，在那粗暴的屏情衝動和沙文主義瘋狂的情形之下，列寧在爲和平而鬥爭着，他不是用和平主義者綿羊乞憐的辦法，不是用不抵抗的辦法對付兇暴，不是只喊喊「寧死不作奴隸」，而是號召羣衆去作革命的行動，去奪取政權。

列寧，就是參加革命的不停的號召，就是社會的經濟的實質的天才的分析，就是革命的意義對小資產階級空想家假面具的撕破，就是對機會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戰爭。透過那些最複雜最困難的現象，具體分析每個一定的情况，看出並抓住「鐵鍊上的重要環節」之後向轉變社會的

道路上前進。

列寧，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和戰術。就是同農民羣衆和殖民地人民的聯合。列寧主義是認農民的重要並且努力爭取他們參加社會革命，這是和以恐怖鎮壓農民的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相反的。

列寧，就是黨，就是在偉大階級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革命政黨，一個領導工人階級走向勝利的有先鋒理論的先鋒黨。這個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黨，是列寧創立起來的。並且他總是願望着和努力保護黨的團結統一。

列寧，也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的革命的黨，就是第三國際。

被列寧的偉大和他的著作所感動，我在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到蘇聯去觀光。那裏，是馬克斯所預言的革命實現着的地方。我的心在跳動着，當我走進這個勞動者所願望的和勞動者所手創的新世界，我讚美這正在建築中的世界，讚美那些整個從空地上出現的城市，讚美那些不爲自私和倒退的資本寡頭生產利潤，而爲整個集體勞動者服務的工廠。『這些都是我們沒有廠主的人所作着的，現在我們還是在沒有廠主的情形下繼續進行工作』，男工和女工們帶着驕傲的面孔宣稱着。他們付出犧牲和困苦的代價，努力的使得這些過去被資本主義洒滿血和淚的土地，成爲適合居住的地方。

在後來又一次到蘇聯去時，我參觀了頓內次的煤礦，看見那些從一九二七年就實行六小時工作制的礦工們，他們用完善的工具工作着，享受着豐富的養老供給，享受真實的社會保險。這是世界上最前進的工人，他們從資本的枷鎖之下解放了出來，從此成了自己命運的主宰。在工人的身邊，我看到被革命所解放出來的農民和知識份子，他們都在這個勞動共和國裏佔有適當的地位。他們已經不再遭遇着殘暴的待遇以及擔憂着明日生活的貧困，大家都知道他會繼續工作和生產下去的，沒有人憂慮到失業和疾病，那些休養所就是供給他們休養之用的，並且無論他遭遇到什麼不幸，集體組織都會爲他解決的。

我參觀了一些學校和實驗室，都是佈置得使人讚賞不止，參觀了一些作坊，都是使用着很完美的新式工具。我看到了莫斯科蘇維埃的選舉：每晚上都有一些人的行排到憲法廣場去向蘇維埃介紹每個工廠代表的名單。無產階級國家最高的領袖們在向工人致敬和祝賀。

到處都在我的眼前表現出真正民主和人民大眾參政的景象，使我感到在法國，民主仍然還是形式上的民主，自由對於無產階級常常等於餓死的自由。我想在法國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後，會建立起一種輝煌富裕的生活，若是不再把勞力用在堆積與維持寡頭們的財富，而是把科學與法國一切的可能都用在爲集體服務上去的話。

*

*

*

蘇聯在內戰和外國干涉（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所造成的廢墟上建築了起來，它並且自一九二八年起進入到五年計劃的時期。而在法國是怎樣的呢？

一九一九年所選的下議院，給國家丟下了一筆災禍的賬。在四年中，公債從兩千五百萬增加到三千八百萬萬；爲了補充起狂用的政策，握政的『民族集團』只知道借款，增稅和沾沾自喜的說着『德國會付償的！』然而，那些戰爭的投機者一變而爲和平的投機者了，在破壞區的重建上發財，盜竊美國運來的貨物，勾結政府的公務員在公賣上取得好處，以及用千百種類的方法來取得無恥的利益。

面對着在下議院裏佔多數的稱爲『民族集團』的議員們，急進黨和社會黨聯合組成『左翼集團』。共產黨在這時號召全國無產階級的一切力量組織了『工農集團』。

在一九二三年底起草了共產黨的綱領，一九二四年在里昂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它規定組織一個團結一切城市與鄉村中勞動者的統一戰線，並且規定組織工農政府。

在選舉競賽的過程中，共產黨號召勞動者反對那些『左翼集團』所提出所稱道的幻景。

『左翼集團』的綱領，遠非我們所滿意的。後來雖然在選舉中獲勝，而使左翼上台組織了政府，可是並未實行這個綱領。那時受威迫的寡頭們竭力的向左翼政府反動。財政危機加深着，國庫虧空了。大銀行家們加緊進攻，使得佛郎跌價，並且把左翼政府一個連一個的推倒。一九二六

年七月二十三日，資本家頭們就把他們自己的人物浦安加埃抬上了台。「銀艦」戰勝了「左翼集團」的下議院。

一九二五年爆發對摩洛哥的戰爭。共產黨在工人大眾面前指出戰爭的帝國主義根源，指出銀行的作祟，特別是巴黎銀行和荷蘭銀行。這種反對運動由一個中央行動委員會領導，我被選為這個委員會的主席。

我離開法國北部來到巴黎。

一九二五年夏季裏，各地舉行了許多反對摩洛哥戰爭的工人大會，特別是在里爾、里昂、馬賽，在波爾多、斯特拉斯堡、在卑西埃等地。在這些大會上，我代表着行動委員會不斷地號召大家努力組織統一行動和統一戰線。

總罷工的原則首先在巴黎的大會上被採納了，以後繼續被各地的大會所接受。罷工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實現了，參加的工人有九十萬，口號是反對對摩洛哥的戰爭和對敘利亞的戰爭，反對卡意奧所訂的賦稅，要求普遍增加工資。這是大戰後第一次羣衆的政治罷工。在罷工期中，巴黎會發生過不少的劇烈衝突；工人薩巴底埃被打死在彼多。

我們反對對摩洛哥的戰爭，是繼承着法國社會主義者和急進主義者的舊傳統之一。遠在一八一五年，法國工人政黨，在蓋斯德 (Guesde) 和拉伐格 (Lafargue) 領導之下，就反對過懷里

(Ferry) (註)對越南東京的派遣隊。還有，若岩斯(Jaures)曾經談過「摩洛哥的蜂窩」，他說『在財政集團的祕密室裏，時時煽動着摩洛哥的衝突』，他控告那些掠奪殖民地的戰爭。在一九〇七年九月七日向巴黎無產者報告斯丟特加大會會議時他說：

「在我同你們說話的這時，有些海盜，貪而無饜的記者，胆大妄為的銀行家，無恥的資本家在夢想着在摩洛哥來一個大獲利益的勾當。當這羣最高資本階級泡沫們高興的走向摩洛哥海岸，就是那些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民主派們，（他們還不是完全同意社會主義的人們），以及幾百萬的人民，都不願把法國的金錢和鮮血，為那種無益和罪惡的冒險事業去白流浪費。只不過這一切和平的志願，是分散的，是散漫的，是漂浮着的……」

當我們進行着反戰和擁護和平的時候，壓迫是盡量的加重在我們一切戰士們的身上。二百七十四個戰士一共被判了一百二十年的監禁。我也被判了十四個月的監禁。

*

*

*

黨在里爾代表大會時（一九二六年六月），就已開始對狹隘觀念和宗派主義作鬥爭。我在一九二五年七月起就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和中央委員會組織部的書記；我在那時就宣稱說，共產黨人是最懂得法國真實利益的，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最優秀的法國人：

「共產黨人，國際主義者，在現在成爲祖國的財產的優秀防禦者。共產黨人不願許給代

的勞動生產品現在交給英美的銀行家。共產黨在說明他這種態度時，顯然是同社會黨領袖所說「我們不願支付給英美銀行家們！」這句話相反的，這不是向本國銀行家討好，這同樣是要儘快以本國銀行專制下解放出來的堅決意志。」

對外方面，我指出這是無產階級——民族財產最堅決的保衛者的行動，同時我又在黨內向法國人民革命傳統的繼承者致敬：

「倘若有誰在現在能繼承本區下列工人鬥爭的傳統，他就是好的共產黨的戰士，這些工人就是昂山地方的礦工們，就是阜密地方被槍殺的工人，就是頓巴克的碼頭工人，以及阿讓第埃的犧牲者們。」

一九二七年干涉蘇聯的傾向在增加着，反蘇戰爭的危險擴大的很厲害。

在蘇聯和滿洲的邊境和在太平洋方面，衝突迭起；每天都有搗亂中東鐵路，拘捕蘇聯職員，向邊境挑釁以及地方衝突和漁業的衝突等等事件發生……日本軍閥們在尋找戰爭，但是他們在蘇聯堅決的和平政策之前，尤其是在壯大着的蘇聯武裝之前，又猶豫了起來。

英國同蘇聯斷絕了商業關係。在法國，大資產階級和參謀總部在推動着反蘇的戰爭。福煦元帥響亮的向英國 The Referee 報談出干涉的必要。昂德來·瑪爾梯反斥了福煦元帥的談話，於是他又受到新的判罪。巴黎的反動報紙充滿着反蘇言論：他們藉口蘇聯大使所發表的一次演說，要

求撤回他，並且達到了撤回的目的。

情形一天嚴重一天；共產黨一黨反對各黨的獨力進行着保衛蘇聯的鬥爭。

「左翼集團」被大資本把它絞死了，大資本把法國帶到了破產的邊岸（不到一個月佛郎對英鎊的比價從一百六十佛郎一個英鎊跌到二百四十五個佛郎一個英鎊），並且引起了突來的可怕的恐怖。浦安加埃，得到了國會信任之後實行起資本家的政策，減少工資，增加工作時間，加強對殖民地的剝削，虐待失業工人，維持「街道秩序」。

共產黨號召工人階級和趨向貧困的中間階級，團結起來，為同一的反對大資產階級而鬥爭。在黨的內部，有些份子不懂得總的情況轉變，使得『階級反對階級』的戰術成爲必要的了；有的很快離開了我們的隊伍。對於這種傾向的反對又產生了巴黎區過左的冒險政策，他們眩惑於黨的真實力量和他強大的號召力量。這就是文牘主義和機械的決定，不可能也不會實現的，沒有血肉的空架的示威很快地被警察衝散了，強迫黨員進行「示範的罷工」，開除不大活動的黨員，爲難那些有改良主義嫌疑的黨員等……這種強烈的政策，漸漸使得黨變成一種脫離羣衆的宗派。更加使情形複雜化的，是那些對這種冒險而無益政策首先應負責的老領導者們，他們把那些因爲他們自己錯誤而招致的失敗加在黨和共產國際身上，以反對黨和國際。

我們應當進行反機會主義和過左的兩面鬥爭，我在用盡一切力量來作這種鬥爭。

一九二七年六月，我第一次被法院傳去答辯「宣傳無政府主義以煽動軍人抗命」的控告。我被判了六個月的監禁和罰款。

不久之後我又被召到阿拉斯去服務二十五天的後備兵役，這是在第三工兵隊裏，作的是遣橋工作。

服役後回到巴黎的第二天，我在拉斐德路一百二十號中央黨部開會，出門時被那些圍在四週的總調查局的特務捉着了。經過短促的衝鬥，我逃走了，落在警察手裏的只是一塊從我領子和襯衫上撕下來的破布。

幾天之後，同樣的情形又發生了，這次是在拉斐德路一百零六號巴黎區黨部。特務跑來捉我。同志們不讓他們進門，向他們要檢查證件，特務頭子去找檢查證件時，我利用這個時間換上衣服逃了。

從此以後，我開始流浪起來，流浪了兩年之久，生活和住宿在同志們的家裏，時常調換着地點。

這種長期的流浪，並不妨礙我完成每天的戰鬥工作以及經常的參加中委會議，政治局的會議和黨內部的代表大會。在一九二八年競選的過程中，我同樣的在非夫·里爾的羣衆大會上演講。

一九二八年大選時，黨所運用的是「階級反對階級」的戰術，我們得到一百零七萬選票，比一九二四年大選時多了二十萬票。可是共產黨議員的數目反而從二十六位跌到十四位，因一切政黨都實行交換選票來反對共產黨，以及小塊的分區選舉制是對於集中的工人不利的。社會黨獲得一百六十萬票，可是它選出了一百個議員。

我們堅決勇敢地進行反資產階級的鬥爭，指出他們的反蘇陰謀，這引起了他們對我們加緊的壓迫。控告和拘捕日漸加多。他們把我們戰士監禁起來的目的就是爲了斬去工人運動的首腦。

也同一切其他困難時期一樣，產生出一些叛變和脫黨的事件。

敵人從外面打擊我們，可是他們同時也鑽進了黨內；若是有些黨員叛離了黨，另外一些對前者就大肆攻擊，以便組織更有利的叛變。這就是在這個時期中的巴伯·賽洛的祕密小組織，他利用戰士被警察分散和被捕這種機會，來把自己同領導機關隔離開來，並且進行着破壞和叛黨的宗派政策。

一九二九年六月間，黨內戰士們在賽納烏瓦斯省的阿賽爾宮裏開會。被警察圍了起來。我藏在一個隱蔽的地方。警察已得到密告，一直跑到我躲藏的地點把我捉住。這樣叛變的事件以後又發生過。這是在我被捕一個月之後，黨計劃好八月一日示威，這個示威是告訴工人階級戰爭危險就要來了，——因爲我們在自己感到戰爭危險的時候，而別人不肯相信——可是在這示威的前

幾天，在維勒諾夫·聖雷治，中央委員幾乎一下全被捕了去。

我在開始時是被關在看守所的政治犯部份裏。

既然我曾經被沙勒維勒的輕罪審判所判了罪的，因此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把我轉到南錫監獄裏，南錫法院把我加判了八個月的監禁。兩個檢查員一邊一個的帶着我坐火車送到聖沙勒監獄裏去。

等到囚人登記等手續作完，恐怖襲擊來了。

那個黑棍突然命令我脫去衣裳。我使他狼狽的注視着我。

——脫了衣裳，他又粗暴無禮的重複一句。

——我不脫，我並且禁止你這樣不禮貌的說話。我平心靜氣的回答他。

他臉色發了深紅，吼着恐嚇我。但是絲毫也沒有用。

——請您脫了衣服，或是我用武力爲你脫。他說。

他已經不再無理的稱「你」而稱「您」了，並很快地帶着憤怒和咕噥着走了。

監禁我的那間黑暗污穢空氣不流通的房子，在夏天，嚴熱期中，垃圾散佈着臭氣。我要在這個地獄裏過上一個年頭！

我堅決的要求監獄長來看我。我這樣吵鬧終於給了我滿足。

我從容地說明決定要獲得對政治犯規定的待遇，必要時我將用絕食的方法以求達到目的。不准對我毆打和恐嚇。我要獲得別人對政治犯權利的尊重。

我實際上了得到了這些。我和其他七位政治犯過着同看守所裏同志們過的差不多一樣的生活。白天我們在一塊，晚上各回各人的房。

可是要使得守監人的尊敬，必要繼續着戰鬥。這些人開門進監是不先敲門的。我堅決的要他們先行敲門，他們以後是這樣照作了。我們接見來看我們的人是和普通犯在一個談話室裏。說話時要隔着欄杆，並且在守監人面前說。我們要求有個特別爲我們見客的談話室，也達到了目的。

一天，我經過大廳回到監房裏。一個穿着便服的人喊我：

——喂，那位！

我並不回頭。

他向守監人問了我的名字之後又喊：

——多岩斯！有人喊你！……

我毫不理睬地進了監房關上了門。在我進門時他突然地衝進門來。

——先生，我極鎮靜的並且極堅決的向他說，請你允許我的請求，馬上出去……

——可是我是預審推事！你簡直不知道向什麼人說話……

——可是我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工人，一個政治犯，在這個地方毫無需求於一個推事。
出去！

他沒有堅持什麼，出去了。

還有其他許多吵鬧，值得談的是同一個律師的爭執，這個律師突然的衝進政治犯的談話室，不說一句請求原諒的話，還把帽子好好的戴在頭上，我口頭上給他上了一課關於禮節的課，一課「法蘭西的文雅」，並且寫了封信給律師公會的領袖。後來經過警官調查之後認為是律師的不是，這個律師是個激頭激尾的國家主義者。

在我們監禁的過程中，曾經組織了一個學校，來教育同我們關在一起的青年工人。

除了我們同樣的工作着，和我們的談話之外。我還有很長的空閒時間。我利用這些空閒的時間來盡力我自己的教育。

在自由的時候，實現任務差不多佔據了一個工人戰士的整個時間，有時還要犧牲幾個鐘頭的睡眠。在牢監的平靜生活裏，人們可以集中他的思想在大的問題上，手裏拿着筆桿在寫，想和讀着。

在聖沙勒監獄裏，我把馬克斯與恩克斯的書籍重讀了一遍。這兩位科學社會主義的導師看問題的深刻，思想的豐富，判斷的正確，以及那天才的預見和分析，深深的使我興奮。他們所說

的關於資本集中，社會進化，以及工人羣衆的貧苦化，在實際中都證實了。以後列寧把馬克斯主義在當時新的社會條件下運用時，又把它發展和深刻化了；他分析了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帝國主義，並且，以熟練的戰略戰術家的姿態，提出社會革命的具體任務。

列寧死了以後，他的最優秀的同伴和學生斯大林，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轉變中，又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創基者們的學說。

「共產黨宣言」的光輝頁篇，我是愛不忍釋的讀着，雖然是一八四八年出版的，但是在今天它仍然保持着它的新鮮和光輝。在一九二四年，在伯求納地方，因為教授青年無產者使成爲黨的優秀戰士，我曾經把這本書幾乎完全背誦得出。馬克斯在『拿破崙政變記』一書上對於法國情況的分析，使得我更好的明瞭法國的實情。最使我感動的一段，是他着重指出在法國無產階級聯合農民及中間階級的必要性：

「無產階級革命這樣就得到了合唱者，在一切農業國家裏，沒有這種合唱者的獨唱，就會成爲晚歌。」（見『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法國的階級鬥爭」，尤其是著名的一八七一年「法蘭西內戰」一書，強化了我對法國無產階級命運的信心。現在巴黎的工人們不就是那些「翻天覆地」的巴黎公社戰士們的孫子嗎？歷史已經批准了馬克斯的這種判詞：

「工人的巴黎同它的巴黎公社，將永遠被敬為新社會光榮的先驅者。它的死難者，將永遠被記在工人階級偉大的心坎裏。屠殺它的劊子手，已被歷史釘上了恥辱牌，任何他們的牧師的禱告都不能把他們取下來。」（見「法蘭西內戰」）

俄國革命重新和繼續一八七一年英勇哨兵們所創始的工程。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建造了勝利的公社！

馬克斯在「法國階級鬥爭」上所表露出的另一個觀念，也深刻在我的心上：若是說革命組織起了反革命，那麼若用辯證法的規律來說，反革命的一方面也武裝了革命，給了它以真正的革命政黨，這個黨在反對敵人的戰鬥中成熟起來。

我以後證實它的深刻的真確性，這就是在二九三四年二月法西斯進攻以後，勞動大眾於是組織起來以加強反抗並且走上反攻。

在列寧時期，我找到的實例是：在一張發現現代情形的巨大壁圖的旁邊，出現着把無產階級引到勝利的領導方針。帝國主義時代的特點之一就是工業走向極度的集中，以及造成壟斷。

「在商品生產和財產私有制度之下，資本主義壟斷的統治，不可避免的成爲一種財政寡頭統治……這種龐大的財政寡頭統治，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特別是在美國、在法國、在德國，成爲這樣明顯的事實，創造了一種整套的文學來描寫和批評它，——自然這是一種

小資產階級觀點的東西。」（見列寧著「帝國主義論」）

無產階級用什麼戰術來推翻它的敵人呢？列寧回答說：團結。

「無產階級的團結一致，是它在社會主義革命鬥爭中最大的武器。」

共產國際在寫它的綱領時，就闡明了列寧的這種思想：

『統一戰線戰術是一個反資本鬥爭和用階級精神動員羣衆的最有效的方法。』

這樣，我不息的把我所讀的這些同法國的情形聯繫起來，我從這裏面得到雙重的教訓，以及確信着雙重的必要性：團結無產階級，聯合中間階級。

爲了閱讀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原著，我決定學習德文。我的德文本來是有點了解的，再加上我努力的學習之後，不到幾個月，我已經沒有困難的能讀「反杜林」一書了。

我平常總是很讚嘆和特別敬愛德國人民的，這個偉大的民族曾經給了人類的有阿爾伯·杜萊（一四七一——一五二八，名彫刻家和畫家）戈登伯（一三九七——一四六八五世紀發明活字印刷者），萊辛（一七二九——一七八一，詩人），康德（一七二四——一八〇四，哲學家），歌德（一七四九——一八三二，詩人），席勒（一七五九——一七七八，詩人），悲多芬（一七七〇——一八二七，音樂家），馬克斯（一八一八——一八八三，科學社會主義創基者），恩格斯（一八二〇——一八九三，馬克斯的合作者，科學社會主義創基者之一），以及許多著名的學

者，如被希特勒開除國籍的愛因斯坦（哲學家，曾發明相對論，被希特勒政府逐出德國，現在美國），許多無產階級的戰士，如在希特勒劊子手刀斧威脅下的泰爾曼（德共總書記，在希特勒上台後被捕，已被殺死在獄中）。

在德國的詩人中，我最偏愛的是歌德和海涅（一七九〇——一八五六，馬克斯的朋友，死於巴黎）。歌德，那個被嘲弄似的囚在德國一個小公爵國富麗宮庭裏的歌德，不是會向瓦爾米之戰的法國志願軍們致過敬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法軍打敗普魯士侵略者於瓦爾米）。他那真與美使人叫絕的作品，對於一個革命者是充滿着指示和教導性的。

『灰色，親愛的朋友，是整個的理論，綠色乃是美麗的生活之樹！』

在『浮士德』一書上的這兩句詩意裏，歌德指出生活永是優越於理論，這使人們想到列寧的思想：『馬克斯主義不是教條，乃是行動的指南。』

『開頭的是行動。』

歌德的這種肯定，也是我所深愛的。

海涅，一個真實的革命詩人，馬克斯的朋友，他引起了我的興奮。我不放手的讀了再讀他那西利西亞織工之歌，以及他那抒情與諷刺的詩篇：「德國」、「一個冬天的故事」，這首充滿了火燄與精靈的作品，是他逃避普魯士反動者住居巴黎時寫的，他向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致敬，在

他覺得法國工人乃是這個革命先鋒隊。

當然，我並非只讀外國作家的作品，羅曼·羅蘭也衝入了我所住的監獄的鐵柵，他的作品「約翰·克利斯朵夫」成爲我的伴侶。他也把我的思想引向着德國，向着那被不公平的凡爾賽條約所壓碎了的德國人民。

我很久以前就讀過巴比塞的「火線下」。我又再讀它一遍，並且也重讀了他那本「雜記」。「Till Tlenspiegel」的一些冒險事件，掃除了我獄中的孤寂，在那上面，我受到感動的是我那親愛的佛郎德爾地區的風景，以及它對自由的愛好，它對各種形式壓迫的憤恨，它的快樂，它的幽默感，它的樂觀。

我也讀過阿納陶勒·法朗士的許多小說，他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現代代表之一，在他老年的時期，轉向了勝利的俄國的青年革命。他了解法國社會的結構，知道那些人們是實際的握權者。在他寫的「短翅野鴨之島」一書上，他帶嘲笑的訓責說：

『法蘭西，在它逃出了玉公與皇帝的權威之後，在它三次宣佈它的自由之後，它於是被統治在財政集團的下面，這種財政集團擁有着全國的財產，並且用它們收買的報刊，來領導着輿論。』

阿納陶勒·法朗士又寫道：『你以爲爲國犧牲，實際上是在爲一些企業家而死。』

我的監禁要滿期了。但是要出獄還得先付清罰款。巴伯·賽洛小組織，爲了使得他那失敗政策得以自由施行，他們決定讓那些足以阻礙他們計劃的人們留在獄裏。並且決定不應交付罰款。我深知他們是錯了，我更進一步的反對這些。黨和國際是對的。

這樣我獲得了自由。經過在獄中那些書籍的閱讀，經過長時間的考慮那些法國無產階級當前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任務，我的心更加振奮，更加堅強了起來，我又站入了鬥爭的行列裏。

在我入獄期中，外面情形是怎樣的呢？黨衰弱了。在這混亂期間，巴伯·賽洛小組織乘機取得了一切領導權。它於是離開了列寧主義的道路。黨員離心離德，上面是專制的決定，被動的紀律在各級裏實行着，一切自由討論都被窒息，大家心存疑懼，噤口無言，沒有一點有益的批評，籠罩着一種軍營的氣氛——這就是這個小組織對於列寧所提示的民主集中制的解釋！這確是一幅黨的諷刺畫，黨本來應當是工人階級的有覺悟的先鋒，可是現在成了一個衰頹無力的，孤零可憐的生長着的東西了。

他們對日常的現實事物完全漠視，忘記了政策是能爲之事的技術這句基本真理，歡喜老是用空洞的詞句來代替具體的分析，並且用這樣的辦法使得工人的行動無益與微弱下去。

這個小組織的人們拋棄羣衆日常細小的要求。他們說：「爲牛排的鬥爭已成過去！」他們輕視工會工作。他們看不起社會黨的工人；他們「政治化」一些小的罷工。

當我在獄的時期中，發生了一件愚蠢而罪惡的事件：在尙比涅的查畢會場裏工人們自相廝打起來：社會黨反對共產黨！這就是陶里奧煽動工人內鬨鬥爭的時期。

一切都要改變，重新作起。

首先，應當參加和支持工人們細小的要求，強調這種鬥爭的重要性，堅持黨應當參加到工人鬥爭裏去，如同對待當時北部大罷工一樣（因交付社會保險費問題的勞資衝突而引起的大罷工）。

小組織份子對於社會保險不感興趣，並且噉起嘴來表示他們對這問題的輕視。我回答他們的是：『要求僱主代付保險費！要求真正的社會保險！』

若是我們對工人漠不關心，誰也不能接近工人。我們的行爲方針應當如此，共產黨員們代表着無產階級中最優秀最覺悟的部份，這是馬克斯和列寧所要求的。

我們應當了解工會工作的重要，要求我們最好的戰士參加這個工作。同時並行的，應當發動擁護民主集中主義的堅決鬥爭，反對思想上的悶塞與戕害。『不要無主見的影像在黨內！大家張開嘴！』（這是一九三一年在「人道報」上發表一篇論文的題目。）

終究，小組織份子被揭發了，並從他們的崗位上被趕了下去。復興的道路上自由無阻了。

從這個時期起黨的偉大主張是團結無產階級。共產黨決不容忍工人階級的分裂，這種分裂是杜爾代表大會上少數派所引起的，他們拒絕服從大多數通過的決議（社會黨在一九二〇年在杜爾

開全國代表大會，多數主張加入共產國際，此後多數派改名共產黨，少數派仍名社會黨（我們毫不停止的，爲肅清分裂，爲一切勞動者在一個戰線上重新團結起來而鬥爭！

我們的努力，在開始毫無成果獲得。但我們並不灰心喪氣。以後的事件給了我們以正確的證明。

在幾個年頭裏面，社會黨對於我國結一致的請求置之不理。它回答我們的是靜默或是嘲笑。社會黨的總書記這樣寫道：

『假使社會黨工人要用超過五個字母來回答的話，這將是對社會黨工人的侮辱。』（見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三日社會黨機關報「人民報」）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巴比塞和羅曼·羅蘭發表了一個爲召開國際反戰大會的動人宣言。他們向一切良善的人們，向一切工人組織，政治組織，工會組織，文化組織等邀請。社會黨的領導者們反對這個大會，他們罵這些發起人是口是心非，並且要以開除黨籍來打擊那些參加大會以及各級委員會活動的社會黨黨員。

相反的，我們是積極的在抓住每個可能的機會來促進團結的早日實現。

爲了要引起社會黨同我們公開討論團結問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我在巴黎比里耶會場發表了一篇演講，我代表黨中央嚴正的宣稱：

『無產階級要求團結。無產階級堅決要求團結。共產黨員用他們的一切力量在爲團結而鬥爭，他們伸出一隻友愛的手來向着全體無產者，爲了使得大家和諧起來，我們就能够克服和超越工人階級團結路上的每個障礙。』

……我們抓住每個可能——示威，罷工，各種抗議——來實現我們的團結任務，我們大集合的事業，來進行各種傾向各種組織的勞動者共同的鬥爭。

我們爲重建一個統一的總工會（C.G.T.）而鬥爭，

爲重建一個反資產階級的統一的工人階級而鬥爭，

爲重建一個工會而鬥爭，

爲重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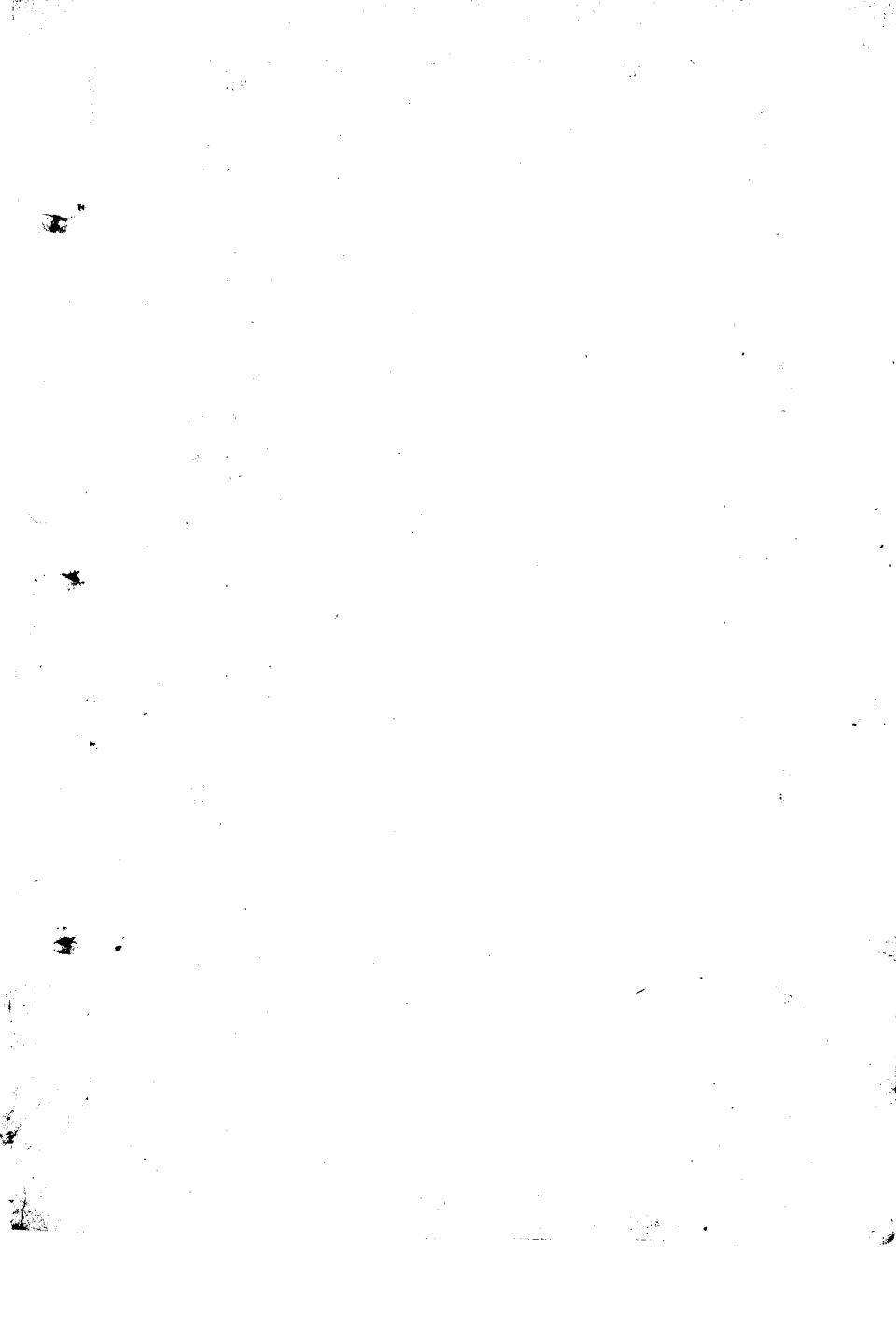
＊

＊

＊

我記得在這個時期我會經去拜訪過巴比塞一次，他那時住在尚禮附近的一個名叫着『西麗維別墅』的一個小房子裏。西麗維是奇阿·德諾瓦爾著作中的女主角名子，這個作者把法蘭西島這個地方描寫得那樣使人難忘的詩一般的美。我同巴比塞長談了團結一切反戰力量的必要，以及實現勞動者的團結以作有效的反法西斯鬥爭，因爲在這時血脈而醜惡的法西斯魔影已經半露在德意志了，它帶給這個戰爭創傷剛平復的世界的，是更可恐怖更兇悍的戰禍的威迫。

我多次的同德國黨同志接觸，竭力的幫助他們在堅苦環境中的戰鬥。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泰爾曼（德國共產黨總書記）在巴黎無產階級盛大歡迎中，在比里耶會場發表他的演說。幾個星期之後，中央派我到德國去。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我在佛里德里區非爾德墓場李普克內西和盧森堡的墳前發表演說，以紀念他們被殺的日子。這些爲無產階級事業鬥爭的死難者的名冊，將繼續的寫了下去，因爲幾天之後，希特勒奪取了政權，同他上台伴隨着來的是不可計算的罪惡，屠殺以及殘酷迫害。我永記不忘的一九三三年一月間的德國當時的氣氛以及預示恐怖苦難行將到來的黑暗，從火焚國會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屠殺。



第三章 走向團結

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的經濟危機，打擊着資本主義世界，它的面積和結果都遠遠超過以前的那些週期性的危機。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世界生產——除了蘇聯——跌了百分之四十，世界商業跌了百分之六十。

有人毀壞麥子和牲畜，拔去棉花和葡萄樹，把咖啡丟到海裏；同時另一方面貧困在增長着，飢餓統治着中國與印度，根據官方統計，失業者也達到三千萬的數字。

在各國，關稅的壁壘在增高着，出口和進口都不停在低落。商品的流通遲緩，稀少和停頓起來。強國互相爭奪着弱小國的市場，世界大戰的危機一天天在加大着。都被牽向着病勢轉劇的超級民族主義。

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戰敗國特別受到打擊。德國的工業生產降到一八九七年的水平。失業者的數目極大量的增加。農業的危機更在激增着。

就是在這非常有利的地面上發展了希特勒主義。

一九三〇年的選舉給了德國無產階級第一個警告。工人的選票差不多沒有什麼增減（一部份

社會黨的選票轉投了共產黨，資產階級中間黨派破了產，希特勒獲得了六百萬票。選舉的結果表示出，在危機的影響之下，小資產階級的大眾離去了官方的資產階級政黨。可是他們並非向左轉，而是向極右方面去了，這是因為他們受了希特勒奸雄政治的矇蔽和欺騙。

面對着危險，德國共產黨努力於創造一個同社會黨合作的共同戰線：不幸的是它的提議被社會黨所拒絕了。在這樣無產階級分裂的前面，小資產階級離去他們那天然的聯盟者，閉着眼睛投到希特勒的懷抱裏去了。

除了共產黨之外，其他的一切政黨和階級，在希特勒上台的前幾年中，都是在以幻想反對希特勒的獨裁，他們確信國家社會黨將以很迅速的步調走向崩潰，確信很快就會參加它的葬禮。當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選舉，國社黨失敗時——失了兩百萬選票——社會民主黨稱之謂希特勒的「決定性的消滅」。在法國人民報（法社會民主黨報）上，布魯姆（法社會民主黨黨魁）寫道：

「從此以後政權之門在國家社會黨的面前關閉了起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勝了希特勒。」
可是，以後三個月的時間還不到，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握了政權。

從這一課裏，得到了三個重要的教訓：

（一）魏馬共和，保證了對舊制度下資本主義的軍事寡頭的以及反動的一些建設的完整，它悶死了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並且在「民主」的名義下，毀壞了工人階級的戰鬥先鋒隊，民主的真

正支柱。

(二) 社會民主黨和改良主義工會，支持布律寧政府，要勞動大眾「犧牲」和縮減自由的政策，並且，在選擇「不太壞」的藉口下，給了法西斯主義者以握政的可能。

(三) 社會民主黨和那些工會領導者們，拒絕工人階級統一戰線，因之也就解除了無產階級的武裝。

這種殘酷和苦痛的教訓是我們法國工人階級戰士們所不應忘記的。在明天，我們不是也有遇到相似情況的危險嗎？同樣的因素產生同樣的結果，法國的經濟危機也同樣成爲法國法西斯主義的溫床。有些人不再誇談，法國的個人主義，不再談到法國人是有自尊心、有獨立人格的，這是遠甚於軍隊化了的、習於盲目服從紀律和被動的德國人！第二帝國，「精神秩序」，布朗基主義，克雷蒙梭主義離我們不太遠了啊！若是無產階級不注意他們敵人的陰謀詭計，不接受德國的經驗，重犯德國的錯誤，我們也將看到法國法西斯主義的抬頭和勝利，這個法西斯主義就是對內屠殺和奴役法國工人，對外，把法國交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分析一下法國的經濟情況，是可以證明我們所領會的是正確的。

法國經濟走進危機是很遲的。它會經長期間的利用那些良好的機緣：它有一個在關稅壁壘保護下的相當廣大的市場，這對於農業是非常有利的，此外，佛郎匯率的穩定，使得貨物大量的輸

出等等……但是這個相當繁榮的孤島，被一九二九年後不停止的世界危機所打擊，終於崩潰了。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五年，法國的生產減少了三分之一。

被救濟的工人的數字不停的在增長着。

國家收入，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四年間，總減數是百分之三十，數字如下（以十萬為單位）：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四年	
工資	一一五·六	九三·〇
流動價值	二八·三	二二·八
農業	四四·八	一七·〇
工商業	二九·〇	一五·〇
總數	二一七·八	一四七·八

危機加速着資本集中的現象。那羣卡泰爾化了的企業收穫了豐富的利潤，它並且逼使政府保衛它那獨佔的優勢。

相反的，中間階級一批一批的破產，走向貧困化和無產階級化。從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小商人的數字減少了十萬。危機使得小資產階級過着不安靜和無前途的生活。在過去，對於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中間的這個「緩衝階級」，大資產階級一面剝削他們，一面還投些盛筵的殘羹

給他們，使他們相信他們還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使他們相信他們的社會重要性，現在他們漸漸的看清了實際。危機加強了財政寡頭，同時貧困化了小資產階級，使他們認識了他們明天的命運，就是那無產者的無保障的生活。受危機嚴重打擊的無產階級在反抗中組織了起來。這就是與馬克思所畫的圖畫一樣：

「那些強奪和獨佔現代社會進化一切福利的，加強貧困壓迫奴役毀壞剝削的資本暴君的人數的減少，隨着而來的是工人階級的反抗的不停擴大，並且更有紀律更團結和更有組織，這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機構使然的。」（見「資本論」第十三章）

有些人們想把解決危機的重担放在工人身上。他們要求實行減縮工資的政策，要求實行反抗外國生產的關稅政策，要求對國內市場真正的獨佔，要求一種生產的合作「形式」，要求組織一個一萬萬自足自給的法蘭西「帝國」的經濟專制。他們同時希望着一種更能夠實現他們經濟理想的政治形式，這種形式，就是法西斯主義。

也像在意大利和德國一樣，那些特權者努力的在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敗類中徵募自己的隊員。

長期以來，反動者們就組織他們的同盟，準備他們的隊伍，增加他們的威脅。法西斯主義，利用斯達維斯基貪污事件，專事無賴的欺騙宣傳，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突然公開的露出臉來，

突襲下議院和攻擊國會制度。它的表現是：企圖建立有利於大資本家集團的壓榨，以最暴野和最笨的報復的反動精神，企圖壓碎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和民主。

但是武裝暴徒的出現——火十字團、保皇黨、佛朗西斯、愛國青年黨們——他們的殘暴，盜劫和兇狠，促成了十五年來我們所未會建立起來的統一的人民戰線。那種癡狂，那些反動報紙和法西斯報紙唆使暴徒作惡的宣傳，他們帶着仇恨的叫罵，向着他們認為是流氓賤民的工人，向着共和，向着一切有良善和公正的地方攻擊，這也就把那些決心避免法國發生法西斯主義恥辱和恐怖的人們凝結成不可分的集團。

然而，法西斯力量的打擊終於把社會急進黨從台上打了下來，並且抬上了杜美格作內閣總理。凱利里歡喜的說「右派的企圖已經成功了」。

可是這種成功不過是「皮爾魯斯王的勝利」而已。二月六日的結果正同反動派的希望相反。從法西斯匪徒們所燃起的火災裏生出了一個新的東西。這個東西不是拉·洛克的專政，而是無產階級的團結，是人民戰線勝利的打敗了法西斯主義。

在共產黨首先的信號發出之後，工人們就無比英勇的站了起來。在二月六日就有二萬五千個工人攔住了法西斯匪徒前進之路。這個第一次的工人行動批准了一切希望，充份證實了共產黨的鑑定的正確，即是法西斯專政絕不是不可避免的道路。工人的統一戰線播種在反法西斯的鬥爭

裏。熟悉國際經驗的法國無產階級，表現出他毫無有損於革命的光榮傳統，而是巴黎公社戰士的眞正繼承人。

在拉·洛克上校挑釁的次日，共產黨號召巴黎無產階級起來反抗。二月九日，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五萬工人同警察打了五個鐘頭，從共和場到東車站一帶，到處喊着『建立蘇維埃！打倒法西斯！』的口號。許多社會黨工人接到警告之後，馬上離開家庭參加進來，同他們的共產黨弟兄們並肩作戰。在戰鬥地區的人民盡可能援助示威的戰士。法西斯暴徒們毀壞咖啡館，焚燒公共汽車，可是巴黎工人所想的只是忠實地完成他們那保衛自由的任務。

六個工人爲了阻撓法西斯的道路而倒下了。無產階級光榮英雄！在這前哨戰中，工人階級表示出他們能夠和知道如何鬥爭。打倒人民之子的槍聲，也就震起了大眾的一個沉重的反響。在戰士們死難的廣場上，成千累萬新的戰士們提起了他們的勇氣，挺起了他們的胸膛。不！法西斯主義絕不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東西。法西斯主義的失敗，是靠着無產階級戰鬥意志，他們的敏悟，他們的力量，尤其是他們的團結來決定的。法西斯失敗的造成者就是無產階級和中間各階級的聯合，這些中間階級的人們也是一樣感受在外國命令下行事的法國法西斯主義的威迫，威迫着他們的共和傳統，威迫着他們對和平的愛好，威迫着他們物質生活的享受。

共產黨員是站在鬥爭的最前列的。他們的勇敢和創見召來了人民的和無產階級力量的重新結

合，並且首先是召來了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總罷工的成功。

那一天，四百五十萬工人離開了工作。宛珊森林的大示威敲響了覺醒人民毅力的晨鐘。無產階級反攻的威力遠遠超過過法西斯同盟的突擊的威力。它告訴那些想勒死自由的劊子手們的是力量，勇敢和團結是屬於工人階級這一方面。勞動的法國，小民和誠實人民的法國站起來反對法西斯，反對貧困，反對戰爭。在鬥爭中加強了團結，這是勝利的保證。無產階級力量的分離已經告了終結。法國的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鼓勵之下，光榮的向全世界指出一種反野蠻法西斯和戰爭的新的鬥爭形式：在無產階級的周圍組織一個廣大的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線。

從一九三四年一月廿六到二月十日，蘇聯共產黨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

在會上，斯大林同志明確的有見識的說出：

『應當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不但只看作工人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示和替法西斯主義掃清了道路的社會民主叛變工人階級的結果。同時應當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看作資產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示，看作這樣的表示，就是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力量用舊有的議會制的方法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底方法來實行統治了。因此它就不不得不在對內政策上採用恐怖的對內方法，——就是說，應當看作這樣的表示，就是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力量找到在和平的對外政策基礎上擺脫現時狀況的那條出路，因此它就不不得採用戰爭的政策。』

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因此我們反對戰爭的鬥爭，也就成爲一個反法西斯主義，保衛民主自由的鬥爭。一切對於民主權利的損害，就是向法西斯主義走近一步。

情況是很明顯的：一方面，在世界危機的加深把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難以和解的鬥爭推向前進，沙文主義和備戰是對外政策的主要方法，另一方面，對工人階級的壓榨，在對內政策的基礎上建立恐怖政策，這是加強將來戰爭後方的必要方法。

那些無賴之徒的領導者們對民主的誹謗以及他們的武力政策，使我們決定我們的政策：我們應當保衛民主，領導小資產階級爲營救他們被威迫的自由，幫助和支持他們，號召無產階級注意自己本身的利益，同時注意到被大資本打擊和勒絞的中間階層。我們一面保衛着民主共和，同時保衛着無產階級已得的利益，允許他們獲得新的利益。

從一九三四年初間，我們就指出組織一個包括共和主義者，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無產階級和中間階級——的廣大的統一戰線是絕對必要的，這個統一戰線堅決的反對大資本，反對二百家以及他們的走狗。堵起法西斯主義的路，造成了我們的口號。

我想起統一行動公約簽字前的那個時期，就感到興奮。我們，共產黨的代表，唯一憂慮的只是解脫人民的危險，以及同我們兄弟黨團結的實現。我們每一次遇見社會黨內部對於團結統一表現同我們一樣興奮時，就感到高興。但是有些社會黨的領導者們却是另一種想法，想以條件爲藉

口來增加實現團結統一的障礙。

有人想以「最好」來反對「好」。他說「組織的統一，兩黨合成一黨，比在兩黨支持下所實行的行動的統一要更好些，因此我們要作組織上的統一。」我們冷靜的回答說，準備兩黨合併，和建立政治統一的最好辦法正就是行動的統一。

勞動者是追隨着我們。

我們曾經遇到不少反對我們的意見，有些是反對統一的，但是大部份是誠懇的希望統一的。同樣又有一種傾向，企圖把這個龐大的無產階級統一的問題，引導到一個狹小無意思的關於雙方爭論這問題的範圍裏去。這種精神狀態過去已經表現過，表現在簽定「不侵犯」條約的提議，這個提議使我們停止了談判。我們某些社會黨的同志們，在統一行動中，只看到我們停止對於他們黨的批評這點。我們曾經解釋說，這不是爲了包紮起自負心的傷痕，而是爲了組織工人階級反法西斯反戰的共同鬥爭，以及引導全體勞動人民參加這一鬥爭。我們提出簽定一個統一鬥爭的條約以代替那個「不侵略」條約。

在法國，共同行動漸次的組織了起來。二月十二日宛珊示威時幾萬個戰士胸中呼喊出來的「統一行動」這口號，在各省又喊了出來，在各地日益增加的一切工人示威中普遍的叫着，在各處只要有拉·洛克上校匪幫們召開那種挑釁的會議的地方，它就號召人民起來作戰，我決定作必

要的犧牲以除去橫在團結一道路上的切障礙物。

就是在這種精神之下，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在意佛里開了全國會議。我們只有一個思想：團結一。社會黨的領袖們說：『你們不要向我們黨員提出共同行動，你們向我們提好了。』我們回答說：『不要緊，我們再向你們提一次吧。』他們向我們說：『不要再批評我們了。』我們回答說：『好吧，我們以後只批評那些不重視統一行動的人們。』

有人說我們沒有誠意，爲了自私自利的目的，爲了要「拔雞的羽毛」。可是我們無懈的，明白的誠心，我們的堅持，我們爲無產階級基本利益的努力，終於漸漸的關起了謬蔑者的嘴巴。

我們懇切的堅決的要團結統一起來作反對法西斯主義，保衛人民安全的鬥爭。我在意佛里大會上喊出：『一切爲保證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

『從二月九日開始以來，流了我們十七位死難者血的鬥爭和戰鬥，只是開端而已。在「我們」同「法西斯主義」賽跑之中，資產階級想跑得更快一些。若是我們不能夠達到「更多，還要更多，永久更多的爲了統一戰線」，法西斯主義就會進攻工人階級。然而，我們是不願法西斯主義出現在法國的。』

……我們願以「一切代價」來行動。

我們願以「一切代價」來作統一的行動。

（見本人著「我們用統一的行動來戰勝法西斯主義！」）

在敵人已經打到門上的時候，還在討論、等待、建立的人們，使我們想起彼尙斯的理論家，在滅亡的前夕，還在那爭論着天使的性別問題……我們，無產者，有將來的階級，我們是不願像他們這一批人的！

賽納省和巴黎市區的社會黨黨部，首先批准了統一行動。畢竟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當布爾路的一家小飯店彭瓦萊裏，共產黨和社會黨簽定了統一行動公約。這在法國工人運動史上展開了一個新的時代。

統一戰線的成立，不但使法國無產者，同樣也使得各國的無產者，充滿了興奮。從簽字時起，我們共產黨人就這個統一鬥爭的公約，看為神聖的公約。我們同社會黨同志中間的親善是一個生動的事實，我們並且很高興的看到他們的成就。但是，若是說絕大多數的社會黨勞動者是對我們的親善回答以同樣的親善，那麼我們還應當注意到雙方的利益。

同社會黨所定的這個統一行動的公約，對於我們這並不是終結，而是一種開始。這是反法西斯大團結所不可少的條件。我們已經打下了工人階級統一的基地，可是還必須把我們的聯合擴大起來，把它伸展到中間階級，以保證法西斯主義的必敗。這就是同急進黨的羣衆以及同急進黨本身的聯合。

在意佛里大會上的報告裏，這還是在同社會黨尚未簽訂統一行動公約的時候，我就竭力的掃除足以使我們疏遠急進黨羣衆以及領袖的那些誤會。我們重視在法國造作的新的情況。我們說明我們共產黨的志願在於保衛民主的自由，保衛民主的共和，正如恩格斯和列寧所說的，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於無產階級，是個最好的政府形式」。我在十五個月不到的以前就在下議院說過而現在又重新提出說：「我們，共產黨人，我們愛我們的國家」，法蘭西，這個充滿革命和階級鬥爭的經典式的地方，人道主義和自由的搖籃，文化的永恆的發源地。問題並不是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中間選擇一個，而是在法西斯主義與民主兩者之間來選擇一個。

這些宣言在全國得到廣泛的響應，也就因爲有這樣廣泛的響應所以馬上就有人來破壞我們。在這以前，他們斥責我們的馬克斯、列寧主義。在意佛里會議之後，大家看到一幕可笑的戲劇：馬克斯、列寧主義突然得到許多意外的衛士來斥責我們，說我們是背叛了馬列主義的教言！我們，一樣的，是已存在的民主自由的堅決保衛者，同時也是我們政治理想的堅決保衛者，這理想就是要一個比現存的民主更完善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本身——這個完全的人民民主——我們認爲只是聖·尤斯特所說的話實行起來而已，他的話就是：「對於自由的暗殺者們是不能給予自由的！」

在爲民主自由的鬥爭中，是不能把我們同民主人民分離開的。應是相反的！我們責備他們的

只是一件：就是不够民主，不是永久的民主主義者。我們從未，現在也不向急進黨要求別的，而只要求急進主義者是急進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急進黨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前夕的十月間，我會兩次——九日在巴黎，廿四日在蒙特——提出團結在一個「爲工作、自由、和平的人民戰線裏。」這樣第一次提出一個引導法國人民走向勝利的公式。

也同和社會黨同志們建立統一戰線一樣，在建立人民戰線的努力中，我們也是遇到過許多困難。

大家知道，用許多力氣未能阻止共產黨社會黨組成統一戰線的資本寡頭，這時又努力於阻止人民戰線的組成了。他們知道，若認爲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與中間階級聯合的基本條件，那麼人民戰線的建立，不僅能够粉碎法西斯的浪潮，並且重開政治與社會進步的新世紀。

反動的理論家們，也同過去對社會黨一樣，這時找尋一切事物來恐嚇急進黨，使他們駭怕共產黨。他們向急進黨——也同過去向社會黨一樣——預言將來被侵蝕、削弱、分裂和死亡。

那些對赫里歐、達拉底、儒當、高特以及對整個急進黨污辱襲擊者們，在他們污辱的墨水尚未乾的二月六日的第二天，就給了急進黨一個嚴重的打擊，警告急進黨不能同共產黨「同流合污」。反動者用恐嚇用拍馬屁手段企圖拉住急進黨，或者至少挑起急進黨內部的分化。

我們是用一切力量來幫助破壞分裂者的陰謀。我們堅守不干涉人民戰線中各組織內政的信條。共產黨是這樣的真正為各民主政黨的團結和融洽而努力工作。

當人民戰線在地方選舉中大勝和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國慶日有歷史意義的大示威之後，寡頭和其代理人們還不解除武裝。他們說：『人民戰線能够在「反對」某些事物上組織起來，但是在「實現」某些事物上他就無法團結一致了。當他們要建立一個政綱的時候，也就是分離的時候。』一個不同主義學說的組織如社會黨，急進黨和共產黨，要想起草一個共同綱領，當然顯明地是很困難的，要是每黨都要求共同綱領就是黨的本身綱領，那麼這些困難是無法克服的。

共產黨是有它黨的綱領的。但是我們願意團結，並且我們知道團結是需要相互間的讓步的。有些人託辭批評我們「懦弱」「機會主義」。關於建立綱領，我們不願這個綱領是一個誘惑選民的諾言的總和，而應是一個可以兌現的契約。我們堅決反對欺騙政策，我們始終認為玩弄人民的希望是一種罪惡。

我們同樣竭力反對這種觀點：在總計劃上訂空泛內容時表示非常大胆，可是在別人提出具體要求時則成爲極端的懦怯者了。

那些在人民大會綱領訂立時用違反歷史和哲學的說法，來責備我們溫和的人，以後又因爲我們要求全部綱領規定的實現，而斥責我們太強硬了。

這個共同綱領規定了什麼呢？

首先它要求大赦，解除法西斯同盟的武力及其組織，廢止限制出版自由的不名譽的法律，規定和尊重一切工會權利。它號召人民組織和平，要求軍事工業收歸國營，在國際聯盟內實行國際合作，根據法蘇協定的原則，擴大訂立公開安全協定的制度。

關於經濟上的要求，人民戰線的綱領強調恢復被危機所破壞或削弱的勞動大眾的購買力，設立國家失業基金，減少每週工作時間，設立老年工作者養老金，實現大規模工程計劃；修改農產品價格，維持農業合作社；規定銀行業務，禁止退任及現任公務人員為公司董事；改訂法蘭西銀行章程，取消其顧問會議；審查軍火貿易，取銷流通證券的欺詐舞弊，實行身份證稅，控制資本外流並加嚴禁，實行民主的改革稅制（歲收在七萬五千佛郎以上的立即實行高過一般稅率的累進稅；改革遺產稅，對獨佔事業生產品實行課稅）。

這是綱領上重要的規定，對於這些規定，我們是絕對忠實的。我們認為，一九三六年五月的大選雖然獲得了勝利，但是這個綱領的全部規定離實現還很遙遠。

*

*

*

人民戰線是應有它的威權和光彩的，因為它包括着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而這些中間階級又是圍繞在統一的工人階級的周圍。

因此，我們經常的同時進行着雙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努力於擴大人民戰線，一方面努力於加強同社會黨同志的團結以鞏固和擴大工人階級的統一行動。我們不停的爲了同社會黨弟兄們完全統一而工作，爲了把兩黨統一在單一的工人階級政黨而工作。

兩黨統一的基本原則是什麼呢？法國工人大衆最堅決的信念就是它的基本原則。

工人大衆深切了解，德國無產階級的失敗，尤其是納粹專制政權的建立，責任是絕對在於社會民主黨退讓與放棄政策的執行。工人大衆是同情支持蘇維埃民主的，這個蘇維埃的民主，建起了社會主義並且勝利地繼續着十九世紀工人階級的偉大門爭，開闢着被壓迫人類的新生道路，從失敗的被歷史判決了的資產階級手裏拿過來那文化的火炬。最後，工人大衆接受建立一個在大家自願遵守和適合大家的紀律之下的民主的統一的工人政黨。

統一憲章的起草是能够並應當很快的，但是我們的社會黨領導同志們直到現在還不願在各組織內擴大討論，以及公開討論「統一委員會」這一問題。

*

*

*

長期以來，工銀勞動者中間一部份最明白的人已經加入工會。保衛工人階級集體的，物質的以及反僱主的精神利益，進行改善工人階級命運的總的行動，這都是工會的目的。它能够團結各種的工銀勞動者，不分政治意見和宗教信仰。

不幸的是在大戰之後不久，工會起了分裂，兩個工會分散了工人階級的影響。

我們共產黨是支持那些主張統一的，聯合的和自主的工會而努力的戰士們的。這一主張終於達到了目的：我們欣喜的看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廿七日的協議，一九三六年二月在杜魯斯召開的統一代表大會的決定，以及強大的單一總工會的組成，這一個工會現在有五百萬以上的會員。

總工會是工人階級的一個權威的保衛者，它建立起反法西斯鬥爭勝利的條件。

*

*

*

從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到二十五日，共產黨在維勒巴拿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這是一個有巨大歷史重要性的會議，因為它準備和保證了人民戰線在立法選舉中的勝利。

在這會上，我被委託作了我們活動的總報告。大家可以看見，在統一團結的大道上，獲得了決定性的進步。

一九三五年各地市議會選舉以及賽納省各區的選舉，已指明了民主力量的增長。在這次大會的時候，我們就可預看到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間大選的勝利。

法國各地代表都集中在這一大會上。這些都是共產黨的代表。正因如此，同時他們也都是曾經在本地為團結統一而作過強烈的堅韌鬥爭的戰士。

看到這些來自各省的法國人，使我連想到法國國民巨大財產的被資本寡頭獨佔，也就因此使

一個世界上最富最美的國家之一的法國，成爲歷迫代替自由，貧弱代替富強的國家了。

在十九世紀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建立起一個新的封建制度，這個金錢築成的封建制度，人數雖然比舊時封建地主少些，可是他們的權威更大了。資本家們吞沒了手工業，強大的資本家搶奪了弱小點的資本家。資本集中使得企業的數量減少，但加強了他們的權威和財產。最大一部份生產方式集中到幾個巨大的工廠裏，這幾個大工廠佔有着大量的勞動大眾。

因爲許多代法國工農勞動所聚結的財富，被最少數寄生蟲所佔有所自私的使用，所以法國人民受到失業，困苦和貧乏。

佔有無產者的資本家僱用工人來生產，不是爲滿足無產者自身需要而生產的，而是在微薄的工資條件下來生產大批使他們主人致富的商品。

主人，是那些人呢？

『法國現有五萬個股份公司，此外還有幾百家私人銀行和幾千個私人企業公司。』

『但是處於指揮中心地位的有多少呢？在金融界約有三十個公司，在鋼鐵工業方面也有三十個公司，煤礦和其他礦業有二十個公司，電氣業有三十個公司，保險業有二十個公司，化學製造業有十幾個公司，自來水和煤氣業有十幾個公司，以及若干大規模的鐵道水道運輸公司，總共是二百家，他們組成了財政寡頭，他們高高在上，他們插入和組織廣大的股份公

爾，團結廠主和大商人。

「在二百個特權公司的董事會裏，存在着二百個最大的股東；『統治着法國經濟和政治的，就是這二百家的領袖』（急進黨主席達拉第明確的指出了這點）。

『金融和工業之王們同時是四大銀行的董事：里昂信託銀行、總會銀行、工商信託銀行、貼現銀行。其中一半是法蘭西銀行的董事：鋼鐵工業協會的聖德·王戴爾；高班化學生產的德·瓦鳩埃；克蘭芒企業的杜色滿；化學生產的布朗克和底納東；製紙工業的達布萊。其他董事，除了三個政府的財政官而外（正副總裁），都是些世襲的大銀行老板，如：羅斯契爾德，豪坦格，馬萊，米拉布，德·奈弗里斯，以及新近的達衛·外爾，拉沙兄弟銀行。』馬萊，從拿破崙組織法蘭西銀行到現在就始終是董事會中的一員，已有一百三十五年了。豪坦格是從一八〇三年就作法蘭西銀行董事直到現在。

『法國在一百三十年中，經過三次革命，五次更換政治制度。但是經過了這種複雜的變亂，這種破敗與顛覆，可是金融權威的主人們，獨獨的毫未動搖，在所有制度的更遞中，繼續着資本的統治。

『法蘭西銀行十二個非政府派定的董事，本身也就是九十五個公司的董事，在這些公司裏，他們佔有一百五十個席位。這九十五個公司是：

共十一個私立銀行；

八個保險公司；

八個鐵道公司；

九個輪船公司；

七個鋼鐵公司；

六個電力公司；

八個礦公司；

十二個化學工業；

六個其他企業。

「整個資本主義在這裏有他的成就。當董事們會議時，他們的觸鬚伸到全國每個角落裏，沒有一點一滴的經濟活動逃出他們的統治和他們的注意。他們是國家的真正主人。他們批准或拒絕政府的借支，批准或拒絕對其他銀行或企業的信用貸款。他們預付或是拒絕政府債券。他們用手揉弄貨幣，保護佛郎或是玩弄佛郎把他抬高或是降低。他們的決定首先是爲了資本家企業，私人銀行，金融寡頭的利益的，因爲他們就是這些企業的代理人。」

「這種權威可使合法政府倒台以及強使政府聽命於他。它推翻政府，破壞人民公意。它

在法國人民的頭上放置為資本服務的政府。」（見本人著「法蘭西民族團結」）。

我們反法西斯鬥爭所贏得的也就是法國的前途。為了保證這個前途，我們應當團結全法國人民，來反對那些剝削他們的寡頭們。可憂慮的現象是生殖率的降低，它同樣的緊聯繫着資本主義制度：

「工人和農民所畏懼的，不是有些肥胖，強健和可愛的孩子，而是怕生出一些貧苦的生靈，這些小的生靈，也將同他們父母一樣過着一種漫長的悲慘日子，或是長到二十歲左右，會有一天去為了保護他們主人的錢櫃而戰死。」（見本人著「法蘭西民族團結」）

共產黨聲明反對貨幣緊縮政策和貨幣貶值政策，要求使富人拿出錢來，並且提議向大富翁徵收特種累進的財產稅：五十萬以上的徵收百分之三，一直到五千萬以上的徵收百分之二十。在為實行這種徵稅而進行必要的財產調查期間，我們主張對大量收入者馬上徵收一種額外利得稅。

因為雖然有那些豪富的辯護者和有關人的批評，但是法國仍然是這些豪富人們的！大公司的總帳上——多半是騙人的假帳——暴露出那些無恥的利潤，就是在幾年危機的過程中，也是一樣獲得很高的利潤。七個大生產和電力公司，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中獲得利潤十二萬九千六百萬。克爾芒企業在十年中獨賺了三萬萬一十八萬。

我們所提的這些辦法，已經是在其他國家裏實行着的。

對於有人認爲這些辦法太姑息了，我們可以用馬克斯所說的一段話告訴他們：

「累進稅不但是在現存的（或大或小的等級）生產關係下是資產階級可行的辦法，也是唯一可使資產階級社會中間階級依附於「公正的」共和制度的辦法，可使公共負擔減輕，可使資產階級大多數反共和的人們歸於失敗的辦法。」（見馬克斯「論法國階級鬥爭」）

最後，在報告中，我聲明我們，共產黨，國際主義者認爲我國過去的偉大是值得驕傲的，我們有一七九三年的偉大先人，有一八四八年二月和六月的戰士，有巴黎公社的英雄們，這都是值得我們驕傲的。我們歡呼我們光輝的過去。

我們向那些使我國強盛與光榮的農工大衆以及優秀的智識份子誠懇的致敬。

共產黨人告發和打擊那些毀壞民族遺產以及使我國衰弱的人們。因爲我們共產黨人是繼續着過去那些爲人道而鬥爭的先鋒們的路線的。

馬克斯主義的三個來源之一就是法國的社會主義。我們是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革命思想的，狄德羅·埃爾維梯尤·費爾巴哈等唯物主義的真正繼承人，至於衰落的資產階級，他們是自得於是博學的，愛美的舊制度下執樁子弟的後嗣，當他們不公開要求中古宗教上陶姆學說和愚民主義的時候。

爲了反對寄生蟲，反對叛徒，我們要求法蘭西民族的團結，真正的重新融洽起來。所謂法蘭

西民族，就是使人贊慕的法國人民，是養育着光榮的革命紀念，降生那遠大前途希望的無產階級，是農民大眾；他們是查克·崩鏘麥的子孫，在大革命時期，他們的祖先曾焚燒過公爵和子爵地主們的契約。

我們曾經從高伯朗茲儒民的後代和繼承者那裏，握取了馬賽曲。這個歌曲表露出一七九二年法國革命，雅可賓黨和濟隆德黨法國反帝王反封建的熱情。它是人民的革命意志，奮激和英雄氣概的火熱表現，它本身就是大革命。

最後，在檢查了黨內問題之後，我作報告書上鑑定：共產黨已滲在鬥爭之中。但是更應努力和更好的作去。它應當成爲一個羣衆的黨，人民的黨。我們熱望和預知會有如潮的新人入黨，因此選擇成爲一等重要問題。

『我們應該遵照什麼標準去選擇幹部呢？』

第一：對黨忠實。在戰鬥中，在監獄中，在實踐中證實了對工人階級事業的貢獻有深刻的誠意。

第二：同人民大眾有密切的聯繫。不是自稱爲理論家，但是是人民的領袖，熱誠羣衆並且是爲羣衆所認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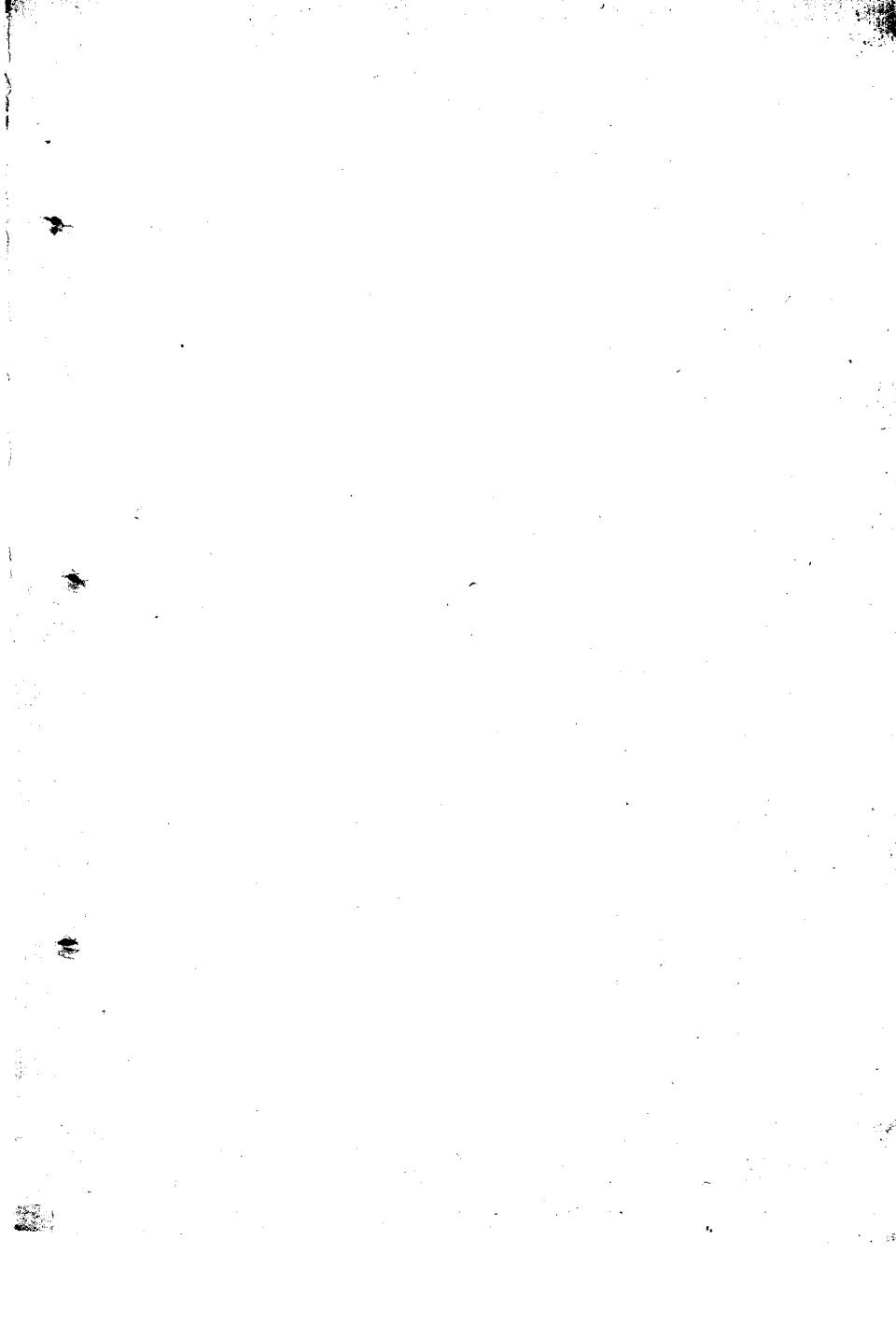
第三：有創造精神和責任心，在各種情形下有很快自己決定問題和決定方針的能力。

誰若是怕負責就不是一個領袖。沒有創造性就不是一個布爾塞維克。

第四：在對階級敵人鬥爭中，在同一一切歪曲馬列主義的鬥爭中，在堅決執行黨正式機構的一切決定中，都應有紀律精神和布爾塞維克的堅定性。

我用『自由，強盛，幸福的法蘭西萬歲！』這個口號來結束我的報告，這個口號是表現法國人民深切的願望，也是一切黨派企圖佔據的。但是在一切黨派中，只有我們的黨才能够把這個口號生動的實現起來。所以我們說：

『……共產黨希望什麼它就作什麼！』



第四章 人民戰線的勝利與罷工

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的晚上，這是立法選舉的前幾天，我在巴黎無線電台播音器的前面發表演講。一個國家的無線電台能够給共產黨使用，這還是第一次。

從巴黎到很遠的各地村鎮，許多各種身份的法國人都在聽。我們的激黨也都把火力集中起來射擊我們，因為他們知道我們的黨是鞏固人民戰線的士敏土，不是僅只爲了增加人民大眾的好奇心的。大家都想知道究竟我們是什麼樣的人以及我們的企圖是什麼，從維勒巴納代表大會之後三個月，新黨員的數目增到十萬。

黨中央委員會發表我發表一個呼籲法國人民和協的號召，這個號召是爲了打破狹隘範圍的選舉競爭而發的。我們要以『人類最純正崇高理想的擁護者』的面貌出現在全法國人民的面前。

我首先描畫出一幅金融寡頭與危機所造成的貧苦的由來，在這裏，物質和精神的困乏淹沒了法國的人民。工廠關閉、工人的失業、貧困、農業的破產、兒童的死亡、生育的減少、精神的受束縛、文化的衰落：一切都悲慘的顯現在我們的眼前，若是有有一種優良的社會組織很可能使一切法國人民幸福的生活在肥美的土地上，生活在優美自然或人民勞動所生產的大量財富裏。

以後，駁斥了那些無恥的謾謗，這種謾謗說我們是外國的代理人，縱然我們基本的關切點是在保證着我國的繁榮、尊嚴、偉大和將來。法國共產黨人是法國人，他們企望着把他們的祖國從破產與奴役之中拯救出來。法國人民曾經用過百年以上的反抗壓迫與反動的鬥爭代價來爭取和維持他們的自由，而法國共產黨人，正是這種人民的真正孩子。

『從中古時期的地方民兵解放和農民暴動到大革命，以後又有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人民起義，以及巴黎公社，這都是因為法國人民需要社會的正義和自由的緣故。』（本人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七日演講詞）

共產黨人承繼着組成法國民族歷史運命的光榮傳統，共產黨人要求那種曾經發生巨大影響的法國西思想：它深刻的普遍的影響到法國中古韻文體的通俗小說，影響文藝復興時代的偉大人道主義者，影響到阿伯萊和蒙泰涅，影響到莫里哀和拉·風泰納，影響到底德羅和伏爾泰，影響到巴爾扎克和雨果，影響到左拉和巴比塞，同樣的影響了許多熱愛人類的學者與藝人。

共產黨人宣稱：

『決定法國人民命運的，並非羅馬，也不是柏林，也不是其他外國的首都，同樣的也不是莫斯科（我們並不掩蓋起我們對蘇聯的深切的愛護），而是決定在巴黎。』（本人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演講詞）

最後，給了我們行動綱領一個結論：把一切爲外國法西斯主義服務的作亂的社團解除武裝和解散；團結一切和平的力量來打退戰爭；救濟不幸者並以向富戶抽稅的辦法來保護佛郎。結論是：

「天主教的工人、僱員、手工業者、農民們，我們向你伸出手來，我們非教徒，因爲你是我們的兄弟，因爲你是同我們一樣的，希望我們的國家免於破產與災禍。我們是偉大的共產黨，戰士們是忠誠與貧窮的，我們的名字從來沒有混在無恥事件一道過，並且賄賂貪污也不能打進我們隊伍裏的。我們是最純潔且有最崇高理想的人們，這是我們足以自豪的。」

我再提一提這些簡明而誠懇的大團結和協的號召發出之後，在無數的聽衆中所發生的影響如何，尤其是那些年來就反對我們的人們，他們那些人一向從我這裏聽到的不是關於團結而只是仇恨的喊叫，宗派的毫不相讓，嚴厲的駁斥！

影響是很大的，從各方面，從各政治集團，都發出興奮的稱贊。幕已開了：許多人都在自稱過去誤會了我們的目的和我們的辦法。

不久以後，在我收到上千封信的中間有一封布爾達尼地方火十字團員的來信，這個人是達姆鐵路上的老戰士，他向我寫道：

「要是共產黨是法國人的政黨，是尊重信仰自由的，行動要是實現性與建築性，給勞

動者以實際的地位，給法國以光榮和權威……那麼我們中間是毫無隔離的。」

許多天主教徒都同意共產黨的號召。我已在許多地方同他們合作了起來，同樣的同他們的神父們在失業工人救濟委員會裏合作了起來——雖然這樣在委員會裏受到一些職業宗派主義者們的反宗教的諷刺嘲笑。

關於宗教問題的爭吵時期已成過去。勞動者應當加緊團結以求在地上建築起幸福，而不應因為爭辯天上的天堂存在與否而分裂起來。在互相尊重對方的信仰與情感的基礎上，團結是能夠並且應當實現的。沒有一點理由使天主教的法國人跑到科布蘭茲叛徒們白旗之下的。因此我號召天主教徒的勞動者們同我們的黨員全力的合作起來：

「你們同我們一樣的是勞動者，是在同一的剝削和不公正的統治之下的。你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沒有理由分離開來，而應當努力的靠近。我們，共產黨人，我們向你們伸出手來。我們，在哲學上，是唯物主義者，並且不信宗教。你們是天主教徒，並且你們去做彌撒，你們不要要求我們成爲天主教徒，我們也不要要求你們不信宗教。可是我們要在爲我們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共同鬥爭中團結起來！」

「法西斯主義是一切民主自由的毀滅者，同時他也毀滅信仰自由。法西斯主義對於信仰，宗教的信仰認爲是一個多餘的部份，他們不理解它並且反對它。我們過去認爲，現在也

還認為：在法西斯專制，特別是希特勒的專制所挑起的虐待宗教的面前，在我們所保衛的民主自由中間，保衛信仰自由是應當放在第一位的。」

意佛里的本堂教士，在幾天之後，曾請求同我商談關於團結問題。我在意佛里市政廳裏接見了他。以後，又有一個青年神父在我們黨在尼斯所召集的公共集會上說了話。他接受我們共產黨人所伸向他們的手，並且樂意同一切良善的人們合作。

共產黨一面向天主教徒號召，同時它也轉向火十字團員和國民志願兵。

法西斯的宣傳是向着成見最深和本能最低的人們號召。它以最高尚的感情，最崇高的心願——如民族的感情，崇高純正的理想來投機。

那些法西斯份子們曾經徵募了一些誠心希望國家安全的人們。這些天真與誠實的法國人，並不會看出法西斯的領袖們是資本特權者的代理人 and 僱傭，他們也沒有看出這些人們也就是貪污事件的負責人和支持者，他們一面是貪污的負責和支持者，一面反而用欺騙的宣傳來表示他們反貪污的積極。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幾千誠實的人民被法西斯份子引誘去示威，反對斯達維斯基的貪污事件——這是無數貪污中被揭發了的一件而已。可是在那些惡劣牧人的鞭策之下，這些綿羊似的人們的憤激非但不去反對資本主義——這個貪污事件天然的永存的淵源——反而去反對共和反對國

會制度。那些天真與輕信別人的火十字團員們，他們知道嗎？那些要他們叫：『打倒強盜！』的闊人們是在欺騙他們，因為出錢維持他們的主人就是強盜。那些反對富豪和作惡的權威的人們，——這些可憐的小僱員們，被剝削者，中間階級的法國人們——他們知道嗎？汪戴爾先生，運動的出錢人和鼓動者之一，鋼鐵托拉斯最有錢有勢的主人，就是帶着火十字團十三號證章的團員。

法西斯主義只是口頭上談談民族團結，只是一個卑鄙的分裂陰謀者，因為它在挑撥法國人互相鬥爭，因為它是被外國人指使的，這在西班牙的悲劇中已是證實了的。

面對着法西斯的分裂者，我們提出的任務是：團結法蘭西民族，剷除他們領袖所欺騙他們的那種荒謬的觀念。我們應當認清一面是誠實和有品行的法國人，一面是那些領袖密津貼的法西斯領袖與希特勒走狗陶里奧等，這兩者是不可混為一談和相提並論的，前者之所以加入火十字團，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樣的工作是爲了降生一個清潔的法國，這個法國是洗去了資本主義污穢的，洗去了財政金融的無恥與欺詐的，洗去了政治上的欺騙的法國。我們應當向這些誠實的法國人指出，別人指使他們反對的人們正是同他們抱着同樣理想的人，指出那些指使他們反對自己弟兄的罪惡的主使者，正是想盡方法來阻礙他們的理想永不會實現的人們。

法西斯主義若在法國勝利，這就是勞動階級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被粉碎，這就是工銀勞動者的

飢餓，商人的破產和托拉斯的大獲利益，農民的貧困和土地的喪失。關於反法西斯主義和反二百家的鬥爭，法國共產黨號召勞動大眾在忠實執行人民戰線綱領中團結起來。

從四月二十四日第一個星期日的選舉中，大家已看得清清楚楚人民是向着左傾，人民戰線中的各黨大獲勝利。共產黨在一九三二年間獲票七十九萬，可是這次獲得了一百五十萬票。社會黨雖然經過「新社會黨」的分裂，還是維持他的原有地位，得票一百九十萬。第一次的選舉中（共分兩次）共產黨就選出了九位下議院議員。在意佛里·岫·賽納道的選舉中，我又被選為下議院議員，共產黨獲票一萬八千九百六十一票——在獲選人中得票最多。

無疑的，這種勝利的理由，不應該只是因為我黨總的政治路線的正確所招致的。同時因為選民們也看見了十一年以來握政的共產黨在意佛里·岫·賽納這個地方所作的工作，大家會把我們共產黨市長市議員們所作的行政工作同反動派握政的鄰近市區來比較一下的。我們並不是在雲端裏說空話，而是已經給了實證，確是在爲了人民的日常需要，以及爲了人民的將來而鬥爭。

一九三六年間，意佛里地方有三千個失業工人，佔了當地居民百分之六。我們市議會組織了一個人民食堂，在那裏供給他們有肉有蔬菜的伙食，大人只收半個佛郎，兒童減半收費。每天早晨，大家可以看見在意佛里的街道上，一些裝着牛奶的卡車送奶到失業工人的家裏；這是上好的牛奶，免費送給失業工人家裏兩歲以下的孩子們吃。

我們建築了三個長列的漂亮房子，很便宜的租給工人居住。共有一千個宿舍。我們開掘了四千二百公尺長的運河，建築了十公里的下水道。而也有二十五公里的大道被電燈照耀着了。

被現制度所拋棄的那些兒童們，使我非常擔憂。青年是我們最溫柔最美麗的希望，因此我們盡可能的幫助他們，努力於他們身體和智識的發展。我們爲小的孩子們建設了一所使他們快樂與健康的幼稚園。我們的「人民兒童暑期休養所」在吳昂附近的馬特地方有十八公畝的幽美場所；每天有五百個小學生在那裏住兩個月左右。他們可以在松柏的濃蔭之下，或是美麗的沙灘上遊戲和休養。我在短促的假期中，曾經去過幾次，我很歡喜滲在他們中間玩耍，由於我們這樣的努力，使他們比他們的父輩幸福得多了。

我們黨握政的維特里市政府在巴比戎地方，楓丹白露森林的邊上，建設了一個獨一無二的休養所。在最貧苦的工人家庭裏選三十五個不健康的孩子送到那裏休養三個月或是六個月。把那些在近郊工人區的狹小工房裏萎謝下去的孩子們，送到充滿陽光與新鮮空氣的地方去健壯起來。

意佛里和維特里以及其他共產黨握政市區（如維爾郁夫、蒙特依、阿爾否維爾、鮑比尼、阿浪德依維勒巴納等等）所作的這些例證，已足以駁斥那些罵我們是貧困的投機者的人們，而這些罵我們的人，正就是使幾百萬幾千萬人受苦難的負責者。我們看到在德國，那些法西斯份子正是努力利用危機犧牲者的失望作投機事業的傢伙。至於我們，我們要，就是在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

範圍內也是一樣，改善一切非特權者的人們的命運。當然，人道的完全受到尊重以及個人創造才能的無限制發展，都必需先結束人對人的剝削之後才能得到。可是，因為我們不是宿命論者，因為我們相信馬克斯所說「人們親手造成他們的歷史」的這句話，所以今後，我們所規定的任務是創造有更強健、更優秀、更堅強的身體與精神更健全的人。

意佛里共產黨握政的市政府，在那些忠實於我們理想的戰士們好心好意的指導之下，很謹慎的處理市的財政以增加本地勞動人民的物質利益。它找到了減輕市附加稅的辦法。它在地方的範圍裏來部份的試施我們「富人出錢」的口號。它是最先建立起本地工商業的累進稅，使得它的財政來源主要的放在意佛里的大企業身上。這是因為共產黨人不是只提出和供給方案的，他們是要把這些方案實施起來！

*

*

*

在第一次選舉的次日，四月二十七日，人道報就在報頭上大字標出「一切爲了人民戰線！」我們立即宣稱說：爲了粉碎反動勢力，我們不要使我們社會黨弟兄們和我們的急進黨朋友在選舉中損失一票。爲了奠定擁護人民戰線中各黨派紀律的基礎，三黨簽定了一個共同號召，代表急進黨的是達拉第，代表社會黨的是賽維拉，代表共產黨的是我。在我們政治局裏，我們毫不遲緩的考察每一不同環境中的情況。我們所作的決定充滿了粉碎分裂陰謀的堅決志願，這些分裂陰謀是

失望了的人民的敵人反人民戰線的陰謀。

我們的黨在第二次選舉中向社會黨讓出了一百四十個候選人，向急進黨讓出了一百，向社會主義者聯盟黨讓出了三十幾個。共產黨人也像平時一樣永久是忠誠於他們的諾言的。他們對法蘭西民族團結事業的無保留忠誠和不間息的努力是得到了報酬的。人民戰線獲得了巨大的勝利。

人民戰線中的各黨派在下議院裏共佔了三百七十五個議席。共產黨議員由十個增加到七十二個（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在聖德尼競選時，格爾尼又打敗了叛徒陶里奧，獲得一席，共七十三席），在這七十二人中間，差不多都是工人，只有七個農民，十個左右忠誠於工人階級事業的知識份子。在巴黎區，毫不誇張的說，成了一個真正的海嘯：巴黎市及其周圍的賽納省、賽納、奧瓦茲省、賽納。馬納省共是八十一個下議員議席，可是人民戰線佔了五十七個！

在北部，我們獲得了一大串的勝利。在馬賽，那些痛惡專橫腐化政權的市民們，鮮明的響應了黨的號召：我們獲得兩席。在瓦爾省和阿爾卑斯、馬里底墨省，我們的敵手會說在這些地方人民生活很好，共產主義絕對插不進來，可是共產黨獲得了四個議席，這表示出強烈的團結志願已把無產階級，農民和中間階級團結在人民戰線的大旗之下了。

幾天之後，我們中央委員會開會，國會黨團也參加了這個會議，這個會議是在意佛里市政廳的大廳裏開的。回憶一九三四年六月間我們在這同一會場開的全國會議，已是兩年前的事了，可

是就在那個會上決定了我們兩年來走向勝利的政治方針。

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我們分析了這次選舉勝利的意義說：

「法國人民已經表示出他們擁護和平的堅決意志，反抗使他們擔憂的希特勒的威迫；

「法國人民的志願是結束反民主自由的法西斯威迫；

「法國人民希望跳出經濟危機，保證大家有工作，富人出錢；

法國人民要求這一切都轉變過來。」

這些人民每一條纖維都連接在民主上面和渴望獨立自主，現在給了二月六日的挑戰者以嚴正的回答，並且表示出他們反對一切形式的法西斯專政。

但是這不是說完全沒有危險了！戰敗了的法西斯和二百家並未解除武裝，並且在暗中開始準備他們的復仇。在選舉的第二天，一個法西斯報紙說明反動勢力並不投降，它不願在人民面前低頭，它說：「我們前面的路程是艱苦的充滿着血腥的戰爭。」

五月六日，我們在互助廳招待新聞記者，杜科洛和我說明在參加政府問題上我黨的主張，說明我們並不反對參加政府。可是共產黨的參加政府，會被人民的敵人利用來作藉口以揭起瘋狂的進攻，以削弱人民戰線的力量。並且，保衛人民戰線的力量和繼續增強這種力量，是我們一切政策和決定的指南針。

共產黨只求和要堅持的是人民戰線的勝利，以及全部實行它的綱領。我們這樣說：

我們願意無保留支持民主與和平的一切力量，盡一切努力來改善勞動者的命運。我們在議會裏，在全國範圍裏盡力的支持政府來實行符合於選舉時所提出的政策。

我們相信工人階級將會完成它的歷史使命：把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但是現在我們不這樣作，現在要作的是實現一種符合於我國大多數人民需要和志願的政策。

人民大眾准許人民戰線組織和勝利：他們將監視着它來實施它的綱領。

五月二十五日的黨中央委員會會議同意了我們對記者的宣言，並且在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後不久，我們又肯定了這個宣言。我們聲明我們的意志是用「全力支持」來保證將來左派政府必要的協定，以便實施五百五十萬選民所批准的綱領。

當我們在互助廳對記者說明，若預算是符合於人民所同意的對內外政策的方針，那我是投信任票的，那時使得記者們大為驚異。許多記者沒有推測到在那一點上我們決定拋棄一切無價值的黨派成見，以及決定在為法國將來事業上負起合作的責任來。

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在比里耶會場上我們就會明白的說起：

「若是說在所謂民族同盟（右派反動的）與蘇維埃政權之間，沒有第三條路，那是不對的。」

兩者之間，還有人民政治是能够復活民主和轉變民主的。

當我們的社會黨同志佔重要位置的布魯姆內閣在二月六日的下議院出現的時候，我們重新以密切的莊嚴的合作來保證它實行人民戰線的綱領。杜科洛同志着重指出政府將會克服一切困難，因為它是握着人民授予的權威，並且有團結有組織的羣衆行動的有效支持乃是最大的保證。

同時配合着新政府上台的，是巨大的勞動者團結運動，這是勞動者在選舉勝利時的興奮所引起的，而這個選舉的勝利，使勞動者認識了自己的力量。

到處發出同樣的基本要求：調整和增加工資，承認工會和工人代表的權利，訂立工廠勞資合同，以同一地區的和同一工業部門的勞資間的集體合同，實行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假期照發工資。這是工人階級所展開的一個巨大的戰爭。

在兩星期不到的時間內，劇烈的罷工普遍全國。鬥爭採取了新的形式：它發展到極有紀律和秩序的佔據工廠（罷工者集體的留在廠內不出來，直等到勝利為止）。

這是長年來苦痛和積憤的總爆發。在過去的中長期工資是一天一天的可憐下去，大企業中的工作條件一天一天的不人道起來，廠主一天一天的惡狠起來，工會權利的行使漸漸的不可能了。

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工資從一千一百五十萬萬減少到九百三十萬萬。這種百分之二十五的減少工資，以及廠主的橫暴；失業，把工會權利踏在腳下，差不多普遍的沒有集體契約，

社會立法比許多別國都遲，沉重的負擔加在勞動者的肩上，這一切使得法國工人的生活極端困苦。在一九三四年，五百五十萬被迫參加社會保險的工人，他們一年的工資並沒有超過一萬八千佛郎的。其中百分之六五·六六的工人全年工資是在九千六百佛郎以下，百分之三三·四八的工人每天只賺到二十到三十二個佛郎。

在罷工的時期中，紅旗和三色旗如同花錦一般的插遍在一些工廠的大門上、屋頂上、烟囪頂上和看台上，在罷工的集會中顯示出工人階級驚人的政治理解力。

到處秩序井然。沒有發生一點嚴重意外。沒有一個挑釁者可以溜進工廠。大家一點也不碰一種機器和生產品，把它預防得好好的，保持它原來的清潔。這樣的有理智，這樣值得尊敬，男工和女工，老人和青年，穿藍布工裝的和帶硬領的被剝削者，粗工和技工，都團結在一起，一樣的冷靜，這一切產生出一種老成和有潛伏性的印象，它首先壓在大廠主的心上。

大廠主們於是暴烈地攻擊說罷工者在「破壞所有權」——之後，這也就引起中間階級的恐懼。可是工人們一點也沒有想去反對他們廠主的所有「權」。

我們共產黨人常常解釋說我們不是一切所有權的敵人。在我們給急進黨的一封信裏，說明我們同意貝勒當和赫里歐的黨，認為應當「尊重勞動和積蓄所結成的私有財產」。我們反對唯一的特權，就是那容許極少數寄生蟲剝削幾百萬人民以及強佔民族財富的特權。

並不是共產主義沒收了農民的土地和商人的店舖，並不是共產主義使得無法與托拉斯競爭中的小工業破產，並不是共產主義燃起階級鬥爭的火來；而是資本主義毀壞了小民的財產以便佔有，而是資本主義以廉價收買無產階級的勞動力並且把強制和壓迫工具壓在他們身上。戰爭、經濟危機、失業、沒收和毀壞中間階級財產的都是我們。招致這些不幸的，乃是太生產手段的私有，它在被鼓勵之後變成了經濟生活和進步的障礙物了。

若是要想安置經濟合理化的基石，那麼只有大生產手段的所有權社會化。農業、商業和工業的小有產者以及社會所有產之間的關係，他們間合作的具體方式，將被新世界總利益中的利益有關者們所決定和調整。

在六月七日到十四日這個星期中，罷工運動達到了它的頂點。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大有成爲瘋癲的危險，新的警告者們在鄉間散佈着憂慮的種子。雖然馬底農決定在六月七日經過工人階級代表和廠主們代表簽了字，可是有許多僱主們拒絕同他們的工人們訂立合同。曾有過幾次警察的無理干涉，有些僞善的託洛斯基份子和火十字份子的鑽進運動中來，他們是企圖以血腥的衝突來破壞，至少是分裂這個運動。

我們黨以全力支持罷工，黨的戰士們費了一切精力。黨握政的那些市政府，黨的一切組織，都完全聽命於領導龐大勞動隊伍的重新統一了的工會。

這種烈火般的同情，引起我們應當担负起新的責任來。若是出現了一種破壞組織和破壞秩序，就有分離人民戰線和喪失信用的危險。無疑的，無產階級是準備前進得更遠一些。但是，它這時單獨的前進太遠，不會脫離了人民的隊伍嗎？

這時，我們回想到一八四八年六月和一八七一年五月法國勞動大眾的悲痛經驗了。

七月的君主政體是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間被推翻了。它被巴黎無產階級和中小資產階級的聯盟所推翻的，當時的中小資產階級是被工業危機所打擊着，並且一步一步的被迫着他就能於金融的統制之下。

當着銀行家們，用各種方法和行動，達成他號召農民和店家來反對他們認為是無鑿足的投機者工人的時候，可是那些以無產階級名義講話的人們乃以幻景來催眠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以『秩序』，以『工人行動違犯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為藉口，達成了他粉碎無產階級的企圖，——這個在六月恐怖的過程中心人民切斷了的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在掃清了地上的障礙之後，又進攻人民所爭來的一切共和權利，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侖於是在民主的廢墟上建立起帝權來了。

『二月共和資產階級爲了聯合無產階級進行反王室的戰爭而向社會主義者讓步，它同樣必需進行第二次戰爭，以便共和解脫它對社會主義者的讓步，以使資產階級更顯著的公開掌

「握政權。」（馬克斯「法國的階級鬥爭」）

這個資產階級反動的共和，是從被粉碎的工人中生出來的，它準備了和引導了第二帝國的出現，是很自然的事。

在一八七一年三月的巴黎公社，也是因為離開了法國農民階級把自己孤立了起來。它的英勇戰士，被那些被人煽動來反對大城市中「其他人之產者」的「鄉村」隊所屠殺了。然而公社有充分理由向農民說「它的勝利就是農民的唯一願望。」可是他們沒有懂得這個真理。馬克斯曾經預見到這種危險，他爲了保衛巴黎工人而反對不成熟的行動，可是，當在起義爆發了之後，他從起義開始的第一點鐘起就以全副的心靈擁護公社的英雄們，這些翻天覆地的偉大戰士，他並且向那血寫的紀戰詩篇致敬說：

「多麼輕捷，多麼有歷史創造性，多麼大的犧牲精神，這些巴黎人！」（見馬克斯給顧格曼的信。）

並且，被反動派打擊的民主，還在多期的復元和覺醒中，——反動會屠殺了四萬工人，四萬法國勞動階級的精英。

無論如何，我們共產黨人絕不以無產階級和民主爲賭注，我們計算着工人的每一滴血，計算着法國的前途，我們不願意讓過去那種情況的再度出現。我們不讓無產階級遭遇到送給敵人兇手

解除武裝的危險。我們警惕着列寧的教訓：要有忍耐力，就是對正當的問題也是一樣。我們記住了『左派幼稚病』上面給我們的教言，以及列寧在一九二〇年給法國工人的信上面的句子：

『在法國常常發生很多不幸的，就是無政府主義的誇張。』

六月十一日星期四的晚上，在熱狂的巴黎，波動着一個惡意的謠傳，我們於是召集巴黎區共產黨員開了一個報告大會。

許多聽衆都是幾天幾夜不曾睡眠的守在工廠周圍的人們！這些青年五金工人，第一次處在與敵對壘的境況中並且兩星期以來參加在戰鬥裏面，他們青年的熱烈的心能不相信起義的時鐘已經響了嗎？

我們，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工人階級的參謀，不是政治的冒險家，我們判斷事物是根據實際，而不是根據我們的願望。欺騙是會把工人引到悲慘的境地的。可是人民戰線，就是規則，就是有組織的在和平中的進步，就是大眾所強要的社會和平，就是回到繁榮。

在衡量了字句之後，我以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斷然的宣稱：

『若是說很好的領導一個要求運動是很重要的話，那麼它也就應當知道如何結束一個運動。奪取政權這不是現在的問題。』

『現在要獲得滿足的是經濟性質的要求，同時漸進的在他們的認識上和組織上來提高羣

衆運動；在獲得了滿足之後就應當知道結束它。同樣，應當同意於仲裁契約，雖然全部要求尚未一一接受，但是基本的主要的要求已被接受。我們應當懂得組織和準備將來……」

我申論着我的論點，我敘述說，許多同情我們的小商人來向我們表示他們對於運貨汽車司機罷工的恐懼。他們同意五金工人的罷工，但是等到他們的親友們的食品受了威迫的時候，他們就不再同意了……有些易於腐壞的商品長期的留在車站上，有些南方的小農打電報給我們說：『你們就這樣讓我們的櫻桃腐爛掉嗎？』……有些職員們向工會戰士們說他們這羣人非常反對咖啡店茶房的罷工……

『同志們，我們不應踏上破壞羣衆的凝結，破壞人民戰線凝結的危險。我們不要讓別人把工人階級孤立起來！』

國際歌的聲音，表示了聽衆向這個結論的敬意。

過去無產者們自問：『我們向那裏走？共產黨人要幹些什麼呢？』現在可清楚了。人民的敵人將不再能碰一碰人民戰線了。

我們英明的政策很快的獲得了它的結果。集體合同訂立了許多，許多工人從他們所佔據的工廠中有秩序的，歡欣的開始退出。

工人們懂得爲什麼他們不比全體人民前進得更快些。我們領導羣衆走向更好的將來的能力獲

得了明證，這種領導是妥當的、穩當的，不冒險、不欺騙、不給分裂陰謀者一點可乘的空隙。

我們很多次的反對左的浮華的空談，這種空談反映着過激的個人的無忍耐力，並且只會使得人民大眾鬥爭戰線更加縮小。我們會經上百次的說明人民戰線並不是革命，也不是通常選舉的合作，而是在共和設施的境域裏實施一種巨大的進步政策的可能性，——一種可能給社會大部份階層帶來明確成果的政策。

我們是現實主義者，所要求的只是當時條件所可能作得到的，這樣可以更多的要求而且可以更妥當的獲得，但是我們的要求是強有力的。徐爾·蓋斯德不是說過嗎：『真正公共安寧可與現存秩序共存。』

當我們宣稱『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的時候，我們留心的反對那些會帶來悲劇信號的誇張的幻想。向那些希望摘下月亮的人們，我們要求他們單純的誠實的幫助我們實行共同的綱領，實行整個的綱領。我們努力的在各種情況下遵守着我們的諾言，從不忘記爲了打擊法西斯主義就必要更大的團結人民。

我們在六月動亂期中勇敢和明確的態度，使得黨的信仰倍增。入黨的新黨員一天達到一千五百個人。中間階級可以辨別得出我們主張團結及共和秩序的戰士與那些二月六日燒汽車的內戰製造者的不同。有些人常說共產黨在準備血腥的暴動，可是急進黨人和阿爾貝·貝耶回答他們說，

他們已經懂得辨別『自由的衛士共產黨人與這種自由的死敵法西斯黨人之間的不同了』。

國會終於認可了無產階級可鑑定的利益：每星期四十小時工作制，假期照付工資，等等。這時發生的問題就是要使得國家和法國經濟在『消化』這些改善的時候，不要使中間階級——手工業者、小商人、小生產主——受到損失。工人階級所爭得的利益應由二百家付出，並且無論如何不能允許大廠主和勞動大眾在新的立法上得到利益，而讓中間階層支付出新立法的費用。

一九三六年五月勝利的第二天，舉行了許多次人民的大示威遊行。我們發起紀念羅熱·德里斯（馬賽曲作者）的一百週年忌辰。這些紀念會在普萊耶大廳和孚瓦西·勒·吳瓦，這是我們握政的市裏，也是這位音樂家軍佐養老的地方。

我會指出：

『馬賽曲，它是法國人民的天才，它在法國最純潔地發着它光榮的光芒，它是同情自由事業的深刻表現，是同情世界和平的深刻表現。』

此外，我們黨繼承着最優良的共和傳統，它表現出它是一七九二年雅可賓黨人的正當繼承者。它同祖國的那些偉大服務者一樣，是一個羣衆反抗特權和現代暴君，保衛整個和不可分的共和的組織者。

羅熱·德里斯勒作的自由歌曲馬賽曲，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法國國慶日）受到了新

的崇敬。近郊的巴黎，巴黎近郊的人民在上午開軍的時候（這是有它新意義的軍隊）很感動的聽到它。在下午，它伴着國際歌，伴着從巴斯蒂廣場游行到民族廣場的近百萬人的脚步聲音。

第三共和的歷史充滿着那些最反動者陰謀侵奪國家軍隊領導的事蹟。德來斐斯事件不過只是佔有者和人民之間爲了管制軍隊參謀部門爭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反憲法派以詭計來利用布朗采將軍，使得共和險遭顛覆。這些難道還不足以使我們時時警惕的嗎？

共產黨認爲軍隊應當是真正爲了保證在國際法西斯威迫下國家的安全的。應當是爲了粉碎法蘭西民主的敵人在國外所準備的進攻的，而不應當成爲那些附屬外敵的國內反民族獨立者的勝利品。共和的軍隊，根據若斯很好的說法，應是『與民族結成一體』，不能成爲一黨的私物。軍隊，從哨兵到最高軍事會議，都應該是與人民密切的聯繫着，與人民的一些巨大的組織和人民的理想密切的聯繫着。這樣，只有這樣，它的戰鬥力才會大，才會是不可克服的軍隊。

在這種精神之下，我們的戰士和巴黎的勞動人民去向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國慶日）上午在尚榭·里賽大街上受檢閱的軍隊致敬。大家喊着：『共和的軍隊萬歲！人民的軍隊萬歲！』我們看到我們的士兵和共和的軍官們眼裏射出喜悅的光芒來，而這些士兵們非常經常的被他們反動領袖們所迫害，這些共和軍官們也被那些作亂的黨徒們所憤恨所輕視。人民找到了他的軍隊，軍隊因爲同人民靠近受了人民團結的感動而自己感覺到自身偉大起來。

有些人在嘲笑我們的「新愛國主義」。這是那些一向就在報紙上玩外國把戲的傢伙，他們準備把他們的國家送到希特勒的統制之下，準備犧牲法國利益，以保存他們的特權。我們的愛國，是愛它那最光榮傳統以及它那最偉大的願望，是希望給它以掌握火炬者的光榮身份。我們的愛國，是愛它的人民，我們要使人民自由和幸福，是要法國屬於法國人，而不是把它屬於那些自私、貪婪、卑污、作惡的，久已被民族大集團所鄙棄的極少數目的寄生蟲們！

貧民的愛國主義、被國王拋棄、被教會燒死的法國農婦貞德的愛國主義，像一堆火光一樣，穿過我們整個歷史，並且標誌着我國人民解放的每個階段——這個法國人民的解放將帶來整個世界的解放。

「灌木」（指主權或共和）俯視着農奴的貧苦命運寫道：

「在專制的下面沒有一點祖國可言，代替祖國的是別的東西：王侯的利益、光榮和對人
民奴役。」

法國大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獲得了他們的祖國，他們愛這個祖國。「苦力和勞動者們的混合隊伍」在喊着「民族萬歲」聲中打勝了瓦爾米之戰（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打敗普魯士侵略軍），他們是被革命的愛國主義所鼓舞起來的。

我們是民族大集團的最純潔的服務者，在這樣的意義之下，我們為它提出辦法以保證它的物

質上和精神上的偉大。會有一個青年選民在一九三六年選舉之後寫信給我說：『我投共產黨的票是因爲我愛法蘭西。』他是明白了只有我們可以使法蘭西以自由。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國慶節的大示威，我們看到一些新的階級參加到選舉勝利後的人民戰線隊伍中來了。對這點我們深切的高興。保衛民主與和平的陣營是不應時時擴大嗎？爲了無情的反對人民的敵人，我們不拒絕每一個會受敵人欺騙而現在來歸我們的份子。關於這些，我在一九三六年七月間以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在阿眠就說過了。我會指明沒有必要去喊着要反對那沒有舉起拳頭的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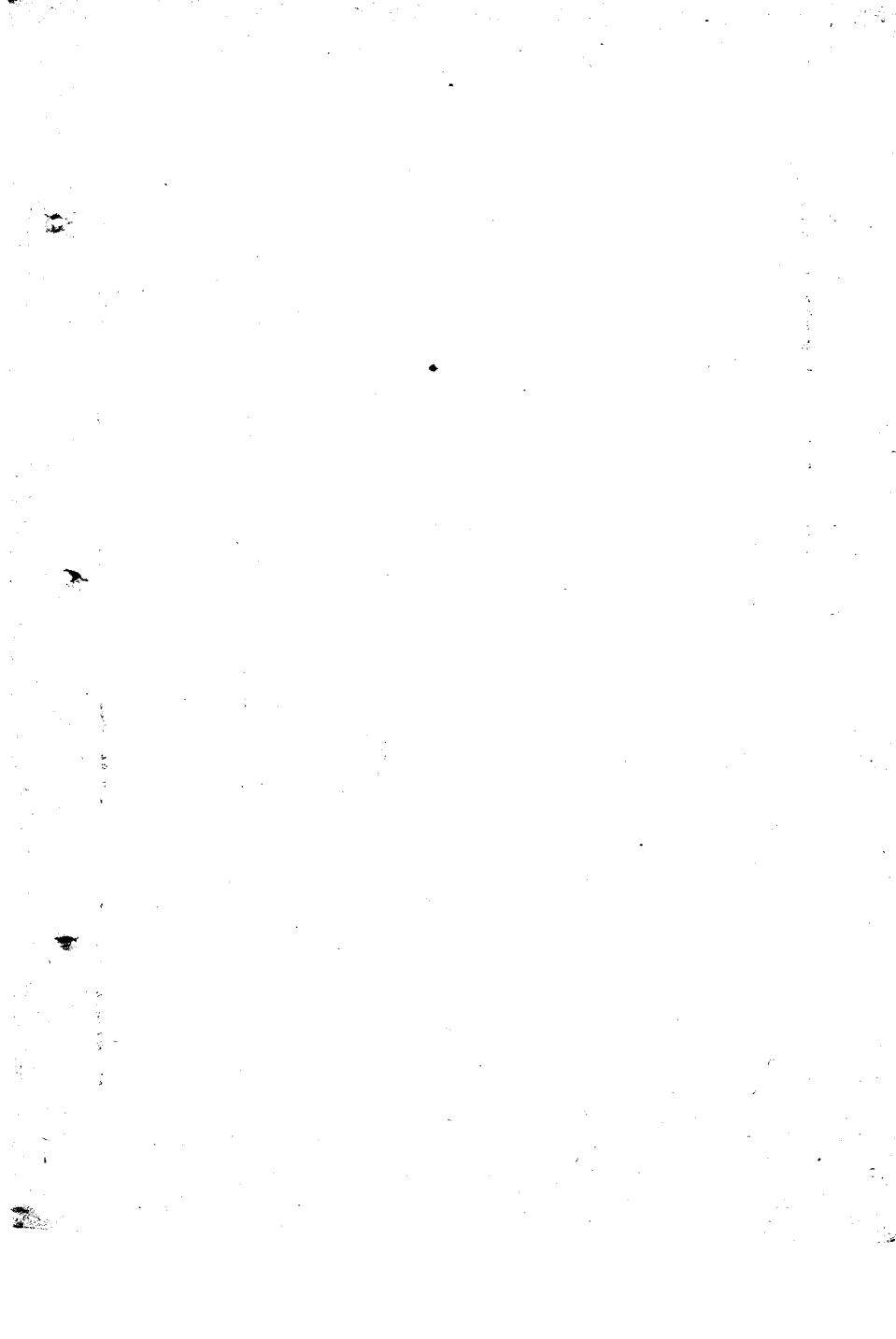
『首先，因爲這不是必需的——就我個人說，我從未舉起拳頭過——我認爲表示我政策的最好姿勢，乃是把手伸給法國人民。』

在我們的身邊是有位置給那些願爲國家繁榮而工作的人們的。我們沒有別野心，只有引導他們向着共同目標的志願：使得在今天被壓迫和被剝奪的人類個性完全開放起來。我們人民戰線的發動者和戰鬥者們，對於戰士並不抱着別的願望，只希望他們都是一些最忠誠於公共事業的戰士。

我們的格言是簡單而明確的：『一切爲了人民，一切經過人民。一切爲了人民戰線，一切經過人民戰線。』我們唯一的最高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我們願意同人民遵循着它而前進，走向官

裕、幸福與進步！

但是在前進中，我們不要忘了組織和紀律的基本作用——它會使一九三六年六月顯著的和平勝利獲得可能。我們極其當心的防範，不要有什麼事物分裂那曾經使我們獲得勝利的力量的團結，不要有什麼事物切斷我們戰鬥陣線的連續。我們在這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戰鬥之一的戰鬥中間，同樣的知道一切踏步不前的舉動，都有轉變成退却的危險。



第五章 忠誠於綱領

一九三六年六月間要求的勝利獲得，顯著地改善了工人的條件，更大的保障了他們的安寧，因為獲得新的假期，使他們可能充份享受家庭的快樂，提高了他們的自尊心以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

文化的飛進又可增加社會的進步。每週四小時工作制，假期照付工資，這都便利了工人的體育運動和創立人民的旅行，俱樂部、會社、學校增加了，各種節日的慶祝有了組織，人民大劇院又出現了。

可是反動勢力並未投降，它仍然加力於破壞人民戰線的行動。它反抗增加工資，它繼續開除工人，挑起罷工，或是關廠。它向政府進行真正的恐嚇，並且成爲財政上的困難，使得法國人民所等待實行的、綱領上所寫出的那些改革計劃被放棄或是延期實行。

當然，我們也作了不少事情。如打擊公務員、公共機關勞動者和退伍軍人的不公平法令取消了。更寬的開放信用貸款以援助小商人。爲農民創立了國家糧麥局以保證麥價的穩定，在一九三六到三七年平均麥價定爲一百十六佛郎五十公斤，一九三七到三八年最低價格定爲一百八十佛

郎，而在賴伐爾握政時麥價是七十佛郎甚至於六十佛郎。可是所作的這些還是不夠的。

小商人、手工業者們還在等待着調整公債和稅額，減低房屋租金，審訂商業庫券。農民們在要求解決農業公債問題，耕地所有權的建立，租佃關係的規定，建立了救濟農災的保險基金，訂立了出賣農產物的集體合同。

農民、小商人和手工業者要求着家庭扶助金。他們和工人一同要求人民戰線已允許的老年人員養老金，這些老人有的已供獻了他們半世紀的生存來生產國家財富，並且可憐的同時也給剝削他們的人的生產了財富。

在巴黎，在冬季賽車場，在聖·埃底安，在全國各地，在驚人的大示威中，我們都曾經提到老年人的不幸，堅決要求這個忘恩負義的社會節省一點浪費給他們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及結束他們這種可怖的貧乏。共產黨為老年勞動者正當的要求作熱烈的鬥爭，贏得了他們內心的感謝。黨在總工會同意之下提出下列的口號：『給老年養老金，給青年工作！』

失業者仍在等待着國家失業救濟金的設立。

建築工人聯合會和總工會還不會能够把巨大建設工程的計劃實行起來，這種計劃的實行，一方面可以減少日在增加的失業工人，一方面給步法遲慢的經濟復興以決定性的刺激。巨大建設工程計劃是符合工人利益的，它可使失業者重新獲得工作，它是符合農民利益的，因為農民正是需

要道路，灌溉工程和掌握水利，電汽化等等。它是符合法國利益的，因為它會建造出新的電汽站，汽車路和運河，——其中最要最急迫的是溝通兩個大海的運河，它把大西洋和地中海連了起來，使馬賽更接近紐約和英國，還有法國北部的運河，它刺激我們富庶的佛郎德區工商業的繁榮。這一切都是共產黨所堅決主張的。

要實現這種人民戰線綱領上所寫着的和我們所忠誠擁護的革新計劃，錢將從何而來呢？

一九二六年的「左翼集團」（社會黨和社會急進黨組成的，沒有共產黨參加），曾經在「金融壁壘」前面被碰倒過。現在的反動者又計算以財政的暗礁，來碰沉這艘載着人民戰線希望的輪船！

在經濟戰的前線上，資本家已經獲得了許多勝利：首先是一九三六年九月的佛郎貶值，這是政府所採取的財政辦法，於是給了相反的保證，這是違反我們共產黨人的志願，我們曾經加以反對。其次是「暫停」，停止了工人階級的前進，因此也就便利了托拉斯的反攻。最後是一九三七年六月又一次的佛郎貶值，這也同第一次貶值一樣，使得無產階級失去了一九三六年六月所獲得的利益的部份。

寡頭們的反抗在蔭影中進行着，並且他們用財政的恐嚇威脅，來使他對方的一切政治構成都歸於失敗，一個又一個的推翻對方的內閣，一直到那些忠實於他們污穢利益的人員登台為止。可

是這樣是否可以說是必然的呢？人民最壯大的進展碰到寡頭的抵抗時就會被碰得粉碎了嗎？

共產黨毅然決然的回答說：不是！

*

*

*

財政上的虧空在法國是一個新的現象嗎？

讓我們引一段在上議院反對布魯姆內閣政策最烈的卡意倭的話來看看吧：

『法國財政，一向總是糟糕的。大革命前舊制度下的財政管理者，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後的財政部長，也都像現代的財政部長一樣，都是受着國家龐大用費的累迫。前幾世紀的財政虧空，十八世紀的財政虧空，一直延長到一八一五年。從一八三九年到一八七六年，從來沒有一次國家預算是收支平衡過的。』

一九三七年的預算上的收入是四百八十萬萬，而總支出（包括庫存）達到八百萬萬。

一年八百萬萬是用在什麼上面去了？我們可以把用項分成四部來看：

公債的年息.....	二一・三〇%
終身恩俸公債.....	二〇・三二%
軍備.....	二六・九五%
行政和社會行政.....	三一・四三%

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和戰後的國家借款，使公債的增加到現在已達四千五百萬萬。這筆龐大債務的未付清的數目，年年寫到預算上面。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支出是被這種付款所吞食了去，（付這筆款子的是現在勞動和過去的創造者們啊。）

借債嗎？這種意義就是把要填起來的溝渠更挖深些。並且，那些資本家是不肯借款給人民戰線的政府的，他們寧願把資本送到外國去，以及用在國家通貨衰落中來投機，在國家破產的廢墟上來尋找更多的財富。

金庫漸漸的更多付出，資本逃遁外國，隨着國庫的危機而馬上來的是佛郎的危機。金庫爲支付到期的債務而要流出，可是爲了匯兌平衡基金又不應大批拋出黃金。

人民戰線曾經趕走法蘭西銀行的董事，使這個銀行爲國家而服務，但是它不會粉碎大金融集團的反抗。這些大金融集團仍然繼續着他對國家的壓力，統制着信用和儲蓄，引起政府黃金的流出，這種流出也就牽累着國家對外信用的降低。

佛郎貶值只是有利於富豪，有利於那些把金銀逃遁到外國的人們。

因佛郎貶值而使這個國家債務人的負擔減輕了，可是因爲用費的繼續增大和預算的虧空，使得這種減輕成爲相對而又無穩定性的東西。在收支的賬上仍然是虧空。在國內市場上，物價大爲增高，使得工人階級先因增加工資而得的利益，又失去了一部份。逃到外國的資本，本來應當

在貶值之後重新回來利用佛郎新舊市價的不同而獲利的，可是仍然留在外國未回來，這是因為貨幣不穩定的大門已開，他們繼續等待着更大的貶值或是膨脹以便多得利益。資本存留在市場是非常之少，利息率並未降低。

對於大銀行家所強制實行的政策（以前的緊縮政策和現在的貶價政策，都是要勞動階級出錢的政策），共產黨的回答也是今昔一樣的提出：『應當使富豪出錢！』

使富豪出錢這是能够並且應當辦到的，只要實行起人民戰線的財政綱領就成了。我們不妨重新回憶一下這個值得誇耀的綱領：

『實行民主的改革稅制，減輕人民賦稅負擔以促成經濟的復興，用富人出錢的辦法以增加稅源（歲收在七萬五千佛郎以上的立即實行高過一般稅率的累進稅——改革遺產稅——對獨佔事業利潤實行課稅，同時避免它把損失轉嫁到消費品的價格上去）。

『取締關於流通證券的一切欺詐舞弊，由上下議院通過實行納稅證，同時決定豁免某些賦稅。

控制資本外流並對有意走私者嚴加制裁，以至沒收他匿藏在外國的財產，或者沒收他在國內同等價值的財產。』

共產黨曾經提出它對財政問題的解決方案。在選舉以前它就要求實行一種民主稅收改革，目

的在增加國家的收入，但不是使勞動大眾付出；它着重的指出在法國的情況之下，採用英國的所得稅是很必要的。

勞合·喬治對於這種所得稅稱之謂『英國財政制度的中心和最後希望』，它是非常健全與堅固。在法國，所得稅佔預算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可是在英國佔了百分之四十。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戰時期中，法國財政百分之八十四是依賴借債，只有百分之十六是靠稅收，這樣把一個沉重的抵押壓在將來的肩上，至於英國，它的戰費百分之二十八是靠稅收，百分之七十二是靠借款。每次有特殊的負擔時，英國總是有計劃的提高所得稅率，至於法國總是求救於東扯西拉這種辦法。

英國所得稅的兩個特徵是：

一、低下層的大量減稅，大量收入的人課以重稅；二、用些有效的辦法以防走私漏稅，收所得稅到出貨地方收，到銀行收（當它出息票的時候），收房租所得稅到家裏去收，等等。

共產黨反對增加間接稅，這種稅是盲目的，因為被抽的是消費者，這是不公平的，因為它特別損害小民，並且把窮人與富人放在同一尺度上。

共產黨要求增加實收入的直接稅，辦法是重建一般的所得稅並且向大資本家的公司抽以苛重的利得稅。

若是實現這些辦法還不足平衡預算——預算必需平衡起來——共產黨提議向大財富預收一種非常捐稅。共產黨（同總工會，同社會黨，同已把這種辦法寫在它的綱領上的急進黨）要求把那些保險公司收歸國營，這些公司管理着價值一百五十萬萬佛郎的資本。這些大公司中的十三個公司，有資本六萬萬一千四百萬，在一九三五年間佔有着存款一百萬萬，獲得利潤一萬萬八千萬佛郎，利潤率是百分之三十。

法國政府是窮的，但是那些授權與它的人們是富有的。

共產黨的財政綱領是能够保證國家財政健全的。

要粉碎工業和金融寡頭，就應當實行解除法西斯同盟的武裝和真正的解散它的團體，應當把「共和的氣息」引入國家的事務中去。

在一九三七年，我們不是見到人民的敵人用挑釁用謀害來反對工人階級嗎？克里西的殘劇已指出那種威迫無產者的危險。當法西斯黨徒們繼續他們罪惡行爲的時候，有些個別的警察人員、軍隊中人員、官吏和高級行政人員在支持着他們。

這是時候了，是消滅那些暗中準備內戰人們的非常時候了。那些好戰者想要來一個流血慘劇。一個反蘇集團的委員會的報紙寫道：

「我們堅決要找一個非常的人物出來。或許他會從事變中出來，或許在明天可能來的悲

慘時候顯露出來吧，若是這樣，就是要付出血的代價，就是要我們遭受到同一血統人們血腥衝突的恐怖，也是應該的。」

這就是法西斯黨徒在想的東西，這就他們所要的東西。他們希望把法國轉變成一個血腥的破壞了的西班牙。他們想使國家混亂，並且用他們的陰謀來阻止那些法國勞動者迫不及待的正當的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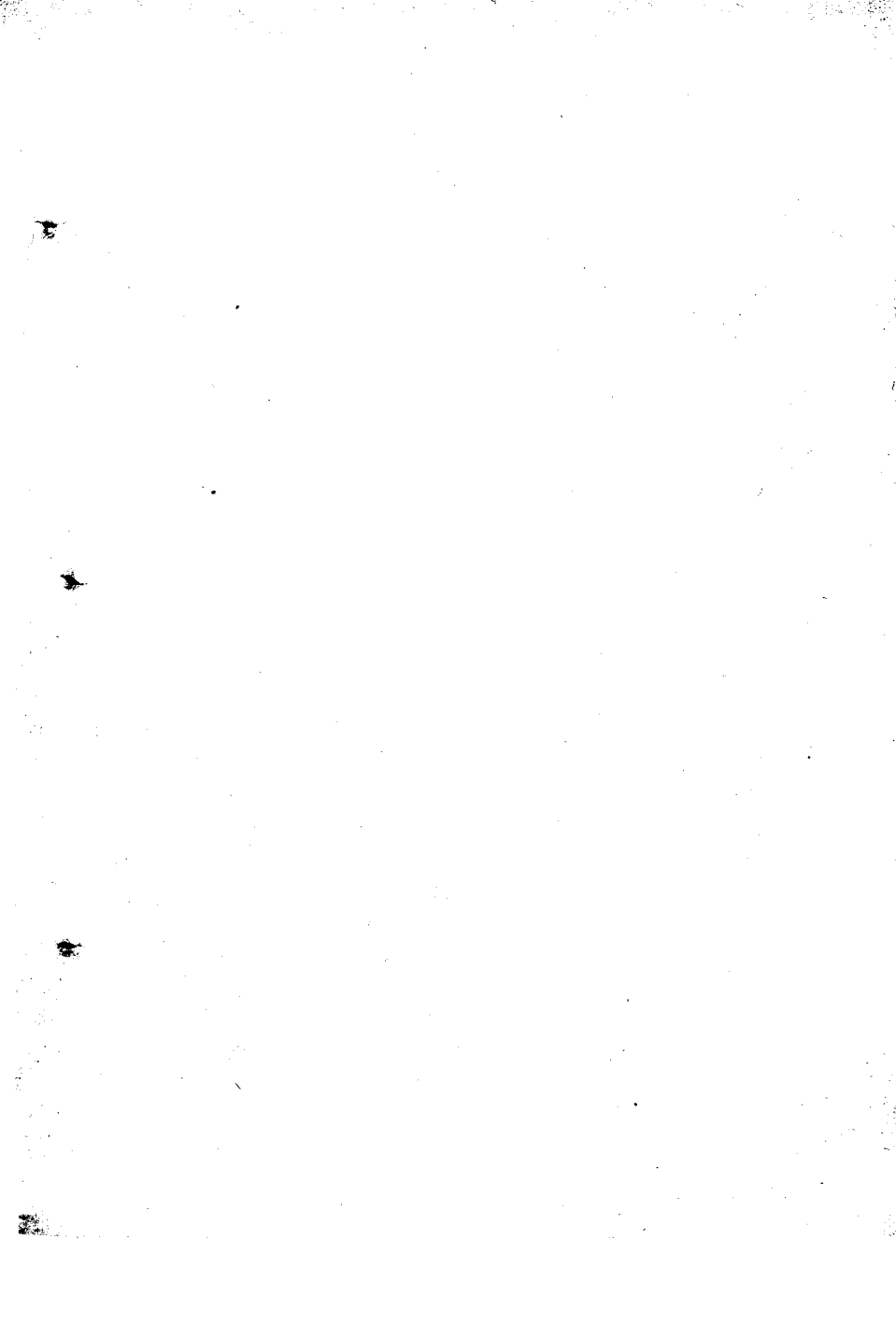
大家知道，他們用軍火去供給他們的寄父佛郎哥，他們自己祕密的接收外國的武器。雖然一些法西斯同盟是被解散了，可是它又組織了起來，並且握有着大批的軍火、催淚彈、自動步槍、機關槍和手提機關槍。

消滅這些挑釁，消滅這些暗害！

人民戰線要社會和平，並且它知道如何達到這一目的。對那些準備用新的突襲以反對人民反對共和的人們，我們一點也不示弱。

一切勞動者，一切民主人士始終忠實於他們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的誓言：

「我們莊嚴的宣誓，始終團結一致，來解散亂黨的同盟和解除他們的武裝，保衛和發展人民的自由，以保證人類和平。」



第六章 處在希特勒危險前面的法國

共產黨是法國人民的代言人，是人民利益的熱烈衛士，它把保衛和平當爲它自身的基本任務。

共產黨的這種和平政策的提出，是根據它的過去政策，是仿倣偉大的蘇聯對外政策所給我們的榜樣。

共產黨是從反對戰爭的鬥爭中生長出來的，是從一九二〇年杜爾代表大會所確定的志願中生產出來的，是從不允許那種使第二國際破產的悲劇再現中生產出來的。

法國共產黨是在反對佔據萊茵、反對對摩洛哥對敘利亞戰爭的戰鬥中壯大起來的。

代表法國人民和平意志的共產黨，堅決的站在和平力量這一方面，並且不停息的揭穿和控告那些戰爭製造者。

在我們現在的歐洲，資本主義已把矛盾和對立複雜化了起來，法西斯主義加深了民族的仇恨和用它一切力量來準備將來的屠殺，軍備競賽在激烈的進行着，戰爭威迫在加重着。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如同一九一四年風暴的準備時期，所不同的是火場更加多，危險更加可怖，將來的屠殺

更加殘暴。整個世界成了一個火藥桶：星星的火花會使它全部爆炸。

漫長而可怖的戰爭前夕！世界分成了兩個營壘：一個是要和平，一個是要戰爭。

一方面是愛和平的國家，民主國家、法國、英國、美國，並且自然的，佔在最前排的是蘇聯；另一方面是法西斯國家——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驕傲的追逐着帝國主義的征服政策，實行軍國主義，誇耀已經開始了的戰爭。

布爾塞維克不會停止過爲和平和總裁軍而努力。在一九二二年熱內亞裁軍會議因蘇聯就會要求限制軍備。在一九二七年，因資本主義國家的拒絕，李維特諾夫所提議的部份裁軍計劃沒有獲得成功。在一九三二年的裁軍會議上，他又供獻了裁軍的實施計劃（雖然他對於這建議的命運並不抱什麼幻想）。我們知道，雖然有蘇聯的努力，裁軍會議終於進了墳墓。

在一九三四年，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希特勒奪到了德國的政權，他並且毫不隱瞞着他的好戰陰謀。德國退出了國聯，公開實行其瘋狂的軍備政策，多次的破壞條約和挑戰。面對着那些想在歐洲和全世界放火的人們，蘇聯冷靜和堅決的提出它防止戰爭打擊侵略的制度。這種制度就是集體安全制，就是和平不分割制，用這種制度聯結起那些對於維持和平真正感到興趣的國家。

蘇聯的一切活動的目的，都在打退未曾出洞的侵略者。在這個目標之下，蘇聯提出了互助協定，那是向一切國家提的，這並不損及任何國家的利益，而只是爲了和平事業。

蘇聯是始終忠實於列寧的，列寧曾在一九二一年第九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宣稱：

『我們繼續以我們一切的努力來保衛和平，我們不惜以某些讓步和重大的犧牲，以保衛這種和平。』

十三年以後，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莫洛托夫所作的蘇聯對外政策總結，就證明了：

『沒有再比我們工農政權更堅固的和平堡壘了。在不可戰勝的紅軍撐持之下，在全世界人民大眾積極的支持之下，在斯大林天才的領導之下，蘇聯不變和不鬆懈的實行它那固定的和平政策。』

針對着蘇聯和平政策的，針對着它的集體安全制和平不可分制的是第三帝國（德國）的好戰政策。希特勒胡謔了一套「地方性戰爭」的理論，它是爲了符合他各個擊破敵人的計劃。他的聯合政策也是走向這一目的的，那些雙方協定，如同波蘭的協定，如藉口保衛歐洲文明而同日本定的「防共」協定，如他在巴爾幹在匈牙利在芬蘭的陰謀詭計，只不過是這一條路的某些階段而已，它的術語很清楚的只是：征服戰爭的爆發，是爲了在世界上建立德國的特權。

『一個同盟，它的目的若不同時包括着一個戰爭的遠景，它就沒有什麼意思和價值。同盟只是爲了鬥爭。就是它的兌現時還遠，也應預見戰爭將會到來而力以求之。』（見希特勒「我的奮鬥」）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上表示出他的對外政策的原則。這部書的第一冊是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出版的，第二冊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出版的。這並不是舊書，既然第三帝國政府每年印刷幾百萬本，並且把它認爲是欽定的國家社會黨的聖經一樣在學校內虔誠的教授着。

希特勒所發展的一切學說是根據於德意志民族是優秀的民族這一偏見，這種優秀給了它以統制全世界的權利。

他首先使一切日爾曼血統的人統一的日爾曼帝國裏面，這些人現在散住在丹麥、捷克、奧國、波蘭或是法國。同時希特勒不承認現在的德國邊境。他就連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前）的邊界都不承認！

「恢復一九一四年邊界的主張乃是一種不合理的政策，就它的範圍和結果來說，都顯示這種政策是一種真正的罪行。」

一九一四年的邊界是一個臨時的邊境。希特勒想恢復日爾曼的羅馬「神聖帝國」的邊界，恢復之後再征服東方。大家知道日耳曼「神聖帝國」包括德國以外的荷蘭，比國以及法國的佛朗德、阿爾薩斯、羅蘭、法蘭斯公國——現在的十五個省——奧國、意斯特里亞、捷克斯拉夫、法國西部的一部份。這是舊的大日爾曼主義計劃，這樣把他的觸鬚蓋沒着大部分舊大陸的大部份「歐洲中心」用鐵與火以達到八千萬德國人統制那些不自由和被壓制的別國人民。

爲了實現德國的統一，爲了奪取「生存地帶」，爲了保證德國人民的「自由和榮譽」，他用一種方法，並且是唯一的一種：戰爭！

和平和國社黨的理論是絕對對立的。在長期鬥爭中人道是在壯大着，持久和平將把這種理論送到墳墓裏去……和平「那種反自然和反理智的妄言」（見「我的奮鬥」）對於國社主義，是一個致命的危險。

希特勒想一步一步的實行他的政策。首先，恢復「自由和榮譽」，要求以伏爾克斯坦邊界爲第三帝國的邊境。德國邊境的一切鄰邦都應向它讓出土地。它的先決條件，就是重建德國軍備，把萊茵左邊軍事化起來，以保護萊茵區和魯爾的工業區（希特勒的防線已在六個月內建立起來，面對着法國的馬奇諾防線）。

同這種瘋狂擴張軍備同時來的，是德國竭力分化可能成爲敵人的國家，尤其是孤立法國。重整軍備和外交「核心」的建立，這是希特勒政策的主要主張。第三德國在對外政策的每一獲得，都鼓勵它向前更進一步。希特勒的更正前言和他的和平諾言，都只是一種欺騙和催眠對方的陰謀而已，其目的在於使他更好的襲擊和殲滅對方。

爲了在世界上海立他的霸權，第三帝國要打倒他主要的敵人——法國。他的第一擊，就是打我們的頭上。他不是把百分之八十的軍隊都放在萊茵河上嗎？

『我們應當明瞭一件事實：德國人民的死敵，無情的敵人是法國，今後還是法國。法國過去是誰統治，將來是誰統治——布崩王室統治或是雅可賓統治，拿破崙統治或是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統治，基督教共和派的統治或是紅色布爾塞維克的統治——都是一樣的。』（見「我的奮鬥」）

「我的奮鬥」上的這種論調被下列狂妄的論調所充實和「證明」：

『法國是我們所最可怕的敵人。這個漸漸降低到黑人水準的民族，以猶太人爲靠山來達到它統治世界的目的，因此它暗暗的把歐洲白種人的生存置之於危險境地。』

……在報復的渴望鼓動之下，在猶太人有秩序的引導之下，法國今天在歐洲所扮演的是一種反白種人生存的罪惡，它將會有一天引起同時代的一切報復精神來反對這個民族，這代人將會在別些種族的變壞中認出了這種人類遺傳的罪惡。

黑人的侵入法國是非常之快的，使得人們真正的可以說到在歐洲地面上產生出一個非洲的國家出來。若是法國現在的作法延長到三百年的話，最後殘餘的純潔血統，將完全消滅在現在正在建築中的非洲和歐洲黑白混合種的國家中；一個從萊茵河到非洲剛果充滿了低級民族的廣大殖民區，在延緩的雜交影響之下，慢慢的形成起來。』

人們真會感覺到恥辱來引述這些神經錯亂的語句，人們會感覺到戰慄，若是想到這個萊辛、

萊伯尼茲，康德和歌德的德國現在在散布這些無恥的謊言。

「我們民族的死敵，法國，無情的在絞着我們，在吸盡我們的財富，我們應當用一切重大犧牲來促使法國稱霸的傾向破毀。一切強權國在今天同我們一樣，都認為歐陸忍受不了這種法國霸權所給予的痛苦。若是我們能夠有打倒痛恨我們的敵人的最後可能，那麼這些列強的一切措施使我們都不會感覺到難受，我們犧牲一切都是情願的。」（見「我的奮鬥」）

德國試驗和英國進行親善：它同英國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日簽訂了海軍協定，這是在打敗拿破崙的滑鐵盧之戰的紀念日簽訂的，欲使英國回憶到共同對法作戰的過去。它同墨索里尼在一九三六年的秋天締結了一個真正的同盟，其直接目的是在絞死西班牙的共和，這個同盟的簽字和公布以及墨索里尼拜訪慕尼黑和柏林（一九三七年九月），等於向舊民主國家挑戰。

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希特勒是忙於歐洲的征服而把殖民地問題擱在一旁不談。可是從一九三五年起，他宣佈了「德國的殖民地願望」。

一種強韌和荒謬的宣傳說德國生殖率的降低是因為沒有殖民地的緣故。但是法國是有殖民地的國家，它的生殖率還不是在降低着？

除了要非洲的土地之外，希特勒還談到「殖民化」烏克蘭。在紐倫堡舉行的代表大會上，他屢次向蘇聯挑釁和威迫。自然，希特勒是把他搶掠的慾望藏在觀念學的動機後面。說明他不是為

了他的貪慾而如此作的，是爲了完成上蒼授予他的尊貴使命；他是上帝派遣到地上來消滅民主主義者、法國人、黑人以及布爾塞維克的。在反共十字軍的掩護之下，希特勒進行着他那霸權和奴役別人的夢想，這種反共的藉口是爲了獲得反動國家政府對他的支持或中立。

當法國共產黨在一九三六年決定在十月間到阿爾薩斯和勞蘭各地去開會宣傳，一切二百家的人們和希特勒在法國煽動阿爾薩斯人民反共的代理人們：分裂主義者，「自治主義者」，火十字、保皇黨、反猶太份子和反動份子們，都行動了起來，組織了反我們統一戰線。三省的省長遞送報告和電報禁止我們開會，藉口是反對「共產黨的挑釁」。

但是斯特拉斯堡的工人和阿爾薩斯的工人回答了他們。回答他的不但是工人，同時還有中間階級、手工業者、農民，那些真正代表阿爾薩斯的人們，那些蚌德區（Bundschuh，一四九三年到一五二五年農民戰爭時阿爾薩斯農民和賤民所組織的祕密團體）的後代以及反貴族的農民的後代，那些曾經經歷過一五二五年穆爾霍生共和和法國大革命的，雖經德帝國主義五十年佔領和法國反動者反民主觀念的打擊而仍然保存其活躍的自由傳統的阿爾薩斯人民的子孫！

在斯特拉斯堡，幾百的暴徒在街道上吼叫着，但是全體的阿爾薩斯人民都忠實於他們過去的尊貴的傳統。在我講完了足以使德國元首「暴怒的演講之後，大家歡呼着，當主席提出詢問說：『誰反對這個決議案』時，在一個擠滿了幾千人的會場裏，異口同聲的回答說『希特勒！』這就

是愛好自由的阿爾薩斯和法國勞動者思想的總結。

希特勒不僅只是咒罵布爾塞維克這個字，他以同樣的憤恨威脅着民主。

然而，法國人民知道法國已成爲強國，並且十八世紀法國民主大革命的光芒曾經照耀了世界，因此遭受法西斯獨裁者的憎恨，認爲它是一切壞事物的泉源。法國人民明白的看出了在法西斯思想和希特勒反民主十字軍後面所隱藏的是些什麼東西。大革命時的英國皮特和拿破崙的奧國的梅特涅區，這兩個民主和革命法國的敵人，不是也會聲明過他們是爲反對「無政府」而鬥爭的嗎？他們不也宣稱過他們要營救「基督教的文明」嗎？

實際上他們是想削弱法國。把法國的殖民地 and 國土割去以肥己。同樣的，今天被希特勒所發展的「國家哲學」，同他對共產主義和民主的咒罵，也不過只是干涉和征服他人的藉口而已。希特勒的同謀者墨索里尼在柏林就宣稱過：「歐洲明天就是法西斯的了！」他並以武裝來威脅這個歐洲。

德國法西斯主義一直走向它瘋狂準備的戰爭上去。戈林說：「一個好德人絕不死在他的床上」。他們用一切工業資源來製造軍火、飛機、坦克，他們增加汽車交通網、飛機場，把德國的經濟建築在戰爭的基礎之上，他們關閉起邊境，讓這個飢餓的破產的國家自己解決生活，軍備建築了一個將來血腥利益的基礎。『我們的奶油減少了，但是我們有了更多的大砲！』，這

是一位法西斯當政者說的話。希特勒建造了一個我們傳利葉所不會夢想的社會組織——飢餓公社！專門技術只用在軍事目的上，科學只用在準備戰爭和使人民飢餓！戈林對於德國人的要求只是以大砲代替奶油，要他們到垃圾桶裏找食物：『你們的牛排是在垃圾桶裏！』

直到現在，希特勒已作過一些事了。民主國家政府的特殊的無視讓他毫無受處罰的撕毀了凡爾賽條約的一切條文。他恢復強迫徵兵制，人們沒有說一點什麼。一九三六年三月他恢復萊茵河區域的武裝，沒有人說什麼。所剩下的只有關於地域和邊境規定的變動了。這就是戰爭！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面援助西班牙的將軍們組織叛變，一面他們又得到這些叛將們的援助，於是宣稱決不允許在西班牙建立一種「蘇維埃共和」。他們把西班牙由一九三六年二月選舉產生的人民政府當成蘇維埃！這種無恥的謊話使他們可以用神祕的反布爾塞維克名義來加以干涉。這樣他們可以保證獲得經濟上巨大的利益，並且在戰爭中可以取得不利於法國的戰略基地。

佛朗哥所收到的是德意的支持、納粹的飛機、意大利的黑衫隊，另一方面，他背叛了國家利益的，支付給他德國盟主的，將是第三帝國軍備上所需要的鐵礦，他向希特勒保證經濟利益的讓予，允許他把魔手伸進西班牙。武裝佔領西班牙，剝削西班牙的土地和人民，在西班牙建築起頭等重要戰略基地。在佔領了比爾巴奧的第二天，希特勒不是說到『德國在西班牙有其生死有關的利益』嗎？從一九三六年八月廿五日起，我就在比發羅發出了這樣的警告：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要佔領巴里亞里斯羣島，並且要主宰地中海西部。他們要把魔手伸向直布羅陀對面的西班牙屬地摩洛哥去……」

在今天誰都知道這是事實了！

希特勒參謀總部已經起草了給法國一個「暴雷式的打擊」計劃，這對於法國人已經不是一個祕密了。德意的同盟者西班牙成爲他們海空軍的據點，這將起着一種有決定性的作用。

他們要把法國在戰略上孤立起來，被包圍起來，使它在戰爭中四面受敵：從萊茵河方面，從阿爾卑斯山脈方面，從比利牛斯山脈方面。

這是舊時德國查理·干特皇帝用以包圍進攻法國的故策，現在希特勒又採用了它。最使人驚訝的是法國毫無反抗的外交，它放棄了法國傳統的政策，它自示軟弱無能，它拒絕對於國家生命有關的利益的保衛！

我們自從西班牙悲劇開始以來，就幾次的說明，人民戰線的法國是能够並且應當俱首和領導起一種組織和平的偉大對外政策。

雖然經過共產黨的一切努力，但是仍然未能如此的作。雖然還是很簡單很容易了解很自然的符合於人民戰線綱領的！這個綱領不是規定了：

「在國際聯盟範圍之內，根據國聯所議定的「侵略者」的定義及「互助」協定，自動的

施行對侵略的制裁辦法，來實行保障集體安全的國際合作。

廢止祕密外交，以國際行動和公開會商辦法，把離去日內瓦的國家引回來，但是要不違背國際聯盟基本原則：集體安全和不可分的和平。」

我們共產黨對西班牙政策，是完全和唯一根據人民戰線綱領的——也同我們其他政策一樣。尊重這個綱領使我們走向反對另一種凶惡而愚蠢的單方面的中立政策，這種政策的實行使得瓦倫斯遭殃，使佛朗哥得到極大的好處。

從一九三六年七月，我們就說，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叛變，而是國際法西斯主義所圖謀的一種罪惡的侵略。我們會說過並且多次說過西班牙戰爭不是僅只威迫着西班牙人民的自由與獨立，並且威迫到法國的安全，威迫到和平。

我們會經告發過那些法國法西斯們的毀謗和他們報紙的可惡宣傳，他們是盡力支持西班牙封建勢力的，支持巴達若斯和蓄尼卡的屠殺者們的，他們以光榮之劍送給佛朗哥。我們會經說，對西班牙政府的封鎖是罪惡，我們會經為西班牙自由戰士們要求獲得必需物資的權利，使他們可以打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大量軍火接濟的叛軍。我們會以法國工人階級的名義宣稱，這是共和主義者的光榮責任，若是採取另外一種態度，就會喪失了法國勞動者過去的光榮，並且說明西班牙共和的失敗就是我們自己的失敗。我們同總工會都要求尊重人民戰線綱領，尊重國際聯盟章程尊重國際

公法的基本原則。

法國法西斯者對我們的謬誤是說我們希望戰爭。這是說謊！我們從來不會主張以武力干涉西班牙事件，我們只是要求應當把法西斯的干涉停止下去。我們反對所謂中立政策，它把犧牲者和侵略者同等看待，把共和人士和叛徒同等看待，面對着那些利用愛好和平心理的法西斯獨裁者的恐嚇，它步步的退讓。

我們曾經指出這種「悲慘的錯誤，使得西班牙無產階級付出他們的鮮血」。〔見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七日西班牙社會黨致法國社會黨的信。〕

中立政策是個惡毒的騙局，它並未能保衛和平，然而拋棄了西班牙共和人士，它的繼續讓步和投降，只是使德意法西斯們更加強硬起來，更加公開和無恥地實行干涉。

羅馬的意大利參謀部派遣着成團成團的軍隊到西班牙去，並且公佈意軍在西班牙的每日戰報。墨索里尼雖然向在西班牙作戰的意軍宣佈把逃兵「給他穿起綠的、紅的、藍的」，但是也防止不了意軍在加達拉查阿前線上遇見共和軍時可恥的逃跑。希特勒的飛機在安靖的巴斯克土地上散佈死亡和破壞，他的大砲在阿爾美利亞轟擊着婦女和兒童。可是法國和英國在靜默，退讓和接受，一如對於當年意大利槍劫阿比西尼亞時的態度一樣！

「可笑的悲慘的滑稽劇！」剛特布里里地方的主祭這樣稱之。人們讓國際法西斯主義自由的去

作並且讓他把西班牙造成一個基地。

法國政府的態度使得被犧牲的西班牙民主人士以及別國民主人士們所不解。白魯姆政府所實行的所謂不干涉政策，在他的賬上寫下了一筆沉重的債務。他不顧民主，不顧法權，不顧法國的生存利益，想要營救和平，可是他所作的這些都增加了戰爭的危險，並且使得威迫法國的危險更為可怕。

拒絕以軍火運給西班牙共和，就是一種反對西班牙共和的干涉。沒有什麼中立，有的只是反對西班牙共和干涉而已。賴伐爾對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時用的是可恥的退讓政策，而現在，這種不可思議的錯誤又重現於德意西侵的時候。

我永不忘記的是，當我到西班牙巡行時，瓦倫斯和瑪德里婦女兒童們向我提出的話：「你們讓我們的丈夫和父親被殺嗎？你們讓我們被屠殺嗎？法國的工人能讓他們這樣作嗎？不，這是不可能的！」我也還記得在各地戰壕裏，在法西斯炸彈下，在離征服西班牙的摩洛哥和德軍幾步之前所聽見的壯語。在瑪德里戰壕裏有我三個妻弟在那裏，他們自從國際縱隊組織開始就加入了，在那裏人們一點也沒怨言。他們只是緊握着槍機，兩眼炯炯的說：「我們的鬥爭是爲了我們的自由也是爲了你們的自由。我們今天在打還明天威迫你們的敵人。你們懂得嗎？我們所進行的反法西斯主義戰爭，也是屬於你們各國民民主人士的戰爭。因爲有我們的抗禦，使得他們無法前進！」

共產黨人是確切了解法國利益的，他們在西班牙事件開始的第一天就宣佈國際法西斯主義侵略不幸的西班牙人民，現在已是够清楚的事情了。

共產黨人曾向社會黨，向第二國際請求，請求他們同意於團結起無產階級力量來支持西班牙的共和主義者。大眾要求團結的願望應當戰勝第二國際某些領袖們的分裂精神和反共的憤恨。共產黨毫不鬆懈的堅決進行他擁護西班牙共和的行動。它可以自傲的提出它在這方面所作的一切，確實是爲了民主與和平，並且它的援助行動和它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它的歷史上寫下了特別光榮的一頁。

法國共產黨的反對希特勒禍害，是繼續佛朗索瓦第一和里胡利厄的偉大傳統。（佛朗索瓦第一——一四九四到一五四七年——在他統治的時期開始法國復興，特別值得提的是他所領導的反查理干特的侵法戰爭。里胡利厄——一五八五年到一六四二年——紅衣主教和政府要人，他打敗當時奧國王室，當時奧國王室的政策又被現在希墨兩魔重演起來）這是一個新的例證，證明我們的力量，證明法西斯政黨和法國反動派的衰落，證明當法國法西斯主義投敵的時候，法國民族的利益是同共產黨的主張是一致的。這是因爲我們共產黨人是反對希特勒德國的陰謀，保衛法國利益和生存的。我們還記得十六和十七世紀反抗奧國王室的長期鬥爭，這個王室企圖以東面和南面同時來威迫法國。我還記得過去的一切德國侵略法國的陰謀：普魯士的陰謀，以後的霍漢索倫的

里奧波爾陰謀，再以後是俾斯麥的陰謀。

我們是堅決的不折不扣的擁護和平。可是我們知道希特勒是我國的最大敵人，並且是戰爭的最大禍害。我們知道一定要強迫他和平才成，退讓是毫無用處的，只是更擴大法西斯主義的貪慾而已。要反對他，就應當團結一切的民主力量，凡是有一個地方有法西斯主義攻擊民主的就應當支持民主，不讓希特勒把魔手伸到西班牙去，爲了反對他的罪惡陰謀，要建立起一條不可穿越的垣牆，一條聯合一切愛好和平人們的鐵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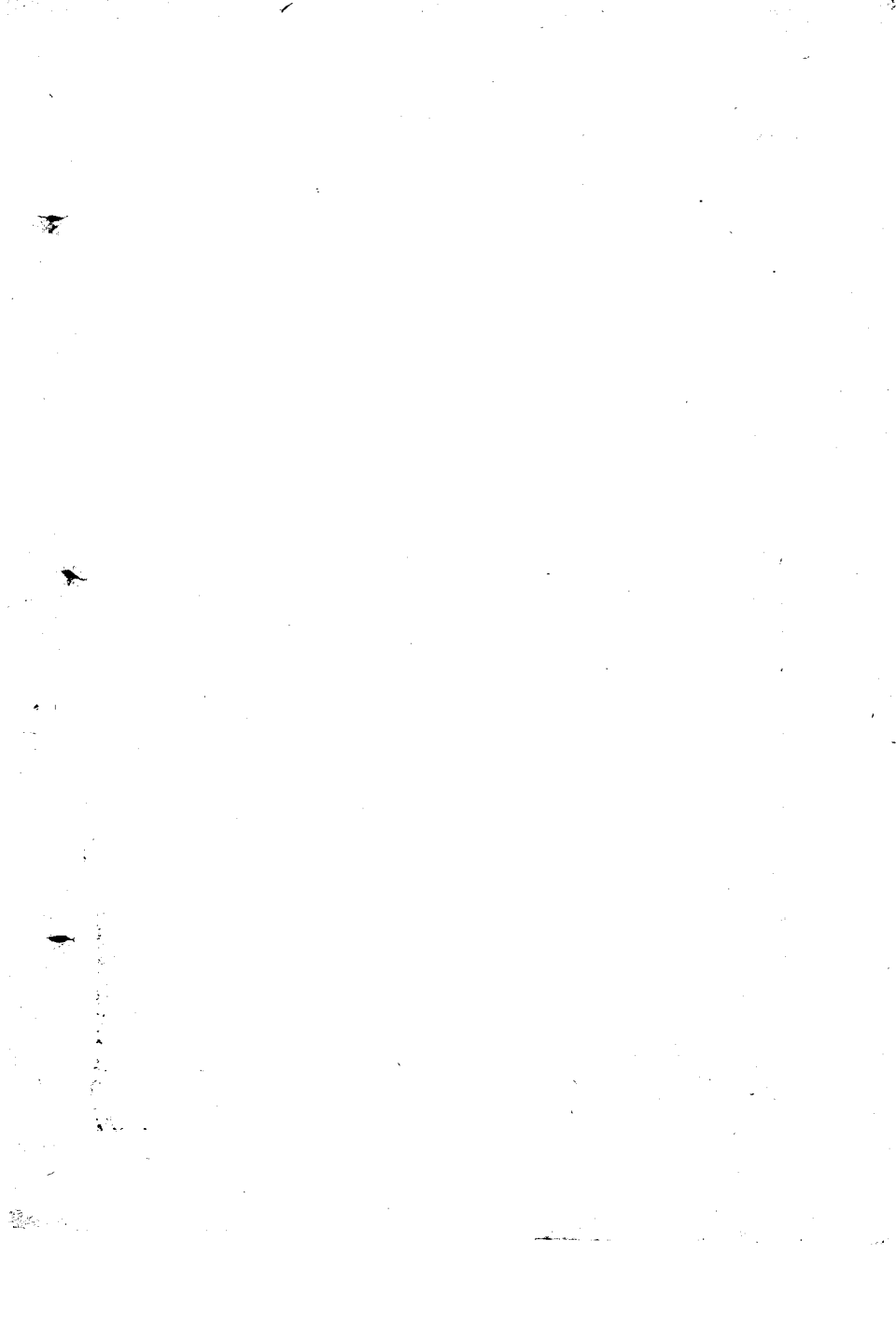
羅曼·羅蘭在一個動人的請願書中，請求歐洲，這個文明和民主被中古日爾曼侵法騎兵和現代匪軍所威迫的歐洲，他說：『我們握起手來，組織成巡邏隊——和平的巡邏隊。注意不要有誰來破壞和平！』（見一九三六年一月廿四日「星期五」雜誌）

我們，共產黨人們是愛我們的國家的，並且知道保衛它。在保衛法國的問題上，我們不忘記主要任務之一是扼殺國內的敵人，這些法國的希特勒份子，他們是德國佔領軍在法國土地上的真正前哨。

我們了解希特勒的作法。在爆發這種破滅的戰爭——他想盡可能殘暴和恐怖——之前，第三帝國在作着破壞對方有生力量的陰險工作，使之分崩離析，並且使自己獲得同情者和支持者。它想在進攻的國家裏，用賄賂和宣傳來進行溶解活動。希特勒的僱役們在法國所造成的內部危險

已是顯而易見的了。亂黨、特務、挑釁者在我們的國土內層出不窮的製造着罪惡。他們進行着一些激怒我國人民的卑鄙的恐怖陰謀。那些卑鄙的匪徒們企圖在我們的土地上來強制誠實的人們服從他的法規。

法國的法西斯份子爲了反對要麵包要和平要自由的法國人民，他們同羅馬與柏林的獨裁們聯合起來，這也同他們的祖宗高布蘭芝及其他一樣，同外國親善來打擊革命的法國。



第七章 共產黨人所要的是什麼？

科學會經研究過各種社會的進化，它並且找到了各種社會是在當時社會各種力量的不可抗衡的影響之下轉變着。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原動力。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偉大發現。

共產黨服從於科學的教訓。它是走向着歷史運轉的方向。它所作的不是像他敵人所說的挑起革命——革命不是只靠一個黨的願望——而是促使成爲必要的社會轉變更容易實現一些。

『物質生活的生產形式是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知識生活程序的條件。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自己的存在；而相反的，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着他們的意識。在他們發展的某一階段上，社會的生產力與向來在其中所活動着的既成的生產諸關係發生矛盾，或是，單依法律的表現說，生產諸關係就是財產諸關係。這些關係由生產力之發展形態一變而爲生產力的桎梏。那時就開始一個社會革命的紀元。』（見「政治經濟學批判」）

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幫助將來的社會從現在的社會中解脫出來，如同蝴蝶從蛹裏蛻變出來一樣。共產黨是歷史革新力量的黨，這種力量深知到了成熟期到來時它所擔當的角色。政策之對於

共產黨也像專門技術之對於工程師一樣，是科學的應用。它辨別得出今天的任務和明天的任務，目前的要求和將來的目的。

我們經濟理想是合理化的經濟、計劃經濟，在這種經濟下面，人類領導生產，主宰着生產，依照人類需要來調度生產。

直到現在，人們仍是經濟力的玩具，人們看着這種經濟力，正如神話上所寫的不熟練的魔術者一樣。在一種繁榮時期之後，他們無法扼止的又跌到危機裏面……若用我們空想主義大師傅利葉的用語來說，就是「能力的悲愁的處在不合理的貧困悲劇裏面」，不合理表現在在物質豐富的處境中受着貧困。若是除了蘇聯不談，我們可以說已經征服了物質元素的人們，仍然處在黑暗和神祕的經濟力支配之下。

可是，這種神祕是很容易顯露出來的。現代的生產手段同資本主義社會的財產形式是不相調和的。就技術觀點來說，用的是飛機摩托，可是若就經濟和社會觀點來說，用的還是舊式的馬車……

在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裏面存在着一個深刻的矛盾：公共的社會生產品是被那些生產手段佔有者所佔有。那些完備的機器，擁有幾萬工人的大企業，都是帶着生產的社會性質的東西，可是却保有着人的私有權性質。巨大的厄腦工廠，也像中古小手工業者的作坊一樣，是私人的財產。社

會生產的生產品也還是同純粹個人生產的生產品一樣，是私人的財產。

但是現代的生產力是反對着過時的財產形式。巨大的工廠，生產的社會形式，在我們的今天，同私人所有權發生衝突。危機，這就是機器和生產手段反對私有財產的革命：這是帶有集體性質的生產同財產私人佔有之間衝突。

共產黨主張大的生產手段應歸整個法國人民所有。

資本主義解決危機的各種各樣的試驗已歸失敗了。他們一切「計劃」，一切「領導經濟」的試驗都未成功。沒有，也不可能有一「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因為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托拉斯之間不停的在鬥爭着，以及生產形式和私有財產形式之間存在着基本的矛盾。無論托拉斯或是卡迪爾，都無法消滅舊自由經濟所感受苦痛的競爭的無政府狀態。

共產黨人要的是社會化的經濟，但是這不應同國家化主義相混淆起來。我國所要實現的過渡時期的國家，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這是人民有直接政府的國家；這是一個為實現無階級社會和消滅國家而工作的國家。

若是說共產黨人希望社會化大生產手段，但是他毫不同意消滅農業商業或是工業的小有產者的財產。並且進一步說，他是小農、小商人和手工業者朋友。他認為以社會化大生產手段為基礎的經濟生活組織，只有在中小農、小商人、小工業者與工人階級自由自願的合作之下才能組織

起來。

共產黨人願意讓以上那些合作有關的人們選擇這種合作的具體形式。無論如何，他不能強迫他們。恩格斯會說過，應當使小農自己明瞭社會主義下面的大農業是比他耕種一小塊土地要有利得多，並且應當允許他留在小塊的土地上讓他獲得這種新的智慧。

共產黨人是為建立一個新社會而鬥爭的，這個新社會是不再有人類在社會中的不平等，它不再是為階級鬥爭所分裂了的社會。

生產力發展的不充份，人類勞動在生產中的能產性的薄弱，同樣的，沒有現代技術的存在，阻礙了分工與階級的分化。

生產力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曾經使得階級分化一天比一天深刻，但是它同時也準備了階級的消滅。生產手段的威力加強以及人類勞動能產性的增加，使得無階級社會的出現更為可能而必要。在這樣的社會裏將消滅因經濟危機所產出的痛苦以及帝國主義的戰禍。在這一社會裏，人類終於認識了幸福。

共產黨人要取消的是社會的不平等，但是他知道人們之間還有自然上的不平等，這特別是生物學上和心理學上的稟賦不同。共產黨人所要取消的乃是社會上的不平等。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個人所獲得發展個性的機會不是平等的。比這還要壞的，是極大多數的個人是屬於被剝削階級

的，是被極少數寄生蟲們所剝削所壓迫而處於貧苦的境地。階級社會的消滅將保證個性的充份發展。將來的人將不是一律化和機械化的木偶，而將是一個自由和健全的個人，他們的能力和天才將大大的展放。

馬克斯在他「對於歌達綱領的批判」一書上說過將來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時期，實行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是在這個最後階段的共產主義時候未到之前，社會還要經過各取所值的階段，這樣的社會若同現在建築在人剝削人、財產獨佔、搶奪、橫暴上面的社會相比較，前者乃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一個各取所值的社會明顯的是一個無階級的社會，既然在那裏已經不再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以及沒有了寡頭的統治。

無階級的社會乃是痛苦人們的理想，首先是「只有他們的鎖鍊可以失去」的無產階級的理想。這將是無產者聯合一切寡頭下面的犧牲者們所建設起來的社會。

但是在這種無階級的社會與現社會之間，還有一個過渡的時期，在這過渡時期裏人民將施行其直接管理。

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政治理想，這是人類與文明的自由。爲了達到這點，就應當消滅那些妨礙人類社會充份展放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

*

*

資本統治把法國人民統治在不合於他們的生活條件之下，在束縛和貧乏之下。

大多數法國人住在不合衛生的住宅裏，有些是簡陋得很。在巴黎，有十八萬人的住宅的牆上衛生機關公然的掛起「危險」的牌子。實際說，可以說有六十萬巴黎人被結核症所纏擾着。在第一號貧民窩裏有九十三宅房子，內中有七十七家有傢具的旅館裏住着三千一百四十八個人，得結核症的佔死亡率百分之二十五。我們需要現代式的衛生的和舒適的住宅：應當完全重建巴黎及其他大部份的大城市中的許多地區。但是，沒有如此作或是差不多沒有作。惡劣的居住條件使得兒童的死亡率大增，它是生殖率降低的原因之一。我們有許多著名衛生專家，市政專家和工程師，他們都是世界上著名的專家。但是他們的計劃都是睡在公文夾子裏面，而我們則繼續的生活在不衛生的住宅裏，我們的孩子們因為缺乏陽光與空氣而漸漸的瘦弱下去！

沒有人去幹這些有益於民族健康與前途的工作，這是因為在私有財產制度下，這些工作都是不能使大資本家獲得足夠利潤和租金的。

在上一次的危機過程中，每個人都懂得毀壞商品和失業是合乎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因為資本主義經濟不是為滿足需要而是為利潤的。人民的需要，在它不能以利潤滿足資本的時候，就要遭受資本家的漠視。

數百萬的人們都已經懂得了這些。

危機給了人們一個明顯的證明，證明爲生產利潤的經濟是不能使人民生活下去的。只要現在生產方式繼續存在，危機也就要有定期的再來，並且更爲擴大和深刻化。

資本家們也知道「不能長此下去」的。他們自己也在尋找一種解決辦法和出路。這種解決辦法，資本家在法西斯國家在實行着。在德國，他們實行的是「勞動服務」——把工人像軍隊樣組織起無代價的或是差不多無代價的爲資本家生產利潤——這是大資本企圖走向「有組織」的一種幻想。許多人們的生活水準一天一天的下降，在上面，一把數的寡頭們統治着生活貧困日漸增加的、無希望的、愚昧的、苦悶的大衆，這就是反動資產階級所理想的將來。

資本家的利潤築成一個障礙法國和法蘭西民族繼續發展的壁壘。若是在一個富有的法國裏，法國人是貧乏的，這就是說民族的財富，人民數代勞動的果實，不是屬於人民，而是集中在一小羣寄生蟲們的手裏了。

一切法國人都應當有足够的衣服穿。可是法國北部的紡織機在慢慢轉着。這是因爲法國人不再需要衣服了和都已經穿得很好了嗎？不是的。若是說機器是在停着不動，這是因爲法國人無法付出工業家所要的價錢，這種價錢裏面有一筆資本家的利潤在內。當這種利潤得不到的時候，那麼生產手段的掌握者馬上停止機器的轉動，毫不顧及人民——勞動者和消費者們——的需要。

要想把滿足集體需要當着國民經濟的最高規律，就應當使經濟成爲民族的經濟。

資本主義已經表明了它不僅不能繼續文明的事業，同時它也無法維持現有的水準。它企圖反對技術的進步。托拉斯恐懼着新的技術的發明會危害他那壟斷的利潤。

最著名的例子是煤油托拉斯首先阻止新的發明，以後是各企業的阻止用同樣方法的工業開採。生產並未盡量的機械化，像它可能作到的那樣去作，這是因為資本家常常用減低工價的辦法使得用工人比用機器還要合算，雖然用機器可以增加效率，但是他不管這些。因為一切都決定於利潤，我們的工具比起目前技術與科學的可能性來就落後的多了。只有一個國家，它是經常把工業設備放在最現代的技術和最進步的科學水準上面的，這就是蘇聯。

只有製造死亡的工業，軍火工廠是被無條件的鼓勵着；不停的在改良着裝備，用錢是不計一切的。資本主義的一切有權威的創造都用來增加着那些製造死亡的工具上面。

但是從軍備競賽一開始，對於軍備生產的機構發生極大的疑惑！衰老的資本主義在憂慮着，它的著名理論家之一卡依俄發出可怕的嘆息說：『濾清技術！細鎖起科學的普羅美修斯！』

（普羅美修斯盜火給人類的神，象徵人類化的創始者，因盜火而被細鎖起來，釘在高加索山上。）

這個科學的普羅美修斯，共產黨將把他釋放出來。

雖然資本主義有這些夢想，但是它無法可以後退到族長制和手工業的中古時代去。同樣的，

因爲它帶着托拉斯統治和巨大的私人壟斷特性，使它無法再回轉去成爲十九世紀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只知道採用科學去組織勞動以增加利潤。它不顧勞動者肉體和精神健康的損害拼命加強效率。合理化的結果不僅大量增加意外的不幸事件發生，並且使得現代工廠工人的身體和精神受到極度的損害。繼續資本主義的合理的將是人類的合理化，這種合理化乃是節約人工提高生產水準的合理化。

確定消費品的製造，確定生產手段的使用，確立新生產手段的創造，確定保證工業運進的必要投資，確定勞動時間，這是計劃經濟的經濟計劃中的幾條要素，這種計劃經濟同時也是有意識的有遠見的經濟。這樣我們就可以實現人類對經濟力量的領導了。

那時生產將極度迅速的增加，因此也就使得工作時間大量的減少。在目前，我們的總生產比一九一三年的只是略有增加。在一九三〇年，生產達到最高度時，也只不過比戰前（一九一三年）增加百分之四十而已。若是盡量使用法國的生產能力，使這些能力服務於集體，幫助和增加新的技術上發明，可使法國開始一個幸福的新紀元。

有人曾經計算過從一九三三年以來，文明的人類曾經毀壞或是讓它毀壞的生產品總量，足夠三千萬人過着豐衣足食的生活：這個人數也就正是符合於官方公佈的失業工人的人數。

在一八三〇年，根據美國的統計，生產一普倍爾的小麥需要五十七·七點鐘的時間；可是在一九三〇年只需要三·三點鐘的工作時間，這是因為用了收割康擺因機和拖拉機的原因。

一個最好打毛線衣的人若是用手來打，一分鐘只能打一百五十到二百針；可是用多根垂直線機器，一分鐘可以打三十六萬針；用雙料環形機來打，一分鐘可以打四十八萬針。

在一八三〇年，一雙皮鞋需要一個工人的兩天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只要一個鐘頭。從一九三三年起，在斯林就存在一種機器，可是沒有被採用，這是因為它作皮鞋是不要工人去管的，只是要人去穿皮鞋帶子而已。

在一九一四年，製造一輛汽車，要一千五百個鐘點的勞動，在一九三四年只要二百三十個鐘點。因此，人力是經常可以減少下來。

這些是技術上科學上的可能。可是目前的制度在反對着這種可能。共產黨人是唯一願意和能夠把人類親善和物質豐裕的新紀元引到人間來的。在我們的今天，科學是向着正義走的。資本主義是停止科學的前進和阻礙正義的。我們應當相反的，把正義和科學協調起來，既然這已成爲可能作到的事。

郎之萬教授曾寫道：

「法國的電力設備是他所有的動力中最薄弱的一部份，雖然如此，它是一個供我們每個

人趨使的溫和。有教育，有訓練和很健全的奴隸。因為有發電機，使法國人佔有四千萬個很健全，很溫柔，有各種不同和無限能力的奴隸。這些奴隸能使我们溫暖能使我们受涼，給我們光明，供我們消遣、服侍我們、料理家務、燒煮食物，能使我们感覺或是視聽……在他們這些奴隸的幫助之下，從奴隸工作中解放出來的我們很可以再現上古「神人」的奇蹟：『

在除去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經濟裏面，人民勞動的生產品全部歸之於全國人民。社會主義工廠裏的勞動者們享受他們自己勞動的生產品所得的利益。首先是按照個人，以後是按照整個國民集團的成員，把他們所生產的價值以工資的形式，和以經濟、社會文化經費等形式來歸還給他們。剝削和剩餘價值的結束也就是寄生蟲的消滅。工作時間的縮減，使得一切生產過剩以及隨之而來的那些貧困與苦痛都不可能再現人間。人類用他日漸增多的空閒時間來致力於自己的修養和自己的發展。

＊

＊

＊

讀者現在一定更好的懂得，為什麼一九三六年大選中我們共產黨勝利以及以後共產黨繼續發展的原因了。它在大選以後飛快的經常的增加黨員的數目，在現在一年中增加了三倍，現在達到了三十五萬黨員。

這是因為共產黨懂得實行一種現實主義的政策，這種政策是完全適合與法國的條件的，（當

然它從不會忽視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共產黨是人民戰線的創始者，它並且在法國創造了一種經久的政治氣候。

它的目的是建設一個人類平等的新社會。但是共產黨從未忽略在客觀限制下的日常鬥爭，它知道，就是在現在社會的範圍內，是可能進行反貧困的鬥爭以及引起經濟活動的復興。

『就實際上說，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定的，引導一切他人前進的一部份；就理論上說，他們比無產階級其餘羣衆更長於了解無產階級運動進行的條件以及其總的結果。』(見「共產黨宣言」)共產黨的勝利我們可以拿三個原因來解釋它：

一、它有明確扼要的綱領，是完全符合於時代的需要，以及符合於法國人民偉大的民主傳統；

二、黨的組織，籠罩着全黨的氣氛是：充滿着樂觀與自信心，雄偉的親愛團結着一切黨員，黨員們對事業的忠實，他們生活的嚴肅和正派；領導人品質才幹的優良，這些人如馬賽爾·加善，查克·杜克洛，馬賽爾·希東，昂特萊·瑪爾梯以及其他同志。

三、共產黨的具體設施，這些設施普遍於它的創造活動和它的權力所能施展得到的地區，最顯著的是在共產黨握政市區裏的一切創設。

共產黨懂得在當前經濟要求鬥爭中和保衛共和自由的鬥爭中把中間階級與無產階級聯合起

來。再加上黨的保衛和平和反法西斯鬥爭的努力，我們就懂得它的發展和它在社會各階層人士中影響的巨大的原因了，這些階層的人士們在那時以前對黨還是陌生的或者說是反對的。這就是戰術。

黨的組織，它內部的健全生活，同志們熱烈的友愛精神，它在鬥爭中的堅強和奮不顧身的精神，使得到處民主勢力建立起反法西斯主義的生動壁壘，在這壁壘前排站立着共產黨人，這一切獲得了法國勞動者對我們黨的熱烈同情。

反動的人把我們形容成爲莫斯科的僱傭，是一羣沒有創見沒有政治智慧只等克里姆宮的命令的人。這是多麼的神經錯亂！我們日常的鬥爭和我們的生活是我們很好證人。我們小組裏討論，支部討論，地方黨部的討論，表明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民主組織的大黨。至於我可以自傲的表明我們是保衛蘇聯的最好的保衛者，那是在表現着法國工人同情他們蘇聯同事的深切意志。共產黨不同其他黨一樣，它形成一個親愛的大家庭，關心和幫助它的一切黨員。在危險時，它毫不猶豫的要求它的黨員作最完全最英勇的犧牲，但是它知道『人是最寶貴的資本』。（斯大林語）

共產黨人並不是像人民敵人們所說的是宗派主義者，是淺見的偏激主義者，相反的，他們是最人道的人。生長在資本主義制度裏面的人們是會有缺點有弱點的，這是因爲資本主義迫使人們改變本性和強授人們以奴隸身份而產生的東西。但是共產黨人總是設法使他們從這些缺點和弱點

中解放出來，使他們變成先鋒隊的戰士，成爲爭取將來的拓荒者。

在決定某一種情況下，黨在確定方針之前，每個黨員，從下到上，都在他的組織內部進行討論。在科學社會主義所確定的總原則之下，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表他自己的主張來說服他的同志。戰士們的個人價值在內部討論的過程中充份表現出來。若是一個黨員被大家認爲是在正確路線上，他的主張就會很容易的得到勝利，並且其他黨員們將同意於任命他去作適合他的才能和他個人價值的工作。等到討論結束並且要付諸實行的時候，每個人都要服從多數人的意見。全黨像一個人一樣的照着指定的路線前進。被選出的中央，乃是注意着全黨決定的那些東西的實行，它不能離開總的規則。所選出的上下議院的議員、省議員、市議員等，每個人在他的範圍之內實現這些決定，並且始終是處於中央的管理之下。這是民主集中制。

在一些大的金融公司統治之下的國家裏，政治的無恥事件是經常出現的，許多被人民選舉出來的議員陷入金錢的泥坑裏，許多公開的變節，表示出那些投機者善於騙取工人的信仰。大資本像收買東西一樣的收買和役使那些出賣者們，黨在選舉中向勞動者所提出的候選人們，事先必須要經過許多考證才成。

共產黨從未遇到有一個黨員會被無恥的大金融政治射出的泥濘所沾污過。他們入黨時是貧苦出身，在黨裏仍然保持着他的貧苦身份。被選出的議員們，他們仍然服從我們的規則，忠實於一

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英勇領袖們的榜樣。如同馬克斯所說的：

「他們樸素的，有意識的和有效的，成他們的事業，並且進行工資的增加，他們的最高工資，據一個科學權威認為，只有倫敦學校指導所一個書記的五分之一。」（見「法蘭西內戰」）

這唯一的條件，排斥了那些把自己事情放在前面，把選民事情後面的投機取巧者們。

若是說我們不知道坐在沙龍裏向富豪們說話，（他們是想拉我們進沙龍的，）在相反的方面我們是善於向人民去衆說話的。我們不向工人階級說謊。不向他們施用詭計，不空口答應他們我們作不到的事情。

共產黨不僅只關心它的戰士，它並且照顧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妻子，他們的孩子。它要使每一個戰士成爲黨的人，同時也是他家庭的人。它不是把人民戰士從他們家庭裏奪取過來，它要把他們的家庭併入民主戰士們的大隊伍裏來，就是他家庭的人員不是黨員，黨還是親愛的對待他們，保護他們。一個共產黨員，當他感到或知道黨沒有忘記他所親愛的人時，那麼他的任務就會很快樂和更加容易的完成。

因爲丈夫加入黨，而使妻子感到孤寂，這是不應當的。一個戰士是需要有空閒時間去陪他的妻子，去注意他孩子的教育的。他應當能够把比他落後的家人帶進我們的遊藝會和我們的擴大會

裏去。

共產黨不是夢想者，幻想者，說空話者或是教條主義者們的黨。它是實行主義者的黨。關於這點，在我們握政的市區設施上已經充份顯示了出來。

黨的工作，使得黨獲得了羣衆熱烈的加入，也獲得了它的敵人們的尊敬（雖然他們在謾謗，在恨）。著名「紅色環帶」（共產黨佔優勢的巴黎四郊——譯者註），我們的敵人會把它形容成破爛地帶。他們說在那裏共產黨在蹂躪着和在利用黑暗與貧困在準備着「非常的夜夕」，可是就實際情形來說，這是許多與盛城市所組織成的一個環帶，這些城市之所以發展，乃是在共產黨掌握市政之後，並且在那裏，共產黨的影響是在不停止的增長着。資產階級的法律用各種條文來阻礙着共產黨的活動，反動者盡力的反對和破壞我們設施，可是我們的成績也同這些反對與破壞成爲比例，日漸增大。

我們的努力不會空拋，法國人民對我們熱烈的愛，這是我們所得到的報酬。

不僅只是敏感的、自動的、勇敢的法國勞動大衆才了解共產黨，智識分子也大批的加入了黨。馬克斯·列寧主義已經滲入了各個專門學院。雖然官方大學是守舊的，可是十多個著名教授加入了我們的隊伍。現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藝術家們贊同着共產主義。這種最偉大的知識份子的參加，在我們這個時期，並不是意義很小的一種現象。無產者熱烈的歡迎着這成千上萬的思想家，

學者、科學探討家、圖書專家們，這些人同法國人民的直接接觸，表示精神與思想的真正的再生。

這些走向人民，同創造一切財富的人們混在一齊的知識份子，他們深視到法國的根源，尋找到藝術和文學偉大創作的第一個泉源。他們知道共產黨是法國的繼承者，法國優良傳統的正式繼承者，法國文化的真實代表，它是一個富有反對愚民主義，爲人類精神解放而鬥爭的偉大思想家血統的政黨，這些思想家是從喇伯萊 (Rabelais) 到狄德洛 (Diderot)。這種政治和社會成熟的鮮明圖畫引我們愛護過去的事物。在這資產階級藝術向無意義、平凡和荒淫無恥深淵墮落的時候，大家看見有些共產黨人俯在地上，去找尋羅馬時代高盧族的廢址，去探究塞爾特人的碑銘或是野蠻人的墓穴，經過許多世紀的間隔，來找尋已失去了的人類文化進程的里程碑。我們的優秀戰士之一，瓦塞爾 (Marius Uzeilles，一九三六年被高來斯地方人民選爲下院議員)，藉助於在畢摩斯山間發現的古物，向當地農民講述社會的進化是從古代社會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它並且引導着在人剝削人制度下無窮的犧牲者，走向共產主義社會，走向將來無階級的社會……

這樣，共產黨正當的繼承着獲得許多成績的過去，同時它爭取領導法國走向更高級命運的鬥爭地位。

共產黨戰士把這個樸素的冊子獻給他的勞動弟兄們，獻給他的鬥爭伴侶，獻給一切貧困苦痛和希望將來的人們，他堅信：在暴風雨襲擊着世界的時候，人類的船是不會沉淪，不會在那些野蠻的礁石上被撞碎，而是，在法國人民的激動之下，在他們那高尚理想降生為今日的共產黨人的情形之下，它正像詩人所說的，走向光明、自由和博愛的將來。

向着照耀人間的科學，

向着災禍的死亡，向着英勇的犧牲，

向着豐富，向着和平，向着笑向着幸福：

這艘光榮的船啊走向前進……

一九三七年九月

寫於依弗里·袖·察納

第八章 誰出賣了法國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康邊附近的勒屯德，貝當元帥的代表同德國簽訂下可恥的降約，這個康邊地方，正是二十二年前福煦元帥命令德國代表接收法國勝利者的條件的地方，這個降約把法蘭西交給了他的生死敵人——希特勒。法國的對德戰爭不到六個星期，軍隊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人民在茫然不知所措。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計有五百多萬法國軍隊，在西歐本是首屈一指的，現在崩潰了；政權也崩潰了，國會和政府驚慌失措，成了第五縱隊的玩物，一切政黨都崩潰了，只有法國的共產黨是例外，在這種最困難條件之下，一刻也沒有停止的揭露着反對法國的陰謀。崩潰是物質上的，也是精神上的，經濟的也是政治的。接着崩潰而來的是混亂的開始：一千萬人——法國人口的四分之一，流亡在街頭；生產和商業停止了，運輸停頓了，郵政電報的聯絡也斷絕了。

投降份子利用他們自己造成的崩潰和混亂，匆忙的和希特勒進行談判，目的在利用失敗和外來的侵略以謀取私人的利益，以防止人民的覺醒和憤怒，以保護自己，因為人民正像一八七一年塞當投降和巴黎陷落後一樣，從心坎裏喊出反國賊的吼聲。僅僅簡單的敘述一些過去的史實已足

够證明人民對統治集團所控訴的罪狀，是充分有根據的。

大家知道，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了台，他對法國造成了可怕的威脅。德國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燃起了復仇的情緒，並復活着帝國主義的思想。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裏說：第二次戰爭是一定要來的。開始就必須孤立起法國，使這次戰爭不再是德國對全世界的鬥爭……德國應把消滅法國當作使德國人擴張領土的方法。

這樣，法國人已經是受到當前的危險將來的警告。有些人嚴正的注意這種威脅，有些人完全閉起眼睛來否認威脅。可是法國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清楚的認識危險在威脅着法國。在統治集團裏，在決定法國經濟、政治的「二百家」裏，和在二百家的代理人裏，開始是否認希特勒的危險，以後公開的幫助着希特勒的勝利和促成法國的失敗。

無忌的，首先是反對工人階級的活動者和有組織的德國納粹恐怖，自然的引起法國勞動羣衆自衛的反感。他們知道希特勒主義上台的主要原因是因爲德國工人階級的分裂。這種分裂乃是社會民主黨所引起所支持的，法國共產黨把社會黨中的工人吸引來共同反對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第一次實現暴動企圖的法西斯匪幫鬥爭，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在羣衆的壓力之下社會黨不得不贊成羣衆對統一戰綫的要求，而簽訂統一行動的協定。不久之後在共產黨的建議之下，又建立了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參加者有共產黨、社會黨、急進黨、工黨同盟（它經過十五年分裂後，

重新聯合起來的）保障人權同盟、共和退伍軍人協會、人民救濟會。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在城市裏——在工人、公務員、小職員、小商人中間有絕對優越的勢力。在鄉村裏——在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的中間，特別是在素以左的傳統著稱的，西部和中部的法國各省，人民戰綫也有很大的影響。

一九三六年國會選舉結果，參加人民戰綫的各黨佔了多數。無疑的，如果人民戰綫綱領能被正確的執行，一定會使希特勒陰謀已久的對法侵略，感到極大困難。人民戰綫綱領如果實現，一定粉碎大企業在國民經濟和軍火生產等部門的怠工，第五縱隊份子也一定會遭受失敗，在萌芽時就會被悶死在土裏，而使之無法分裂和破壞民族精神和物質力量。人民戰綫綱領的對外政策，絕非「干涉」政，絕非「慕尼黑」可恥的投降（慕尼黑是反民主與和平，首先是反法國的黑暗陰謀）。

有鑒於危險日增，法國共產黨在它團結法國民族的政策上，更作了進一步的努力。它不顧反天主教份子的嘲笑，向勞動人民裏的天主教徒伸出友誼的手來，向中間階級的下層，向被欺騙而加入法西斯團體的農民發出呼籲。它號召成立法蘭西戰綫（見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宣言）。

從人民方面，從工人階級方面，從共產黨防止希特勒危險和拯救法國的觀點來看「經濟協會」的活動是特別引人注意的，它是「鋼鐵工業委員會」和其他托拉斯們。這些經理們雖然不能

對他們德國競爭者地位的加強（這是希特勒主義存在本身的意義和目的）漠然無視。但是鋼鐵工業委員會的大資本家却希望得到一種保證他們利益的協定。在他們看來，希特勒是他們特權階級可靠的保護者，用以反對勞動大眾的合法要求。金融寡頭們、大工業家們、富豪們、大地主們絕對不承認希特勒有危險性，至少對於他們的私利是沒有危險的。他們害怕法國人民更甚於害怕希特勒，特別是在法國人民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給法西斯暴動企圖以有力打擊之後，「秩序」報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四日，慕尼黑會議的第二天，它說：『在我們民主事業中，一些金融和工業的領主們爲着自己階級的利益和追逐利潤，正進行着失敗主義的玩意。』

大多數企業家從來就不同意工人階級由鬥爭所得來的新社會立法、集體合同、保證最低限度工資規定、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休息日照付工資的規定、工人有選出工廠代表權的制度。這些企業家有意識的瓦解國家經濟生活，破壞社會立法的實行。他們完全接受一九三六年國際勞動局與法西斯代表給法國企業家代表隆伯爾·里波的勸告：「壓制工人階級的唯一辦法就是關閉工廠使經濟生活停頓。」豪富們向國外輸出他們的資本；工業家延緩自己產業的流轉，鼓勵衝突和罷工，以便藉口關廠，特別是在軍火工廠中。他們這樣作的藉口是說勞苦大眾懶惰，和四十小時工作制不對。工人的職工會在這個時期收集了許多確實證明企業家罪行的材料。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出版的一個小冊子內，載有一個大飛機工廠工人的聲明是：『有許多現代的新機器，一天至多工

作二三小時……在裝配的時候常常短少零件。』『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製造了四十架飛機以後，生產停頓了幾乎一年。』『兩種式樣的飛機剛剛停止生產，其中有一個式樣是一九三五年設計的。這種飛機的製造在一年前，因為缺乏摩托而中止了，而這種摩托乃是彼厄諾工廠運到國外去了。……』『在我們工廠裏，鋁合金不夠用。這真是天大的醜事：鐵難只有法國生產最多，而它却是每天向德國輸出！』大家都知道，法國乃是航空事業的鼻祖，汽車的生產每年超過三十萬輛。由於企業家怠工的結果，法國軍隊到戰爭發生的時候，沒有必要數量的飛機、坦克和其他種類的軍事技術器材，而這却是出於一個通常輸出鐵和鋼（每年平均輸出半製品和製成品四百萬噸）並且握有高度發展的機器製造工業的國家。

不僅是失敗主義企業家的怠工，還有那無能和腐敗的總參謀部，他們既無遠見又是糊塗。法國總參謀部不願無數次的警告，堅決的不肯信任摩托戰爭。它保持着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時那種陳腐觀念。在這次戰前不久貝當元帥給軍事學校教官語文科將軍所著的一本書寫了一篇序言，完全否定了飛機和坦克的效能。根據這種理論，身為軍政部長、貝當元帥，在一九三四年全年總共只定購了七輛坦克，而這時希特勒却在瘋狂的重整軍備。

魏剛，這個會作過長期法軍前綫司令的傢伙，在甘末林崩潰之後又重新率領法軍了，他也是不相信「摩托化的現代武器可以在戰略和戰術上產生革命」，可是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九年這

個時期中，法國在國防上僅化費了四千萬萬法郎，而馬奇諾防綫的修築倒佔了二千萬萬，這個馬奇諾防綫，在一九四〇年完整無缺的交給了德國人。

戰爭的前些年，法西斯集團，特別是蒙面黨分子（法西斯組織）的破壞和反民族活動是當時的特徵。這些集團的團員，一部份是從大工廠工頭裏面一部份是從反動的軍官裏面招募來的，蒙面黨份子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裏取得武器，來幹殺人和挑撥的勾當，如在巴黎布萊斯堡他們炸燬了一座企業家的住宅以嫁禍於工人。他們和希特勒公開的走狗陶里歐匪幫狼狽為奸。

在那時，間諜阿居斯還組織了一個「法德」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成份是很有趣味的：主席斯加歇尼現在担負欺騙法國俘虜的工作；總書記德普尼農，作了維琪政府駐巴黎的代表，他是三色軍人協會的主席；其委員如比特理，貝當派到佛郎哥那裏的大使；安里厄，維琪政府駐美代表；白爾熱里，現任駐土大使；阿伯爾·龐納，法蘭研究院會員；賴伐爾，政府團員；讓果意，退伍軍人協會主席，一直到他死時為止都是熱烈擁護與德國合作的一份子；俞爾·羅曼，作家，出名的慕尼黑份子，在美國因著了幾本反蘇的作品，而臭名遠揚。這幾個人的名字說明了希特勒會企圖如何的滲入法國各界，如何影響各社會階層：中間階級，知識份子和退伍軍人等。

在工人階級中，儼社會黨總書記布爾福和總工會書記伯倫之類的人，也爲了希特勒的利益，進行其分裂勾當。當他們努力從內部破壞人民戰綫，促使民族力量的分裂，宣傳可憐的反動的和

平主義，其目的是企圖爲敵人解除工人階級和一切真正法國的精神和物質武裝，讓敵人以全副武裝乘機向法國（把它當做容易獲得的目的物）襲擊。在有一次教員大會上竟有一個社會黨員，大膽的喊出這樣的口號：「與其死去，不如做奴隸！」

這些「和平主義者」非常熱烈擁護所謂「不干涉」政策。他們和變成失敗主義的軍火商人談判，公開的（如拉羅克之輩）或是秘密的（如德阿之輩）和法西斯談判，以便盡可能迅速的絞死西班牙共和國——這個在西方抵抗希特勒血腥與污穢狂流的（這狂流以後淹沒了歐陸）最後堡壘。

不僅這樣，並且在希特勒剛上台時，法國政府就向他暗送秋波，企圖簽訂無恥的四強協定，雖然這協定在慕尼黑才簽成，並且不久就粉碎了。一九三五年一月，賴伐爾簽訂羅馬協定，把阿比西尼亞出賣給了墨索里尼，接着就是對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意大利法西斯所進行的經濟和財政制裁開始公開怠工。但是蘇彝士運河股票却由於意大利軍隊和軍火的擴張的運輸有了「顯著的」上漲。一九三六年八月，在實行「不干涉」政策之初，希特勒的使者沙赫特博士曾宣稱：她「願意指出共產主義宣傳的危險」，最後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可恥的出賣了捷克。保證法國安全的同盟體系受到最後的打擊。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里賓特羅甫到巴黎，簽訂所謂「法德友好宣言」，這是慕尼黑政策的勝利。至於法國統治集團對保證法國安全的法蘇互助協定實行怠工，那更是一言難盡的了。希特勒對法國侵略的危險愈增長，寶國的統治就愈鼓勵反蘇運動，愈陷法國於孤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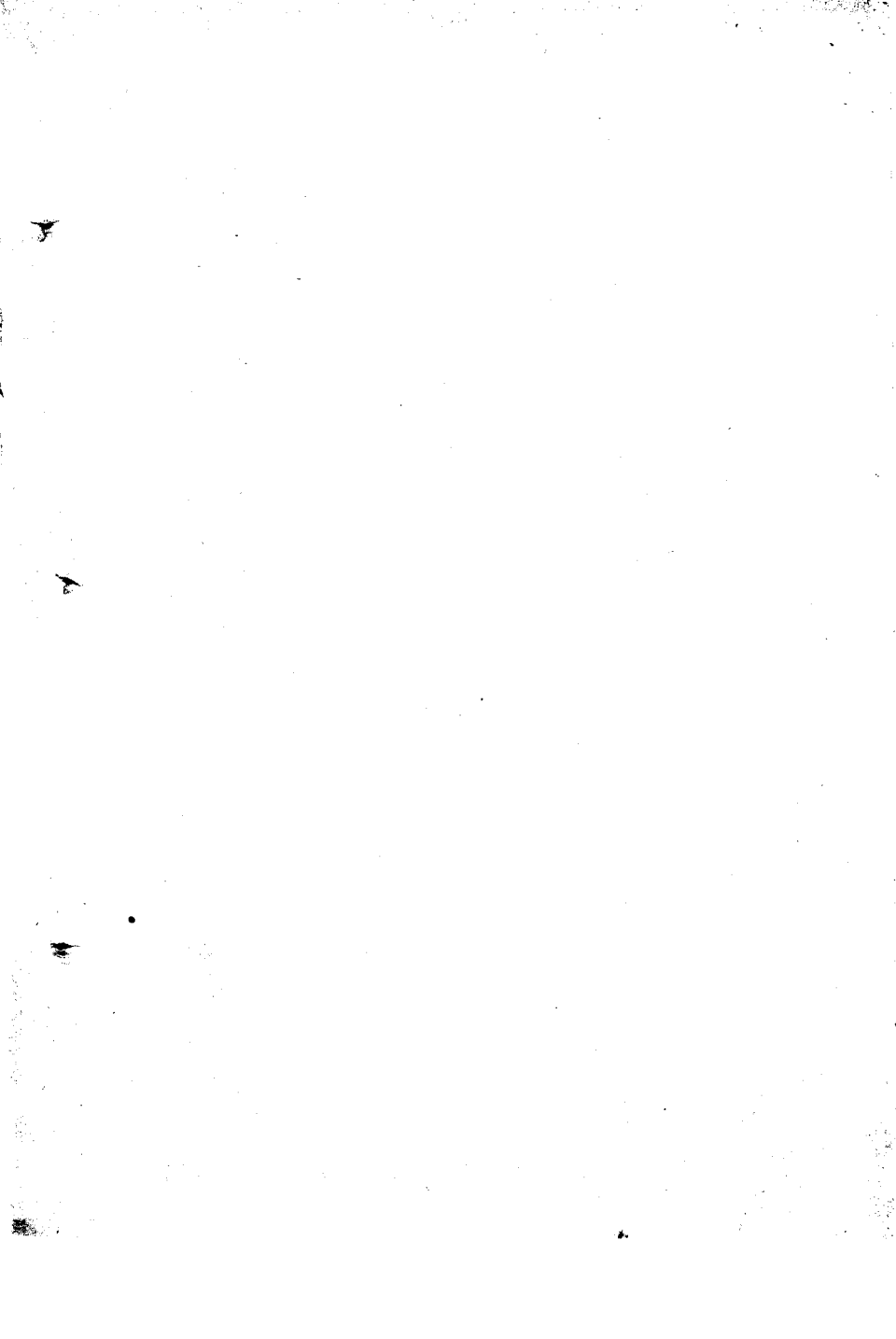
不僅如此，當戰爭爆發之後，法國統治者想得最多的不是對希特勒德國作戰而是對蘇聯作戰。他們緊緊抓住芬蘭的挑撥給他們造成的機會，準備派遣遠征軍到芬蘭去打蘇聯。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二日達拉第內閣總理在下議院聲明說：「二月二十八日以後遠征兵團五萬人已集合於兩個港口，準備開赴芬蘭。」此外敘利亞還集中了一支十五萬人的大軍，準備用之於對高加索的軍事行動。甚至和土耳其進行談判，企圖獲得空軍基地來轟炸巴庫和巴統。

「奇怪的戰爭」（這樣說是因為在戰爭初期和德國很久沒有軍事行動）開始了。統治集團不是對德國進行戰爭，雖然德法處於正式交戰狀態中，而作戰的對象倒是法國人民、工人階級、它的組織代表和份子的活動。共產黨被禁止了，唯一的藉口是說它忠於法蘇友好政策，關於這個政策的巨大意義，當時已為全人民所了解，以後更為他們所認識。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慕尼黑份子外交部長喬治·龐納允許德國大使任爾齊克伯爵說：「選舉將被停止，禁止公開集會，共產黨員被鎮壓。」（見黃皮書一四九頁）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內政部長公佈他的「工作報告」，裏面有這樣一段：「共產主義者的選舉權不再存在了。三百處共產黨佔優勢的市議會解散了，共產黨二千七百七十八名當選人（市議員和國會議員）的委任全部取消。兩個日報——發行了五十萬份的「人道報」和發行二十五萬份的「今夕報」——以及其他一百五十九個報紙被封閉了。解散了六百二十個職工會，進行過一萬一千次的搜查，解散六百七十五個有共產主義傾向的政治

團體。此外許多共產黨活動份子遭迫害，三月七日逮捕了三千四百人，其他還有許多被關在集中營裏，對信仰共產主義的公務員作過八千次的懲罰。」

但是這個總結還是不夠的，法國內閣閣員塞羅爾會頒佈了一道命令：凡是有宣傳共產主義嫌疑的法國人都要處以死刑。幾日之後，希特勒就開始了他對法國的進攻。第五縱隊的工作幹得真好。被剝削被分裂而又內部被破壞了的法國，也就跪在侵略者的面前了。



第九章 維琪的一羣

在康邊森林投降以後法國所發生的事件，可分爲三個顯明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侵蘇的那一天；第二個時期是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這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反攻，英美軍隊在北非登陸和法國艦隊在土倫鑿沉的有決定意義的一月；第三個時期是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今（一九四四年五月）尙未結束。第一個時期的特徵是：處於輕易勝利的極盛時代的德國，企圖把被征服的法國包括入「新歐洲」的範圍內。這是和佔領者合作的初期，也是反對侵略者和反對與德國合作的維琪份子的人民力求團結的初期，是人民抵抗萌芽的時期。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和德意停戰協定同時生效的法德停戰協定，包括下列各項：德國佔領了法國領土三分之二，特別是從比國邊境到西班牙邊境的全部西北海岸上除維持秩序所必要的軍隊以外，法國隨海空軍復員並解除武器（第四條）；將非佔領區內的全部大砲、軍用品、飛機、坦克、槍枝、拖引機和彈藥完整交給德國或置於德意監督之下（第五、第六條）；解除法國艦隊的武裝並轉交德意管理（第八條）；償付德國佔領軍給養所需的費用，最初每日四萬萬法郎（第

十八條)；法軍俘虜(一百五十萬以上)留在德國人手裏一直到和約簽訂時(第二十條)。

停戰協定支解了法國。佔領區和非佔領區之間的境界綫不可克服的障礙着任何政治的和經濟的恢復，並且在德軍佔領區內又建立有新的境界，德國人佔領了封鎖區北部和布·德·加萊等省，在行政上劃規了比國。德國則併吞了阿爾薩斯和羅蘭。他們計劃成立新的布爾貢第·佛郎德斯王國，國境是從北海和索姆河口一直伸到里昂，德國當然是她的保護者了。

法國成了希特勒對英戰爭的根據地了。同時德國開始有計劃的搶奪法國的財富，並把一切東西都運回德國去：麵包和葡萄酒，牛羊和馬匹，糧食和原料，製成品和工業設備，汽車、車廂、火車頭等等。不久，災荒開始了，除了成年人不計外。儼是兒童就餓死了一百萬。

可是把法國出賣給希特勒的無恥匪幫們却在忙着鞏固他們所掠奪的政權，乘着民衆慌亂、疲憊的機會，利用議院之怯懦無能，反動勢力迅速的增長起來。在波爾多被佔領之後，貝當——賴伐爾匪幫們躲在維琪，如同坐在賭場裏一樣，老闊賴伐爾在輪盤賭和紙牌中間大獲全勝，他在議會裏獲得五百六十九票對八十票的多數(並且在對反對票中間沒有任何人發表反對意見)，斷送了共和，「國會」同意自動解散，宣告了自己的死刑，因為它批准頒佈非常法，漸漸放棄立法權和監察權，並且主要的是任意剝奪人民對共產黨議員的委任權。

第三共和就這樣滿臉污穢的死亡了，一位降將參加了它的誕生，另外一位降將却又料理了她

的喪事，在它的墓碑上這樣寫着：「從馬克馬剛到貝當」。以後不久就出現了第一批可笑而可恥的法令，什麼「我們法國元首斐利普·貝當……」法國人於是看到了法國最可惡的敵人如此的從貝當背後爬了起來。

維琪份子帶着他們固有的偽善和對德國納粹惡性宣傳的奴性摹仿，打起所謂「民主革命」的招牌。在貝當的訓詞裏，賴伐爾的講話，德阿的文章裏，都常常看見希特勒在德國實行而已爲人熟知的那類詞句：什麼在反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管制經濟，和托拉斯作鬥爭，返回到農業中去消滅階級鬥爭，建立超階級的國家，進行道德和精神上的革新等等，他們說這就是「民主革命」的「原理」。

可是，事實是怎樣呢？維琪份子的反資本主義當然同希特勒匪徒的反資本主義一樣的，只是一種武斷詞句的欺騙，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意義。顯然地，要是什麼地方仍然存在資本主義方式什麼地方就沒有而且不能有社會主義，因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目的是生產資本主義利潤，它必然和人對人的剝削分不開。貝當就是資本主義利潤忠實的看門狗。在他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於聖·德·第安的二次演講裏，貝當對他周圍的工業家說：「我完全不希望你們放棄你們的努力所應得的報酬」。

至托拉斯和金融寡頭們，在投降之後在希特勒匪幫的監視之下，早就整個的被統治了。一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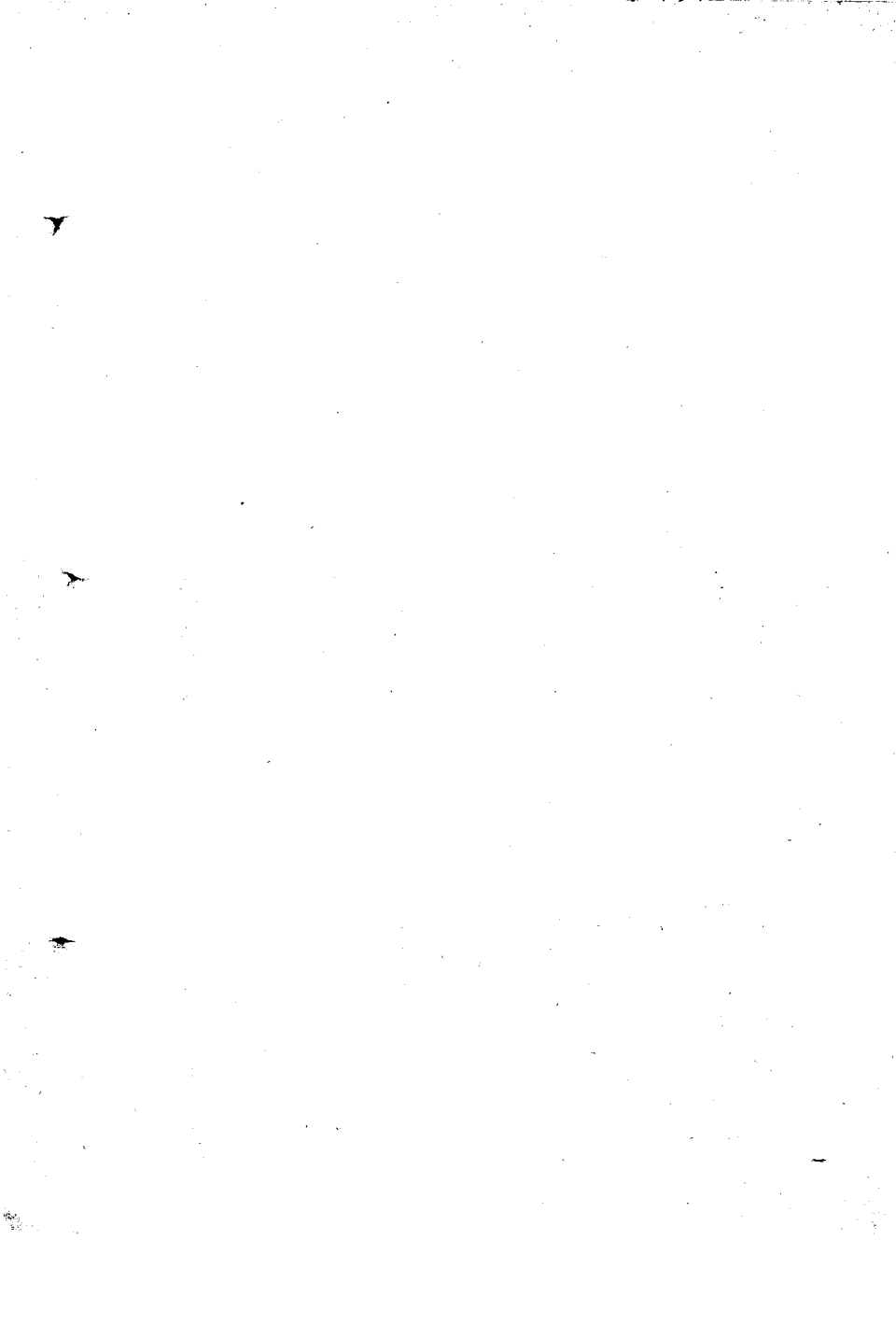
始，維琪份子就成立了一些經濟組織委員會，在名義上「被解散」了的企業家的組織委員會中所有的大資本家和他們的代理人又重新聚在一起。這些委員會被統一在萊德的權力之下，萊德當時是「法國經濟復興」總代表，九大公司理事會的理事，這些公司的資本總額達十一萬萬五千九百萬法郎。蒙面黨份子比塞不久代替萊德作了工業生產部長。比塞是亞普各工廠理事會的代表，以及鋼鐵產品出售物會的祕書。

比塞又是法國投降後機器製造工業組織委員會第一任主席。五金委員會的主席是勒斐埃克，是「歐洲金融企業公司」的經理，這個公司擁有資本七千萬法郎；它的主席是斯耐德爾，他的集團所控制的資金超過十萬萬法郎，煤炭工業委員會首腦是普賽，他是郎熱煤礦（擁有資本二萬萬二千五百萬法郎）的經理，又是比埃蘭赫夫（他是前煤炭工業委員會主席）管理下的許多其他煤礦公司理事會理事；化學工業委員會由龐完領導，這是法蘭西商業信託銀行（資本二萬萬法郎）理事會理事，又是庫爾曼集團的代表。在其餘所有經濟組織委員會的情形都是這樣，因此貝當自己也不得不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一次演講裏承認：「壟斷企業利用經濟組織委員會的制度來鞏固他的實力，」同時又說「這些委員會的目的在於給負責者以必要的權力來和德國進行交涉。」換句話說——也就是和德國「合作」，使法國經濟完全服從德國的需要。

所成立的許多法德公司，搶奪了舊有的企業使德國人保有多數的股票，在有些企業，保有資

本百分之三十五。但是「鋼鐵業委員會」的領袖們，碰到了第一次大失望：羅蘭工廠的整個集團完全被轉讓給戈林。甚至汪德爾集團也難免於消滅。汽車工業的工廠合併為加特爾，它必須根據德國人的指示來進行生產。德國規定汽車產量、式樣、材料、質料等等。大多數大航空企業也同樣合併成「國家飛機製造公司」。

先是貝當說了許多關於返回到農業的話。這一方面是反動份子怕工人階級的一種反映，妄圖停止歷史巨輪的幻想，另一方面也是對德帝國主義要求的讓步，因為德帝國主義力圖在歐陸工業獨佔的基礎上來建立它的政權，而使其他國家（包括法國在內）逐漸降到農業國家的水平。但是在法國農業最缺乏的不是勞動力而是機器、肥料、精選的種子、信用貸款、良好的道路、電力等等。事實上，法國在戰前所出產的糧食已經超過本國需要（從七千五百萬到九千萬生丁納）。同時法國農民受托拉斯的剝削比那國都厲害。維琪政府並不會想改變這一狀況反而使之更加惡化了。第一任農業部長是加華歐，法國農業銀行理事和法國農產協會會員，該會主席德·弗厄厄是大地主兼庫南曼肥料公司和幾個運輸農產品的大鐵路公司的理事。第一任糧食部長是阿樂爾，他是牛奶托拉斯的總管理，他廉價的在農村收買牛奶，高價賣給城市居民。這種可恥的買賣，使得貝當也不得不把他撤換了。繼加華歐之後的是銀行家拉多里，他曾在戰前資助過以德·阿呂安（陶諾萊斯）為首的「農民黨」。



第十章 人民的苦難與反抗鬥爭的開始

佔領區和維琪統制區的農民，都處在托拉斯高度剝削和希特勒匪徒的搶劫和壓迫之下，生活日益惡化下去。德國人徵糧食、草料、牲畜、馬匹等等。維琪政府所組織的各種公司，則以可笑的低價掠去剩餘的物品。還有八十萬農民在德國作俘虜。法國農業衰落和破產的速率加快了。收成減低了；糧食的出產在一九三八年是七千四百萬生丁納，到一九四一年降到六千四百萬生丁納，一九四二年更降到五千四百萬生丁納。一九四二年出產葡萄酒三十五萬萬公升，也就是尋常的產量的一半。糖蘿蔔收成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農民完全得不到工業品，甚至連釘馬蹄的鐵都沒有，收割機用的細繩也買不到。

維琪份子武斷的喊着反對官僚，藉以騙取農民的同情，可是另一方面，他們組織了一羣農村的監視員，甚至設立「牧場的國家管理局」，決定販賣和轉運雞蛋，家禽和家兔之類。農民，要是不繳足所要求數量的雞蛋、牛奶和油類，就被大量罰款，德國佔領者還在羅蘭和康邊大規模的搶奪農民的生產物，希特勒匪徒把法國人從住宅和祖先耕種的土地上逐去，使德國人移住在那裏。其餘的小塊土地則併成大的領土，轉讓給德國「東歐」公司，該公司耕種地面在二百萬公頃以上。

「民族革命」給農民的就是這些。

在一九四〇年六月，貝當提出了「消滅階級鬥爭」的口號，但是他的全部管理，就是「二百家」的管理，就是有特權的寄生蟲對法國廣大人民無止息的階級鬥爭。當然，貝當和他的匪幫們希望這個鬥爭的勝利是屬於一方面的。他們消滅了個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職工會最後殘存的自由，建立了間諜和告密的體制。由於停戰而復員的海陸軍中最反動的份子，被安置在行政和警察機關的各部門裏，對工人、對愛國者、對人民更加嚴酷的鎮壓。同時維琪政府又制定了一部有名的「勞動憲章」，這又是從納粹那裏抄來的一套。根據這個憲章，企業家、技術人員和工人都統一起來，「工人的委員會」乃是企業家、技術人員和工人的統一的組織，其任務在「實現合作並使一切社會和經濟措施彼此調和起來」，同時又建立「社會」委員會，把企業中的工人統一起來，「工人委員會」委用企業家所組織的委員會同時活動，以準備雙方合流起來。這樣「作為法國將來的偉人所希望的合作社」（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貝當演說）就成功了。自從維琪叛國份子高唱「勞動憲章」以來，很快的就四年了，在這四年的中間，他們亂發法令，混亂得一團糟，但是在「一團糟」的情形之中，有一點是非常顯著的，就是解散總工會，企圖御用職工會。可是總工會和天主教工會以及其他職工會和工人，都不分政見和信仰的聯合了起來，反對貝當的奴役憲章。

「民族革命」被描寫成爲法國人民一種特殊的「道德和精神的革新」。實際上這種「革新」

就是復古。法國大資產階級很久以前就排斥了它在反對封建英勇鬥爭時期所宣揚的自由主義，但是在法國「宗教國人民所必需」的這種理論，從來還沒有像在維琪統治時期這樣公開的宣佈過。教會重新成爲國家機關。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的法令又把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後共和國收爲國有的財產一部份歸還給教會。貝當和他的部長們常以隆重的排場參加宗教儀式，波爾·雷諾（投降前最後一位內閣總理），就是第一個例子，當德國正向巴黎進迫的時候，他還親身參加宗教儀式。他們想使羣衆相信：失敗是法國罪惡所應得的公正的神的懲罰。天主教報紙「東南共和國」寫道：「法國的失敗是有好處的，因爲它使元帥有可能復活法國的靈魂。」如果說法國天主教徒的基本羣衆保持着對法國的忠心，那末大部份最上層的僧侶們一開頭就很積極的支持貝當以及他向德國屈服的 policy。死去的主教波多里阿爾就是積極的希特勒份子。另外一個主教曾經喊過：「貝當就是法國，法國就是貝當！」在學校裏恢復宗教課程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因爲人民有力的反對，終於迫使得維琪讓了步。但是學校課程還是經過了重新審查。法國歷史在極端反動和反法蘭西的精神是被修改了。教科書裏歌頌法國大革命、它的原理、它的功蹟、它的影響的詞句都被刪去了。維琪政府並且無恥到下令不許談起法國人民在幾世紀之內對德國戰爭的勝利，如布宛之役，瓦爾米之役。他們逮捕不信教的教員和愛國者。極端反動的陰霾籠罩着整個法國，維琪政府頒佈過許多種族法和反猶太人的法律。高級軍官和「良善的」人們破天荒第一次發現了在他們中

間有猶太祖先。以前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這些，巴黎人四五代的後裔，也不得不帶上黃色的星章。

投機份子的他們的「民族革命」會作了不止一次值得注意的供詞，認為在康邊森林投降後的一九四〇年法國的處境，比拿破侖失敗後法國所遭受的恐怖更是糟糕。一九四〇年戰敗的法國被佔領了，被支解了，被污辱了，而且被屈服在外國人所建立的反動派專政政府之下。在一八一五年，則只是反革命的勝利和布納巴王朝的重建歷史上的「復辟」。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時報」曾寫道：「民族革命」本質上就是「復辟」行爲，保皇黨米安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的「行動報」上寫道：「如果害怕把那些成爲顯明事實的東西叫做反動，那麼爲什麼不用「復辟」這個名詞呢？這樣不是更適合嗎？」該報不久以後（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七日）更露骨地說：「反對革命，這就是新政權的任務。革命之樹應連根拔去。」

極黑暗的反動勢力就是這樣穿着「民族革命」的騙人的外衣在實行着統治，這就是與德國的「合作」，就是把法國全部資源供獻給希特勒而已。

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佔領區內地蒙杜勒地方，希特勒和貝當見了面。目的是正式「宣告合作」。這次會面是賴伐爾佈置的。爲了欺騙人民，他們說：停戰條件可以根據法國利益加以修改；德國人會退還一部份佔領區，界線可向北移一些，俘虜將被釋放。每日付給德軍四萬萬法郎的軍担可以減輕等等。爲了換得這些空幻的許諾，他們要求法國人爲德國效勞，幫助殺

自己的劊子手希特勒。大工業資本家當然興高彩烈地歡迎官方對合作的公開聲明，因為他們預料可以獲得大批利潤。此外，他們同樣的談論着：「在交還時，我們完整的保全了我們的工業機構，我們掌握着和控制着大量的勞動力，因為希特勒和貝當使我們解脫了共產主義者和進步份子的威迫。」「鋼鐵工業委員會」的經理們早在戰後世界市場上佔有優越的地位，可是這些打算，就以後的事實來看，都失敗了，並且給法國造下了巨大的災難。

除了大資產階級之外，「合作」在其他階層的人民中間，並未獲得任何成功。它一開始就威脅到工人、農民和手工業者，就是一部份金融家——和殖民地剝削、對外貿易、造船和海運等有特殊密切關係的金融家和工業家，他們也認為英國絕不會像賴伐爾所預料的那樣，在法國投降後三星期內就會屈服，並且美國還沒有說出它最後的話呢。在這個集團裏，人們一面警惕着不要和德國合作太密切了，另一面並不拆去他們和英美中間的橋樑，藉以保證自己的將來。

蒙杜勒會見之後，不久就發生了一種激發民族感情的事件：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一九一八年勝利休戰紀念日），德軍在巴黎的尚·埃里賽槍殺青年的事件。學生們組織了遊行示威向凱旋門下無名英雄墓進發，他們高唱「馬賽曲」，高呼着「法蘭西萬歲！」德國人企圖驅散遊行的行列，他們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了十二個，五十個青年受傷，於是整個巴黎被騷動的情緒籠罩了幾天。

幾天以後，不管維琪新聞檢查如何的嚴格，法國又知道了：德國人把法國農民從阿爾薩斯和羅蘭趕了出來。這些不幸者限定在兩天之內要離開他們的家，走時只可以攜帶自己的隨身用具，每個家庭至多只能帶五千法郎。他們要留下牲畜、農具、收穫物——他們全部的勞動成果。於是法國都知道，貝當和賴伐爾把阿爾薩斯和羅蘭送給了希特勒了。對於這事，只有共產黨發出了有力的抗議，這個抗議祕密地傳遍了全國。

德國人槍殺巴黎學生和希特勒強佔阿爾薩斯和羅蘭，給「合作」以嚴重打擊，使它一蹶不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貝當玩了一個手段，逼迫賴伐爾下台。接任的是達爾朗，他起用了佛朗丹和貝魯東，以後又起用比塞。這使反動份子和投降份子開始他們的「等待主義」，也就是等待政策的時代，這是想着「狼餵羊不傷」，或者換句話說，「腳踏兩隻船」。他們主要的努力是維持維琪政府幻想中的主權，想使人民相信：他們對德國佔領者有某種獨立特性，甚至還能反抗。但實際上，達爾朗和他們匪幫服從了希特勒的一切要求。貝當自己就說過：德國人把他放在繩結裏，什麼時候需要，就把繩頭拉緊。

爲了反對德國佔領者和維琪賣國賊，漸漸組成了有力的民族運動，在歷史上稱爲「抵抗」運動。這個運動在巴黎以及工人中心地區開始，這些地方人民抱有深刻反法西斯的熱情，並且法國共產黨有很大的勢力。勞苦人民和一切真正愛國者，誰都沒有忘記共產黨爲了防止災難所作的努

力。黨中央機關報「人道報」不管如何禁止和鎮壓仍不斷出版。報紙甚至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德軍進入巴黎的那一天照常秘密出版，解釋事變的教訓，揭露叛國份子，號召全國人民爲了恢復國家獨立和榮譽而團結起來。

在一九四〇年七月維琪政變後不久，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由各書記簽名立即發出告法國人民書，它這樣說：『法國知道自己失敗了，被佔領了，被凌辱了，整個法國正處在血泊之中，但是它希望自由、獨立的生活着。像我們這樣偉大的民族是永遠不會作奴隸的。它不會成爲殖民地國家。法國有它光榮的歷史，是不會屈服在卑鄙醜惡無惡不作的奴才羣的面前的。但是失敗的將軍們投機家們和破產的政客們，是不能復興法國的，他們只能背叛它，出賣它。民族和社會解放的偉大希望的根是生在人民中間。讓我們團結在熱情，豪放，光明磊落，充滿奮發有爲的工人階級的周圍，結成一條爲自由、獨立和復興的法國戰線。』

同時戴高樂將軍在倫敦也發出了抵抗的號召。他指出了停戰協定是危害法國的罪行。自七月起在巴黎和巴黎近郊就已開始了愛國的示威運動。在蒙特意和其他城市裏，失業者向市政府請願。一九四〇年在嚴寒的冬天裏，人民既沒有燃料，又沒有食物，婦女們爲了自己的小孩跑到街頭去討麵包和牛奶。五金工業爆發了罷工，工人們開始在給德國人生產軍火的工廠中實行怠工。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厄諾工廠好幾百輛機器腳踏車成了廢物。克諾姆·隆工廠製造的摩托在幾個鐘

頭內就被毀了。一九四一年五月，布·德·加萊省十萬鋼鐵工人不顧慘酷的壓迫罷了三個星期的工，礦工們要求麵包，同時揭發礦主們的叛國行爲，這些礦主們在人民戰線和「奇怪的戰爭」時代會實行怠工，而現在却開採最豐富的煤層。

小企業家、手工業者、商人、特別是農民們的窮困苦難是日甚一日。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時報」悲哀的承認：『我們缺乏一切東西原料、肥料、化學品、液體燃料、馬匹、機器的零件、機器和勞動力。』徵發引起了農民憤恨。貝當的社會基礎開始縮小了。

維琪警察和德國祕密警察開始「合作」逮捕共產黨人和愛國份子。一九四〇年七月在巴黎被捕的克朗代·但布·布馬，以及共產黨的許多議員和活動份子都成爲布里央宮（集中營）的人質了。七月，又掀起新的壓迫高潮。巴黎的議員米賽勒——布里央宮犧牲之一——連同其他幾百個愛國份子被捕了。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在拉·洛賽勒，德國人當場擊斃了一個建築工人，因爲他拒絕給德國作工，在德國軍官用馬鞭打他的時候他用拳頭反擊了打他的人。

戴高樂將軍在國外成立了帝國國防會議新的民族軍隊第一支隊伍。法屬赤道非洲、新卡里多尼亞、聖皮埃和米凱薩島都參加了國防會議。法國其餘的殖民地則仍在維琪和希特勒的勢力之下。以後由於盟軍作戰的結果，敘利亞、黎巴嫩、馬達加斯加和直布底被收回歸倫敦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管轄。同時，日本佔領了越南。

法國國內，共產黨人和戴高樂份子之間建立了聯繫。共同從事於法國的解放事業，一切黨派的愛國份子也都要團結統一，一九四一年五月，爲了加速團結民族力量，法國共產黨再向人民發表宣言，它聲明：『準備支持任何法國政府、任何組織、任何個人，只要它的政策和努力是向着反民族的壓迫，向着和賣國賊作真正鬥爭的道路上去。』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背信義向蘇聯進攻。法國形勢發展到新的階段。這個第二期的特徵，是德國對法國人民壓迫的加強，特別是民族反抗運動的發展。反抗是受了蘇聯人民和紅軍英勇鬥爭的刺激而起的。

在法國賣國賊羣裏，希特勒對蘇聯的侵略引起了他們的狂歡。德阿寫道：『領袖的決定給戰爭以真正的意義。』維琪份子等待着希特勒迅速的戰勝蘇聯。和德國合作的法國工業家們有了新的希望，他們希望得到自己的一份贖物。並且計算和希特勒匪徒合作，共同榨取從蘇聯人民手中奪來的領土和利益。維琪政府追隨着希特勒的脚步，毫無理由的和蘇聯斷絕了外交關係。以陶里歐爲首的賣國賊企圖成立所謂反布爾塞維克兵團。他們集合了幾千「壞蛋」——如同「圖畫」週刊所承認的，這些人都是些「小偷、騙子、罪犯」。人民對這些替敵人效勞的傭傭的「子爵」不齒和憤恨立刻表現出來：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賴伐爾和德阿昂檢閱這羣狼羣狐羣時，就被一位年輕愛國者打傷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廣大的民衆中間，引起了一致的想法：『戰爭這才開始了。』人民本能的了解：希特勒是孤注一擲。他們了解：新的力量對比已經形成，這種形勢可以而且必然要造成反希特勒陣營的勝利。在這以前，許多法國人心裏是充滿着疑慮，甚至敵視佔領者。賣國賊的人們也懷疑法國是否可能得到解放和復興，是否可能戰勝希特勒德國。在他們看來前途是黑暗的。可是在六月二十二日之後，愛國份子就開始想到：『我們不是孤立的，而是和蘇聯人民是同盟者，是站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得到解放，我們可以獲勝。』俘虜營裏的法國兵士相互擁抱着說：『紅軍一定會解放我們。』在同日，六月二十二日下午，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第一任外交委員摩里斯·德讓由倫敦用無線電廣播：『法國人！參加對德國鬥爭的一切人都有助於法國的解放！因此他們是法國人民的朋友。俄羅斯人民是我們的朋友。』

反對佔領者的鬥爭，更積極更有系統的了。第一個星期，在巴黎區裏，有幾列軍用車翻了身，在土魯斯指定給德國人的大汽油庫着火了。在文格爾，工廠被炸了。怠工更加厲害起來。工人們開始破壞機器，爆炸工廠。在斯大林同志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的講演以後，聖·德·地厄城的牆上貼滿了紅軍萬歲、蘇聯萬歲的標語。

七月十四日、巴黎發生盛大的遊行示威。爲了驅散示威者，希特勒匪徒出動了裝甲汽車和坦克。於是開始了武裝衝突，法國愛國份子襲擊佔領者、哨兵、巡邏兵、軍火庫。在凡爾賽，彈藥

庫於七月初被炸了。過了幾天，在伯爾克，德國兵營的守軍剛開赴東線，漁夫就消滅了他的衛兵，奪取了武器。武裝戰爭激劇了，布·德·加萊省的礦工在兩個英雄——沙爾利·德巴爾斯和俞利埃·阿比歐，二人都光榮戰死——領導之下第一次成立了義勇軍游擊隊。炸翻火車，炸毀工廠，向希特勒部隊投手榴彈，這一類事情在阿齊安，列達爾，奧賽爾，阿爾安不斷發生，在巴黎游擊隊同樣也進行着鬥爭，開始在協和廣場襲擊德國人。在蘇蘭堤上，常常發現德軍軍官的屍首。佔領者夜晚不敢單人在市郊遊了。

德國人企圖用瘋狂的恐怖來絞殺游擊隊運動和怠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比塞被任命為內政部長。他把維琪警備隊增加了一倍，把裝甲車讓德國的祕密警察指揮。他成立特別法庭「審判」愛國份子，被審判者沒有上訴權，也沒有律師。第一次世界大戰參加者，共產黨議員讓·加布里爾和其他許多愛國者都被判決了死刑。比塞解散了三百廿個各種各樣的被懷疑為同情蘇聯的組織和團體——體育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在佔領區和非佔領區，根據他的命令，會進行大批的逮捕。在一星期內，就有一萬一千個愛國份子被關在監獄裏去。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貝當發表了一篇無恥的演講，恭維希特勒是「為文明而奮鬥的先進戰士」，同時又表示他願望法國人助德反蘇。但是紅軍優異的抵抗粉碎了希特勒的計劃，也就打破了維琪的願望。貝當又承認「在人們頭腦中仍是一片混亂……驚惶的心情正糾纏着全國人民……」

一股邪風刮起了。』這種承認和威脅也證實了：人民的抵抗在增長着，在這篇演講中貝當宣告了一種新的警察和鎮壓的措施綱領。

在第二天，巴黎人民就舉行示威來反對貝當，在聖·拿查火車站附近，警察和德國人開槍射擊示威羣衆，兩個法國青年受傷並被捕，後來又被槍決，但是這只足以加強愛國者的鬥爭，以後對德國兵和警察的襲擊更加頻繁了。

希特勒匪徒於是開始槍殺人質。在巴黎，里爾，波爾多，德國法西斯劊子手們慘無人道的槍殺了幾十個被囚的愛國份子。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布里央宮殺死了五十個人質，其中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人民選出的議員和職工會的活動份子，被殺的人中也有社會黨員，有十七歲的中學生，他的父親——巴黎議員漢克當與共產黨議員一起被關在非洲監獄裏，布里央宮五十名人質都慷慨就義，唱着馬賽曲和國際歌，並高呼法蘭西萬歲！蘇聯萬歲！斯大林萬歲！

憤怒和仇恨激動着整個法國，十月廿五日，在巴黎市區工廠和在布勒斯特兵工廠裏掀起了罷工浪潮，十月三十一日在全國舉行了五分鐘的罷工，在全國各個角落裏都舉行示威運動，在巴黎第十一區，有一位市議員佛爾德，和其他人質一起被槍決了，那裏的婦女們於是追着德國軍官大喊劊子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希特勒匪徒又在蒙瓦蘭殺死了一百個人質，在爲法國而犧牲的受難者之中，有兩個英勇的共產黨員：「人道報」編輯之一，貝利和該報書記荷貝。

一月之後，希特勒匪徒又槍斃了鐵路工人領袖指導者鮑爾·塞馬，他在「奇怪的戰爭」時期就被捕了，在死難之前塞馬會寫下一段使人不會忘記的遺言：「再過幾分鐘，我就要被槍決了，我平靜的等待死亡，我最後的一念是想到你們，我的戰友我們偉大的黨的全體黨員，全法國的愛國者，英勇的紅軍戰士及其偉大的領袖斯大林，我雖死了，但我堅信能够戰勝法西斯主義，堅信法國能得到解放。請把我最後的信念轉告我的鐵路工友們，讓他們不要作任何能幫助納粹的事，鐵路工友們會了解我，他們會聽到我的聲音，他們將會行動起來，這是堅信無疑的。再會吧，我親愛的朋友們，死的時刻接近了，但我知道將要槍殺我的納粹已經吃敗仗了，蘇聯和它的盟邦萬歲！」塞馬和他的同志們已經知道，已經在監獄裏知道了德國人在莫斯科城下吃敗仗的消息。

整個法國興奮和狂歡的慶祝紅軍的初期勝利，以及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蘇聯冬季攻勢的成功，愛國份子在嘲笑地望着希特勒匪徒，這些消息減低了匪徒們不少的氣餒。

納粹份子和維琪份子決定演一場刺激人心的戲劇，組織里奧姆審判，在六個月以前根據帶有投降份子「色彩」的所謂政治司法會議的報告，且當親自定了被告的罪，可是希特勒要求審判，因為他估計到德國人民在遭受了嚴重的損失之後，開始反身自問：這個戰爭是爲了什麼？誰把我們陷入這個將使德國慘遭沒頂之禍的可怕的深淵裏，回答者自然會說就是「希特勒」，里奧姆審判是爲了使希特勒有可能洗刷自己替自己辯護。所謂法國法庭是要宣告：戰爭是法國惹起的，法

國應爲自己定罪，維琪賣國賊同時還企圖先歸罪人民戰綫，後者是萊翁魯·勃姆和達拉第簽字的，控告人民戰綫就是控告共和，所以控告只限於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因爲這時期與納粹軍事侵略無關。不過就是在這個狹小的範圍裏，是否要控告他們完全的罪狀，說他們破壞了法國安全，把比利牛斯邊境交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管制呢？是否宣佈萊翁·勃魯姆實施「不干涉」政策的罪狀呢？完全沒有，正是因爲「法官」和萊翁·勃魯姆同樣給法國和西班牙以這樣可怕的打擊。是否宣佈了達拉第參加慕尼黑投降（這是法國失敗的悲劇的前奏）的罪狀呢，完全沒有，正是因爲「法官」和達拉第一起強迫法國作了這次屈服。是否宣佈了上述兩人促成法國人民精神瓦解的罪狀呢？（因爲他們發動以暴力和壓迫來反對民族中反對希特勒最堅決的一部份）完全沒有。正是因爲里奧姆審判的「法官」自己同達拉第與勃魯姆都是壓迫實施的創始人，這種實施爲的是破壞法國人民抵抗精神和能力。非但如此，那些自命爲原告的人，正是使法國失敗和引狼入室的主犯，是著名的國賊和第五縱隊。里奧姆主要被告人——達拉第和勃魯姆——最大的罪惡，就是他們在簽了人民戰綫綱領以後，在實際上却破壞這個綱領的實施，並且和投降份子國賊一致行動。

雖是採取了許多預防的措施，但是審判仍然翻轉過來成爲反希特勒及其維琪走狗的公審了。被告證人，甚至控告者的證人的聲明和解釋，都暴露着貝當及其匪幫的罪狀，並且明白的確定了

德國的罪狀。希特勒於是大發雷霆，命令中止審判，同時爲了更有保證，他命令賴伐爾重掌政權（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希特勒的要求也一天天加多着。希特勒在東綫十個月戰爭非但沒有得到閃擊的勝利反而在他「進賬」裏現出重大的損失：一千萬德國人離開戰鬥隊伍，其中三百萬人死亡了，並且損失了大量的軍事裝備。但是希特勒仍然想搜刮所有的資源，利用一切可能企圖進行對紅軍絕望的攻勢，使戰爭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結束。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希特勒開始有計劃的掠奪一切被佔領國家，首先就是法國，他要法國更多的原料（鐵和鐵礬土），更多的坦克，卡車和飛機，更多的糧食，勞動力和砲灰。爲了得到這一切要求和粉碎人民抵抗計，希特勒重新命令賴伐爾聲明：『每人都當明瞭我回到政府來的意義』同時無恥的說：『我希望德國勝利』。貝當也聲明：『我所想的正是賴伐爾所說的，我贊成他所作的一切。』

賴伐爾重新担任了他那劊子手的職務的一星期內，希特勒匪徒在巴黎，里爾和盧昂慘殺了幾百個法國人，賴伐爾親自領導憲兵隊，使他的親信作前線戰士協會的首領，這個團體裏的真正的過去前線戰士，真正的愛國份子統統被開除了，進去的那些流氓盜匪。他成立了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軍隊，以後改成警衛隊——從希特勒黨衛軍學來的一種劊子手的組織。賴伐爾頒佈了大批新的措施來對付那些忠於法國和共和的公務員，他展開了瘋狂的反猶的運動。

還有許多「經濟」的和「社會」的措施，一萬家生產法國人民日用品的小企業被封閉了，這

是因爲一切燃料和原料都供給了爲德國服務的企業，並且要「解放」勞動力，以便途往德國去；賴伐爾又發明了「換俘虜」的辦法，他說：每個自願去德國的法國工人，可以換一個軍事俘虜（農民）回法國來，以後又改爲三個工人換一個俘虜，最後又變成了五個工人換一個俘虜。但是法國人看破了這種圈套，揭穿了這個驚人的騙局，工人開始用遊行示威和罷工來反對強迫送到德國，他們阻礙火車的開行，一部份游擊隊解放了許多在德國和維琪憲兵護送下被運往德國的工人。

賴伐爾企圖積極召僱一些人往東線去，他用各種利誘，大量賞金的收買，以釋放爲條件來引誘戰俘，陸軍次長普里杜將軍向軍隊發出可恥的四四〇號通告，規定凡是能降低身份穿德軍制服的軍官和士兵都可以升官，給褒獎，加給恩俸，但是賣國賊們仍沒有獲得他們期望的勝利。

整個法國，紛紛舉行示威運動，在巴黎，賽納省婦女們佔領供德國人使用的糧食店，組織了物品的分配，示威者逼使維琪警察倒退。根據賴伐爾的命令，兩個當場被捕的婦女被槍殺了，在南方的尼姆，蒙·德·比埃奈，阿勒斯，舉行飢餓示威遊行，在賽特港，碼頭工人和婦女把從非洲取來裝在火車上準備運往德國的殖民地產品，散發給羣衆，在比國邊境翁納城，居民擁進火車站，截下了開往德國的糧車，婦女們衝進車廂，把糧食散發給羣衆，在農村裏反抗徵發的運動，更尖銳化，農民捕捉幫助徵發的維琪官員，在布爾達尼，在布斯省，農民們消滅了希特勒的徵發

隊。當農民們不能夠阻止搶掠時，他們就把德國人糧食、草料和貨倉燒掉。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在里昂、馬賽和在土魯斯街上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九月二十日爲了紀念有歷史光榮的瓦爾米勝利——一七九二年法國革命義勇軍戰勝普魯士軍隊——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又舉行了偉大的遊行示威。

在十月，整個巴黎區和里昂都騷動着，工人們在全體居民支持之下罷了工，反對強迫運往德國，鐵路工人拒絕開出裝運法國工人去德國的列車，羣衆和維琪警察，德國秘密警察衝突起來，義勇軍和游擊隊更積極大胆的開始襲擊德國守備隊：在尼奧勒打死了四十二個希特勒匪徒，在布勒斯特打死了十一個德國人，在柏桑松打死了三十四個德國人。愛國份子同樣在消滅着賣國賊和警察，他們在陶里歐份子和「三色軍人協會」所佔領的房屋裏埋藏炸彈。武裝鬥爭依賴居民的同情和覺悟逐漸發展起來。他們不願懦怯的「等待着」的勸告，不願他們所謂不殺德國人，就不會引起壓迫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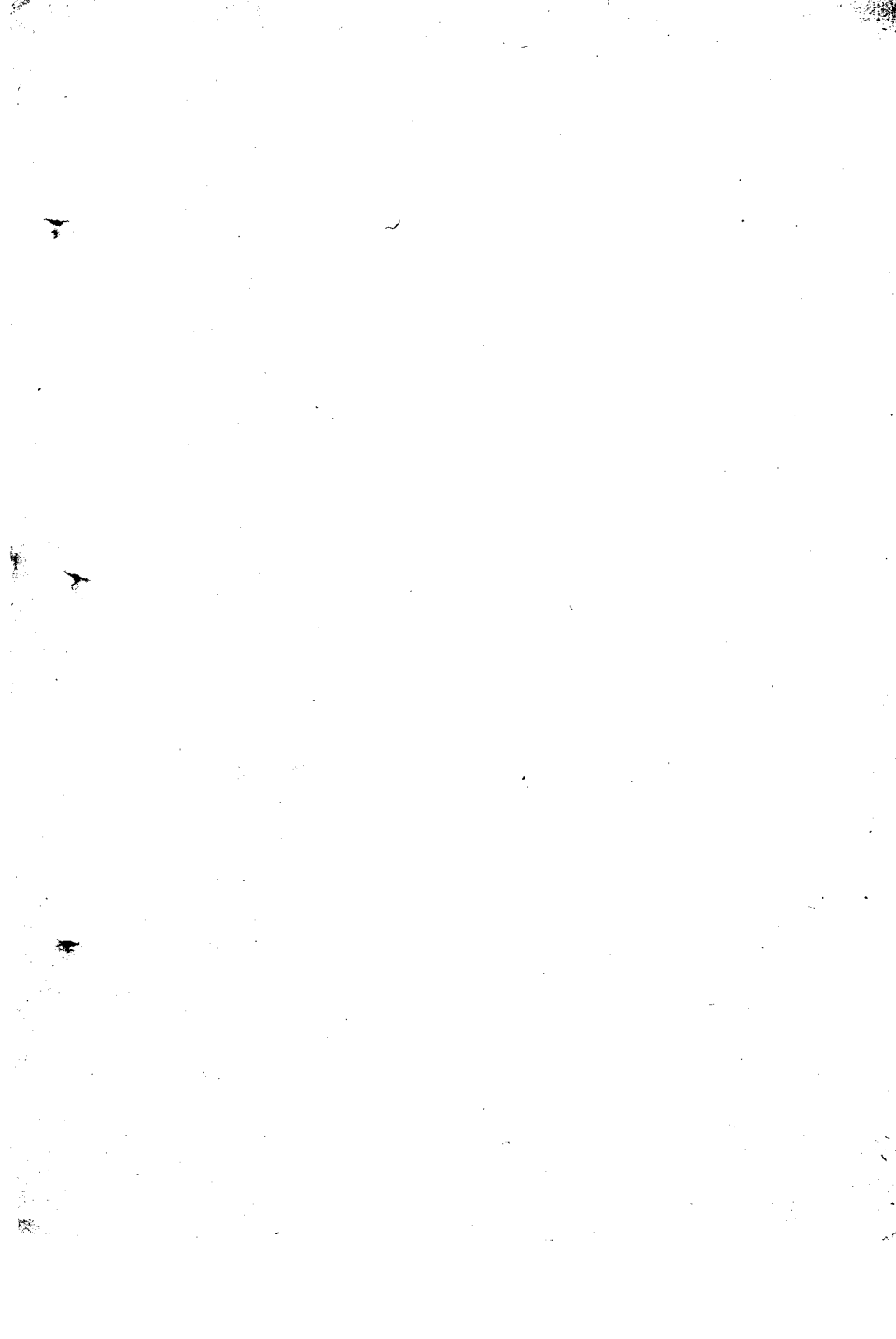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二年的年間，貝當主義的社會基礎不斷地縮小了，貝當的影響漸漸在農民中失去了，農民起初會是他主要的支持者，但是現在已經開始起而反對希特勒和維琪強盜了，他在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中和在小商人中也漸漸失去了他的影響，小商人再沒有什麼可賣，甚至他們櫃檯上的鐵板也沒收了，在小手工業者和小企業者中間他也開始失去了影響，因爲他們由於企業的

倒閉都破產了。貝當在那部份起初還相信他底武斷宣傳的工人中間也完全失去了信仰。

頭運法國人去德國，以及在法國國內也遭受駭人聽聞的剝削，所以這些人們開始憤怒了，他們了解了貝當在扮演着一個可恥的賣國叛逆的角色，貝當在退伍軍人中間也逐漸失去了影響，他們過去曾經崇拜過他那偷竊來的榮譽，但是現在已經開始鄙棄他了，就是貝當最老的信徒也轉過來積極參加抵抗運動了。貝當在天主教徒中間也失去了影響，他們看到把法國人被強迫的運往德國，使家庭破壞，以及追捕猶太人而大為震怒，法國教會對於捕捉猶太人所提的正式抗議，以及主教反對強運法國人去德國而發表的公開演講，都可作為證明。最後，貝當在軍隊裏也失去了信仰，紅軍的英勇抵抗和勝利，以及美國的參戰，在他們中間開始產生了復仇的希望，同時他們也為許多將軍的被捕而苦惱着，這些將軍中甚至有貝當駐德國的第一任代表羅蘭西將軍呢。

民族抵抗戰綫在這個時期內，不斷增長，它的組織也勝利的鞏固起來，民族戰綫統一了幾種組織和許多不同的運動，它的地方委員會和省的委員會團結了各種不同政見和宗教信仰的法國人：共產黨員、社會黨員、職工會活動份子、天主教徒、急進黨員、過去「戰鬥十字團」團員。民族戰綫的這些委員會也在職工會掩護之下在各種企業中成立了。共產黨，思想和組織的影響擴大了。其他黨派自一九四〇年六月後就沒有顯露一點生機，但是在這個時間又開始復活起來。戴高樂派各種團體加強了，他們的軍事組織同義勇軍和游擊隊建立了聯繫，秘密出版的報紙，也增

加了許多，上議院議長若望和下議院議長赫里歐公開提出反對解散國會的抗議，國會委員會成立了，各黨派代表甚至過去貝當的一個部長（已加入抵抗戰綫）都參加了進去。這樣一來，從共和派著名的政治人物到教會的許多有名代表們，都同前進的工人結成了一條連接的鐵鍊條了，大家聯合起來爲抵抗侵略者和賣國賊而共同鬥爭着。



第十一章 法國人民的英雄戰鬥

決定全世界和法國命運的是一九四二年的十一月。在這一月裏，紅軍在斯大林格勒前綫由防禦轉爲進攻。這個有決定意義和歷史意義的事件，不僅改變了蘇聯前綫的形勢，並且轉變了整個世界戰爭的面貌。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由於紅軍的抵抗和蘇聯人民的犧牲而獲得準備時間的英美軍隊在北非登了陸，地中海沿岸的力量對比改變了，變成有利於盟軍的形勢，這樣使得他們能夠從非洲趕走德意軍隊，並向意大利進攻，終於迫使意大利投降。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希特勒破壞了在康邊森林所簽訂的休戰協定，除了土倫，土倫港，和土倫要塞，佔領了整個法國。希特勒極想得到法國的軍艦，但他又深怕法國艦隊逃到阿爾及爾去，他需要借貝當和賴伐爾來騙取艦隊的軍官，使水兵離開船隻，準備用德國水兵來代替他們。當德國第六軍三十三萬官兵被圍在斯大林格勒註定了被殲滅的命運以後，希特勒不能再等待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要求把法國艦隊交給他。就在這天清晨，德軍一面用飛機在土倫港出口的地方下了水雷，阻止艦隊逃走，一面用坦克和載運德國水兵的卡車衝進城市，開足全部馬力向海岸開去。但是已經遲了，震天的爆炸開始了，根據舊的軍規，法國海軍總司令下令炸沉艦隊、重砲艦、巡洋艦、魚雷

艇，和潛水艇一艘接着一艘的爆炸了，沉入了海底，艦長也和他們一起，殉了國，他們站在指揮塔上沒入水底，一直到最後一分鐘仍然和他們的水手們一同唱着「馬賽曲」。法國損失了它的艦隊，但希特勒也沒有得到，法國的榮譽被挽回來了。

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所有這些事件：紅軍在斯大林格勒的進攻，盟軍在北非的登陸，希特勒匪徒佔領法國全部，土倫海軍的英勇犧牲——這些都是給人民的抵抗精神一種強烈的刺激，使這個運動更飛躍的向前發展着。希特勒匪徒佔領了法國全部，這是當頭一棒，它粉碎了維琪份子所謂「主權獨立」的最後幻想，澈底揭穿了維琪僭位內幕，貝當和賴伐爾赤裸裸的露出了他們的法國吉斯林真面目。土倫艦隊沉沒的政治意義，不但表示了法國愛國份子的憤怒，不願把艦隊送給敵人，也就是海軍軍官們最後宣佈了貝當和維琪政府的死刑。而這些人，大多數都直到最後一分鐘還是相信貝當的。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休戰協定所允許存在的小部隊軍官中。這些部隊也由希特勒下令解散了。因為有一位將軍和幾位軍官，甚至反抗對非佔領區的侵佔。軍官們的這種行為，正確的反映出一直到最後仍受維琪影響的少數集團所激起的感情。反對侵略者鬥爭的民族基礎，擴大到把一切法國人完全包括進去了。從此以後，站在民族團結圈子以外的只有那些明目張胆的賣國賊、敵人的走狗及其僱傭了。盟軍北非登陸，正像斯大林當時所預見的，供給了「組織法國反希特勒軍隊的根據地」。現在已經可能成立法國一切力量的指揮和組織中心機構，來進行

民族解放戰爭，和積極協助盟軍打敗希特勒德國了。

鬥爭事件，在法國首先反映在反對強運工人和動員青年的鬥爭上：現在這一鬥爭有了更大的規模。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五日，賴伐爾頒佈動員青年的命令，要把大部份青年運到德國去「服役」，包括在陶德工程隊組織中的剩餘壯丁，要到法國沿海岸和東綫建築工事。因為自願到德國去工作的人愈來愈少，維琪政府的各有關部門和德國的人力動員部長索克爾便開始強迫招募，警察並不事先通知，就去到工廠裏帶走指定押往德國的工人，維琪政府第一道法令規定：凡是十八到五十歲的男子以及廿一歲到卅五歲沒有小孩的婦女（不論結婚與否）都有勞動義務，新法令又改定了維琪規定的年齡，改成男子的年齡為十六歲到六十歲，女子為十八歲到四十五歲。只有服務於警察、國民軍或德國軍隊中的男子才能成為例外。

民族戰綫和重新恢復的總工會，進行組織反對強迫運送法人赴德的鬥爭，工人和青年羣起抵抗，他們成了「逃避強迫勞動者」，參加「馬基」及秘密抵抗組織的人，愈來愈多了。在里昂、薩伏瓦和多非奈省，有時幾千工人和青年跑到山裏，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中部法國各省，民族的團結表現在全部法國人對青年和逃避勞動工人的支援上面。

許多愛國的企業家偽造在他們企業中勞動的工人名單，繼續把工資發給那些參加了「馬奇」、游擊隊或義勇軍的工人；有的企業家甚至積極的參加抵抗運動，如土魯斯一個企業主人培養，用

手槍射擊企圖進入他的工廠，來逮捕拒絕到德國去的工人的德國秘密警察。

農民們差不多就在賴伐爾的窗戶下面，（距他在沙特爾頓的別墅不遠）幫助「逃避者」。當地農民打開了監獄的大門，把第二天要押走的青年釋放了。雖然賴伐爾曾有虛偽的許諾，但是德國人並未釋放被俘的農民。不僅如此，他們反而開始捕捉他們年輕的兒子了，農村整個的激動起來，在布爾塔尼、特勒斯、貝里埃、普魯斯奴、特勒崗尼克等地，農民們敲警鐘，集合居民抵抗徵發，趕走維琪政府的督察員，消滅了希特勒份子。在依昂納省，他們在義勇軍和游擊隊的幫助之下，從德國人手裏奪回被徵發去的馬匹和牛羊，在布斯和阿爾都阿兩省，他們燒掉了賣國賊的莊子，因為這些賣國賊，曾給佔領者報告收穫的消息，並領導徵發。在整個法國中部收割和打糧的時間，乃是農民為搶救糧食進行慘酷鬥爭的時期，在布爾崗第，造酒的農人把酒都倒掉，免得送給德國人。

許多工人和青年受着押往德國的威脅，不得不隱藏起來，加入「馬基」，同時農民們反對佔領者和維琪份子的抵抗運動也日益增長，這兩個事實給義勇軍和游擊隊運動以新的刺激，現代戰爭中義勇軍和游擊隊運動的特點，就是它不發生在農村而首先發生在城市中和工人中心區域中，以後這個運動才擴展到農村。義勇軍以及游擊隊總部定期刊發公報，登載在它們機關報「法蘭西第一」上。為了使讀者了解義勇軍和游擊隊的活動，現在摘引一段公報於後：

『義勇軍及游擊隊總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五一號公報：

自十一月六日至十三日一週內，我軍炸翻火車十三列，炸毀機車十二輛，車廂共二百餘節，油車一列，德國人損失石油四十萬公升，炸死德國車警七名，在法國北部運河上殲滅隊炸毀水閘四座，擊沉載運糧食開往德國的駁船一艘，平底船三十二艘，在阿爾薩斯和羅蘭，義勇軍和游擊隊殲滅德國秘密警察二十餘名，間諜十四名，義勇軍和游擊隊在阿爾薩斯燒毀德國人從農民手中奪去的農場一百二十五處，在依昂納省，我們的一個隊遭遇了包圍的危險，後來經過戰鬥，擊斃了德軍四名，俘虜三名。在厄松盧亞省，一隊義勇軍援助礦工罷工，炸毀布維西—蒙紹勒的鐵橋，在賽勒維亞和克厄斯等省，我們的部隊與佔領軍會進行多次的戰鬥，在巴黎舒亞澤爾街，曾向德軍佔領的房屋投擲手榴彈，炸死德軍五人，受傷多人。』

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裏，游擊隊一共進行了八百〇九次的各種行動，其中對德國人襲擊了二百四十六次，鐵路工人破壞三百三十八次，運河和海港破壞四十一次，為佔領軍服務的工廠中怠工一百八十四次，在六個月裏，消滅了賣國賊劊子手一千二百名，巴黎無線電台主任驚恐的確認：『作法庭職員、憲兵、市政府職員甚至新聞記者都有生命危險！』……他應當再加上一句：凡是替希特勒效勞的人都有生命危險。

應當再指出的是在義勇軍和游擊隊活動中的兩個顯著的事實：一件是他們在科西嘉的解放中起了決定的作用。一接到意大利投降的消息（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科西嘉的民族戰綫的領導者馬上下令起義來作解放科西嘉的戰鬥，民族戰綫在科西嘉三十萬人口中，集合了一萬五千人的武裝游擊隊。

愛國份子通知意軍指揮部表明態度，當意軍聲明不向法國人作戰，愛國份子於是從各方面向駐於該島的兩個德國師團襲擊，使得希特勒匪徒狼狽的向東潰逃，幾天之中，德軍就被完全趕走了，九月八日，愛國份子佔領了阿亞若，九月九日推翻了當地維琪政權，建立起新的議會來，在城市和鄉村裏，選出了新的市鄉議員，婦女也參加了選舉，維琪份子被解除了武裝，以前和愛國份子有聯繫的憲兵和義務警察，現在大部份投到愛國份子方面來了，由於人民的積極行動，科西嘉成了法國本土第一個被解放了的地區。

再一件需要特別指出的事件是在阿爾卑斯山裏的游擊隊，他們跟德國人和維琪份子聯軍隊伍的鬥爭。工人、青年以及過去在軍隊裏的兵士和軍官們，藏在阿爾卑斯山裏，組織成了武裝，雖然他們武器不多。他們希望西方的事變更迅速的發展，同時他們相信：第二戰場不久就要開關的。可是他們也非常樂意接受等待主義者要他們按兵不動等待時機的忠告。農民供給他們糧食，但是不够吃的。他們必須從維琪和佔領者那裏奪取糧食。游擊隊組織了遠征，和敵人接觸過多

次。從夏天開始，德國人就開始襲擊距離大城市不遠的營地。游擊隊於是退進山岳地帶。冬天來了，他們不得不離開高的山嶺和最可靠的隱蔽地區，到人烟稠密的地方。德國人企圖剷除這些在他們後方的抵抗中心，於是命令維琪政府「消滅」上薩伏瓦的游擊隊。一萬四千名全副武裝的隊伍——五千憲兵或義務警察，五千國民軍和四千警衛軍（因為在法國人中間有一羣惡棍給希特勒服務，也和德國人一樣得到了「黨衛軍」的徽號）——投入了戰鬥。但是他們的進攻並沒有得到德國人所希望的結果。游擊隊進行了抵抗，國民軍和憲兵隊受到了嚴重的損失。醫院裏擠滿了傷兵，而被擊斃的還沒有計算在內。不久以後（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一萬多人的希特勒軍隊又重新發動了進攻游擊隊，但游擊隊仍繼續支持到底。

但是無論義勇軍和游擊隊的武裝鬥爭成績多大，仍然應當努力於使鬥爭適應當前的任務。首先是游擊隊本身的意見，他們訴苦着外援不足，武器、藥品和棉衣缺乏。他們也訴苦着他們的功績常被人家抹煞。甚至連「游擊隊」這個光榮的稱號也不被人提起，好像這是個被禁用的名詞。這是因為有些愛國份子抱着陳腐的等待主義，有些人們對武裝人民的政策還不信任。在民族戰綫中有些集團，一向就認為法國是打敗了的，他們不同意武裝人民作廣泛的武裝起義，在西歐配合盟軍作戰，相反的，他們關心着如何限制，甚至拒絕人民參加。同時還有一種錯誤和危險的思想在發展着；這就是幻想的神祕隊伍，他們認為這些軍隊只在一定時期才發動，平時不作任何活

動，以免暴露而引起壓迫。但是很清楚的：起義不會一接到號召就發生，起義不能沒有準備，不用長期頑強的行動，首先是武裝的行動去準備。這是組織和鍛鍊幹部的辦法。不是有許多例子可以說明沒有行動和不參加戰鬥，結果還使軍隊腐化了嗎？

運動雖有上述的缺點，但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後，法國國內和國外的民族力量的團結一致這點，是勝利的向前發展着。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土倫艦隊還沒有炸沉以前，法共中央委員會代表和戴高樂將軍的代表舉行了商談。協定了共同行動的綱領。這個綱領的主要點是：『解放法國的全民起義將在法國共產黨與戰鬥法國勢力的密切合作中，根據雙方的協定進行準備，這個協定在戴高樂將軍和法共代表有機會相見時，即行簽字。』

一九四三年一月，法共中央委員會代表到倫敦戴高樂總部。三月間在法國成立了「全國抗敵委員會」，參加的有抗敵運動代表、「戰鬥」派、「解放」派、義勇軍和游擊隊、民族戰綫，恢復後的總工會、基督教工會、以及下列六個黨派的代表：共產黨、社會黨、急進黨、天主教的人民民主黨、民主聯盟以及共和主義聯盟。無論是盟友或是敵人，都一致承認，共產黨是其中最有力和最積極的黨。以後又成立了聯合委員會來組織和領導反對強迫派送法人赴德的鬥爭。在這個委員會裏，處於領導地位的是工會，義勇軍總部也在這個機構裏派有代表。因為反對法人赴德組織游擊隊，供給糧食，逃避強迫勞動的法國人的安全問題，愈來愈和武裝鬥爭的發展相聯繫着，

和義勇軍與游擊隊新部隊的成立及參戰也相聯繫起來。

在德意軍隊趕出非洲以後，第一個巨大的政治插曲，就是和達爾朗相聯繫的許多事變。海軍上將達爾朗——當時維琪軍隊的指揮官——在英美軍隊登陸的時候他正在阿爾及爾，他會下令抵抗盟軍，以後他又下令自己軍隊放下武器，和盟軍指揮部簽訂協定，他聲明參加盟軍方面來解放法國和解救在法國人手中「作俘虜」的貝當元帥。從軍事觀點來看，盟軍指揮部和達爾朗的協定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要從政治觀點來看，這個協定，造成了曖昧的形勢，因為達爾朗和他的集團正企圖在非洲保存在法國開始崩潰的維琪統治。海軍上將達爾朗「批准」任命從德國俘虜營中逃出的吉羅德將軍作法軍統帥。達爾朗成立了「帝國會議」，參加「帝國會議」的有非洲殖民地的總督、諾格斯、波松、沙特爾將軍，這些傢伙都曾經是而且當時仍是維琪政府的支持者。

開始就非常明顯：在達爾朗背後，有些經濟和社會的特權集團依附盟軍，這些集團唯一追求的就是掌握政權來反對法國人民。昨天他們使國家失敗，引狼入室，以圖換取希特勒的支持，今天他們那樣堅信自己「轉變」的成功。不久之後，下列幾個人在非洲出現了，身任要職的勒密格·杜伯蘭，這是農業資本家的代表（曾參加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暴動和造成法國失敗的法西斯團體會員），他後來來到非洲。佛蘭丹，公開的失敗主義者，特羅秀，積極的法西斯份子，法國

人民的劊子手，在德軍佔領巴黎時他是市政代表團第一位主席，他是槍殺人質的直接負責人，他會親自刑訊哲學家波利茲，並把他交給希特勒匪徒槍斃。這時，整個北非的愛國份子仍然被關在監獄和集中營裏。

在倫敦法國民族委員會沒有即時接到盟軍在阿爾及爾登陸的通知，於是它站在談判和協定的圈外。非洲事件所發生的變化使法國人大為驚訝。達爾朗聲明除協助盟軍擊敗希特勒以外，別無其他目的，他說：在法國解放以後，人民即可自由地組織自己選擇的政府。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達爾朗被人刺死了。關於這次謀殺罪犯問題，勒內·加比丹教授說：「這是摩爾領導下的保皇黨的陰謀，這些人大部份是過去的蒙面黨份子，因為達爾朗個人和他的活動妨礙了他們，以及他的新政綱開始滿足了我們（即戴高樂份子——譯者），所以他被一個保皇黨所暗殺。」（見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九日倫敦「法蘭西報」），大家知道，保皇黨想扶一個保皇黨的布崩王朝後代巴里刺伯爵登極。

達爾朗的被刺，拖長了非洲局勢的混亂。「帝國會議」裏面的維琪份子任命吉羅德將軍作政治和軍事的領袖。但是吉羅德將軍在廣大的愛國羣衆壓力之下，違反了維琪份子的期望，頒佈了適合於民族政策措施的第一批法令。法國陸軍第十九軍和自由法國的各種兵團勝利的參加了驅逐德意軍隊的突尼斯戰線。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經過三年半的監禁後，在「奇怪的戰爭」時期中

被慕尼黑份子判罪的二十八位共產黨議員，從阿爾及爾的墨松·加勒的監獄出來了。他們一出來就立即發表響亮的號召，呼籲全法國人民在反對希特勒的戰爭中團結起來，並且高呼：『法蘭西人民，向敵人進攻！』

在長期談判之後，吉羅德和戴高樂將軍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成立了協定。創立起「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它的主要任務在成立宣言中規定如下：「領導法國人民力量參加一切形式及一切地方的作戰」，若照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最初的形式來看，它是一種妥協的產物；主席由戴高樂和吉羅德輪流担任。委員裏有喬治將軍——前陸軍參謀總長，法國戰役時會指揮主要前線，是個主張立即投降最堅決的人物之一；古佛·德·摩維——財政督察，他同許多大銀行經理有親屬的關係，一年前還担任維琪政府財政部監督；勒內·馬意耶——國際臥車公司經理，法國國內外許多企業理事會的理事，洛特西埃德集團的代表，曾經與賴伐爾內閣有過一度姻緣。

英美的軍隊在北非登陸一年之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法國解放委員會重新改組。戴高樂成爲唯一的主席。吉羅德將軍有一個時期會爲軍隊的首腦，但是以後在一九四四年辭了職。古佛·德·摩維又担任法國解放委員會駐意大利諮詢委員會（代表代替馬西格里），喬治將軍和其他一些委員被撤了職，代替他們的是抵抗運動各黨派的代表。法國解放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戴高樂將軍，賈德魯將軍：最高國家官吏，馬西格里（前維琪政府駐安格拉公使），第克恩（曾任職於

國際勞工局），前國聯工作人員：如讓·蒙涅和昂里·邦納。投機家，大商人：如馬意耶，普列宛，其特爾，幹部軍官佛勒尼（曾參與比塞事件，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前與比塞進行過談判），一些教授：如費力普（社會基督教派，法國社會黨議員），德·芒頓（天主教徒），加比頓（戰鬥派），維熱里（保皇黨國會議員），凱爾和曼德斯·佛朗斯（急進黨員），勒·特羅凱（社會黨員）和雅基諾（共和主義同盟派過去是右翼）。

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組的時期，發生了共產黨員參加議會問題。法共中央委員會表示原則上同意參加議會。同時認為有必要訓令它未來代表發表下列宣言：（一）用法國和帝國所有的一切物資和希特勒德國作戰，武裝在法國本土作戰的法國愛國志士；（二）立即懲辦法國當局的或者可能參加他們同謀的賣國賊；（三）實施民主共和的社會政策，以復活作戰人民的精神，和力量；（四）滿足人民大眾合法要求，以此團結一切法國人民和全帝國人民，必須不分種族和宗教的差別，把他們吸收到對敵鬥爭中來；（五）在尊重法國獨立的基礎上，恢復法國的偉大，和它在聯合國集團中的作用。

這一宣言完全適合於法國人民和聯合國在對希特勒德國戰爭中的利益；除了這個宣言以外，法共中央委員會還要求有權自行選派代表參加解放委員會。戴高樂完全同意我們所提出的綱領，但不同意共產黨自己選派代表。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四月四日，才有兩個共產黨員——畢佑，格爾

尼——同一個急進黨員賈科比同時加入了解放委員會。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初間，解放委員會成立了諮詢會議。最初它由八十四名委員組成，後來增到一百零二名，其中包括四十九位法國本土的團體和法國在其他國家的團體代表，以及二十九位由各黨派根據過去在國會內的人數比例所選派的國會議員。這個諮詢會議，只起諮詢的作用；除討論解放委員會所提交審議的議案權利以外，它沒有任何其他權利，並且它的決議沒有法律的效力。雖然如此，諮詢會議的成立和解放委員會的改組，是向前進步了一些。這是個和賣國賊及無恥的維琪政權相對立的真正民族政權的最初基礎。這個實際政權的鞏固和解放委員會的威望，是在於反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是否有效的和迅速的動員法國一切力量進行作戰。

從這個觀點來看，應當指出有些法國活動家的一種不正確的傾向，他們關於未來的法國，和它在世界上應佔有的地位這些談得過多，而忘記了只有在目前的戰爭中，全體人民有效的協助聯合國，來縮短戰爭時間，而進行的努力，才能而且才可以保證法國的復興，和恢復它在世界上過去的光榮地位。在法國人民還被束縛在鎖鍊裏的時候，有些人却過分焦慮的來談論將來的憲法，即使是臨時的人民在目前所期待和要求的不是憲法草案，也不是關於未來選舉條件的訓令，他們所要求的是早日結束他們的痛苦和磨難，就是說：縮短戰爭的時間，早日獲得解放，以便在最後一個佔領者被驅逐或被消滅的時候，在法國土地上還能存在着法國，並且我們整個國家不至於到

處都是廢墟和墳墓。

那末，能够而且應當保證法國迅速解放的條件是什麼呢？

第一個條件是：在最短期間組織、武裝和出動強大的法國軍隊，這個軍隊要迅速的超過一百萬人，應該立即以現代的武裝——最新型坦克、飛機和大砲——裝備不是四五師，而是幾十個法國師。那時，法國軍隊就可以在盟軍目前攻擊戰中間起很大作用，而不至只被視為補助的軍事力量。

第二個條件是：用一切方法援助義勇軍和游擊隊，他們是已經在祖國土地上作戰的新的民族軍隊的先進隊伍。諮詢會議決議之一會要求：『地下的軍事組織應該包括在盟軍歐陸作戰的計劃中』，這就是說要完全信賴人民，給他們以武器，號召他們準備全民起義和按照盟軍軍事行動，適時的發動這一起義。

第三個條件是：加速從行政、軍事、警察等一切重要職位上肅清和驅逐公開的維琪份子和過去法西斯團體的份子。如我們已經作的那樣，無情的懲辦賣國賊對他們執行死刑那樣。

第四個條件是：必須防止在「反正」的人們的影響之下，轉移到維琪的立場。當然應當給一切正直的人們以地位，但決不能把重要的地位讓給那些應負法國目前災難某一部份責任的人們。戴高樂派出版的地下報紙「戰鬥」會本着這個精神寫道：『凡是在法國國內和國外許多行政會議

中出過大風頭，和賴伐爾及其政策有密切聯繫的人們，是不能讓他站在領導地位的。」

最後一個條件是：堅決執行真正獨立的、適合法國傳統和利益的政策。在這個範圍裏，要肅清慕尼黑份子和維琪份子所留下的惡劣的遺產。他們很早就拒絕偉大的、富強的、獨立的、在國際上起重要作用的法國。獨立法國的政策，要求加強和它所有的盟邦間特別是反希特勒聯盟的三強國——英、蘇、美間的友好關係和合作。法國人民異常重視他們友邦和同盟國的巨大援助。他們對紅軍，對全蘇聯人民，對斯大林元帥有無限的敬佩和感激。法國人民知道：法國的失敗，法國的被佔領和它的一切災患，大部份都是由於法國特權階層，賴伐爾份子和其他慕尼黑份子的瘋狂反蘇政策所招來的。

因此，要解放和復興法國，就必須法國有真正獨立的政策，必須結束那種不獨立的形勢，這一種形勢在戰前差不多是經常的。最後也就要求經常加強法蘇的友好和同盟。我們絕不能說，對這許多問題都已經有了完全一致和堅定的立場，以及明確的政策。我們雖然作了一些值得讚揚的努力，但是使人覺得還是在摸索着正確的政策中。

自從康邊投降之後，法國處在了它有史以來最悲慘的年月。它被放置在深淵的邊岸，極大的危險仍在威脅着它。可是由於法國人民的子弟們的努力和犧牲，法國在開始復興中，它的無數死難者的英雄事蹟，它的義勇軍與游擊隊，它的土倫海軍士兵，它的比爾、哈姆和突尼斯的兵士

它的「諾曼第」空軍（在蘇聯對德作戰的法國空軍——譯者註）隊員的英勇和果敢，這一切都證明了法國人民對解放和復興事業的堅決意志。驅逐佔領者出法國和消滅維琪賣國賊的鬥爭，還很艱鉅，它要求更多的努力和更大的犧牲。它要求一切法國人在戰鬥中親密的團結起來，重新建立強大、民主、和獨立的法國，它要求絕對信賴法國人民祖傳的品格，信賴他們的創造力和他們的組織能力。法國人民在它同盟者的援助之下，將會洗盡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恥辱，加快希特勒德國的崩潰，從地面上肅清維琪走狗和腐化份子，把賣國賊壓得粉碎，這樣的日子，是不遠了。到那時，一個自由和進步的法蘭西將會發放它嶄新的光芒！

附錄 人民的考驗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軍在法登陸，法國內地到處起義打擊德寇和維琪份子。巴黎在八月十日，鐵路及運輸工人開始罷工，巴黎周圍六十英里之處的交通完全混亂。八月十一日，遷居巴黎的維琪政府完全失掉控制力。德軍企圖將巴黎市二萬名警察繳械，但是警察早就組織在抗敵會議之下，拒絕繳械，宣佈罷工。八月十八日，德軍開始不加警告就對人羣開槍，宣佈下午九時以後戒嚴。地下總工會和基督教工會下令總罷工。總罷工開始，工人開始襲擊德軍的庫房和街上的德軍人員。八月十九日，法國全國抗敵會議和巴黎解放委員會下令總起義。人民武裝起義開始，法國內地軍五萬人，在共產黨員唐吉領導之下，由成千萬的居民協助，攻佔了巴黎的公共建築物。殺死德寇和法奸。八月二十二日，內地軍攻下了巴黎的全部公共建築物，德寇和維琪奸徒或已被殺，或已被捕，或已逃走。巴黎解放完成。八月二十四日，盟軍先頭部隊到達巴黎。

在巴黎解放之後（九月間）法共總書記多列士由莫斯科回到了巴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晚，在巴黎冬季賽車場向兩萬人的羣衆大會，作他自一九三九年以來的首次公開演講。他首先指出：「德國法西斯主義和全世界法西斯主義，都必須徹底消滅。我們必須把現行反法西斯戰爭

進行到最後勝利，直至打到柏林爲止。這是我們目前唯一的任務。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法國人民必須着手立刻建立一支強大的，起碼擁有一百萬以上的兵員的現代化的武裝部隊。我們在前線上還只有少數師團。我們必須而且能够組織二十個、三十個、四十個以至更多的師團，配備着最現代化的武器——坦克、大砲和飛機。同時，我們必須不要只是等待由聯合國供給武裝配備，而是應該立刻開始在法國自己的工廠中恢復和加緊作戰工具的生產。」他並指出：『建立一支現代法軍，人力不成問題。據估計，法國現在有六十萬失業工人，其中在巴黎的就有三十萬人。這些失業工人應該讓他們參加軍隊和吸收到軍事工廠裏去。』

多列士指責那些會爲德國製造軍火的工廠現在都關起門來了。他號召爲了恢復工業生產，必須對那些會在納粹統治下努力增加生產而現在却努力進行怠工的份子，實行無情的清算，追究他們應負的責任。最後他號召法國人民，加緊民族團結，共同爲建立自由幸福的強大的民主法蘭西而努力。

一九四五年一月間法國共產黨和社會黨商談的結果，成立「諒解委員會」以促進政治統一，這個委員會的目的，是在議定兩黨合作的條件。這造成了和一九三六年人民戰線時期相同的情況。當時兩黨決定研究合併的可能，而且設立了一個聯合委員會商量這件事。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巴黎舉行二十五萬人的反法西斯大示威，是由法共和社會黨所主持，

約有五十個單位參加示威，內有共產黨、社會黨、總工會、急進黨、社會急進黨、「民族戰線」、抗敵組織和「民族解放運動」組織，退伍軍人協會等等。同時在馬賽、曼皮列、波爾多、亞眠、尼姆、塔利革、裡姆斯、內維爾和里摩日各地，都舉行同樣的示威。

法國光復之後，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和五月六日舉行全國各地的地方選舉，在二千四百萬選民中（女子第一次獲得選舉權，她們佔一千四百萬），投票的佔百分之八十。這是德軍入侵以後法國的第一次自由選舉，也是各政治黨派和團體檢閱力量和在人面前受考驗的時候。

在巴黎選舉中，法共在九十席的市議員中佔了二十七席，佔了第一位（戰前僅只八席）它在全國各地選舉中最佔優勢，獲得百分之二十五的選票，若是同一九三七年最末一次的地方選舉（佔百分之一的票數）相比較，那不管有天壤之別，它從戰前的第三個大黨一跳而成了法國的第一個大黨。

地方選舉之後，法共總書記多列士在法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六月二十二日），發表了法共對內閣改組的提示，他認為臨時政府不能滿足全國的期待，希望政府能接受這次地方選舉的影響（因地方結果左翼勢力大增，但在政府中的閣員仍很少），共產黨準備在戴高樂為首的臨時政府內担负更大的責任，以反映全國的意志。法共中央政治局決議繼續被黨的合作政策（與法國其他黨派合作）。它審查法國經濟情勢，提出托拉斯和仍舊保持他們位置的維漢份子，正在怠工破壞

生產，並阻礙法國復興。如果對這些人不加以迅速驅除，法國的復興就會遭到嚴重的延宕。工人階級的任務是儘一切力量對怠工者的危險活動作鬥爭。政治局提及敘利亞的情形時，認為敘利亞和黎巴嫩的獨立，應不能有所疑問，對於可以被解釋為違反法國並危害法國在遠東各國的傳統影響的某些行爲，表示遺憾。它表示希望以互相合作的好意，將可以重建並加強敘利亞黎巴嫩與法國之間的友誼。關於西班牙問題，政治局指出，佛朗哥的西班牙是進行其國際煽動的許多法西斯的避難所和活動中心。在法國和北非的西班牙領事館，是法西斯活動的巢穴，爲了國家安全，它要求斷絕對佛朗哥西班牙的外交關係。

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召開的法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法共又提議共產黨和社會黨合併組織成一個單一的工人政黨。但是以後又一度的被社會黨反動領袖們所否決了。

在這次大會上，多列士宣佈『截至六月底止，法共黨員共計九〇六·七二九人，三個月前是五四四·九二一人，僅僅九十天內，就增加了三六一·八〇八人。而在人民陣戰時代，法共還不過二十七萬黨員。』在新加入的黨員中有世界聞名的科學家如郎之萬，居約（居里夫人的女婿），現代大畫家如皮卡索等人。

在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的省參議員選舉中，法共又獲得了巨大的勝利，獲得了三二八席，而在一九三六年間一共只有七二席。在一千五百萬參加投票的選民之中，共產黨得了三百八

十三萬票，社會黨三百七十萬，社會急進黨二百五十四萬。

在同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制憲會議代表選舉中，法共得票最多，在五百八十六席中，法共佔了一五一席，天主教人民共和運動黨一四二席，社會黨一三九席，三大黨所得票數是：進步天主教黨得票四·八四二·三七一票，共產黨得四·八一七·八〇三票，社會黨得四·四九五·四〇二票。

大選之後，法國左翼代表——包括共產黨、社會黨、總工會、人權同盟——立即擬定了一個共同綱領，這個綱領是根據全國抗敵會的綱領寫就的。其中主要的有下列幾項：（一）改組軍隊（即建立人民的軍隊）；（二）銀行及大企業收歸國有；（三）工人參加工廠管理；（四）允許各殖民地分別逐漸獲得解放及立即脫離法國統治；（五）承認西班牙共和國政府。這個新綱領在十一月五日提交進步天主教黨，但是未能獲得天主教黨的同意。爲了團結一致，協力於復興法國的工作，共產黨號召組織三黨聯合政府。

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國新臨時政府組成，人員如下：

主席兼海陸空軍總司令 戴高樂

軍政部長 米賽爾（天主教黨）

軍需部長 狄隆（共產黨）

國務員：

歐里奧（社會黨）

查伊（進步天主教黨）

國務員：

賈森諾（溫和派）

多列士（共產黨）

司法部長 戴尙（進步天主教黨）

教育部長 賈高必（急進黨）

外交部長 皮杜爾（進步天主教黨）

內政部長 狄克歇（社會黨）

國家經濟部長 比佑（共產黨）

工業生產部長 保羅（共產黨）

由於戴高樂對沒收大企業的不願全部執行，大資本家對復興生產的怠工，所定的政綱未能很好的實現。一九四六年一月間戴高樂因軍費案被共產黨與社會黨閣員所否決，辭了職，制憲會議另選古益為臨時政府主席，法共總書記多列士為副主席，重組三黨合作政府，名單為：

主席兼國防部長 古益（社會黨）

副主席 多列士（共產黨）

國務部長 蓋伊（進步天主教黨）

農業部長 潑里讓（社會黨）

財政部長 布立溫（抗敵同盟）

殖民部長 蘇斯戴（抗敵同盟）

勞工部長 克瓦塞（共產黨）

工務及運輸部長 莫許（社會黨）

郵電部長 湯馬斯（社會黨）

建設部長 杜德利

情報部長 馬霍

人口部長 畢讓（進步天主教黨）

外交部長 皮杜爾（進步天主教黨）

財政及國家經濟部長 費烈浦（社會黨）

陸軍部 米賽爾（天主教黨）

軍備部長 狄隆（共產黨）

運輸及工務部長 莫許（社會黨）

內政部長 勒特洛格（社會黨）

衛生及人口部長 畢譚（進步天主教黨）

工業部長 保羅（共產黨）

建設部長 比佑（共產黨）

勞工部長 克瓦癩（共產黨）

糧食部長 龍向朋（無黨派）

農業部長 潑畢譚（社會黨）

郵政部長 勒都諾（進步天主教黨）

司法部長 戴尙（進步天主教黨）

情報部長 特費雷（社會黨）

殖民部長 慕台（社會黨）

退伍軍人部長 卡薩諾伐（共產黨）

教育部長 奈日蘭（社會黨）

在本年五月五日國民投票複決時否決了制憲會議所制定的新憲之後，（一〇・六三二・四三〇票對九・四五〇・五七〇票）於是在六月二日重選制憲代表，重制新憲，大選結果，各黨派獲得票數的百分比與席數如下：

進步天主教黨

（一六三席）二八・二二

共產黨

（一五〇席）二五・九八

社會黨

（一二五席）二一・一四

左翼聯合（社會急進黨與抗敵社會民主同盟）

（四八席）一一・六〇

自由共和黨

(三七席) 六·五七

其他各小黨

(四八席) 五·六二

三大黨此次與上次票數比較如下：

上 次

此 次

進步天主教黨

四·八四二·三七一

五·一四二·四八八

共產黨

四·八一七·六〇三

四·九五八·一七六

社會黨

四·四九五·四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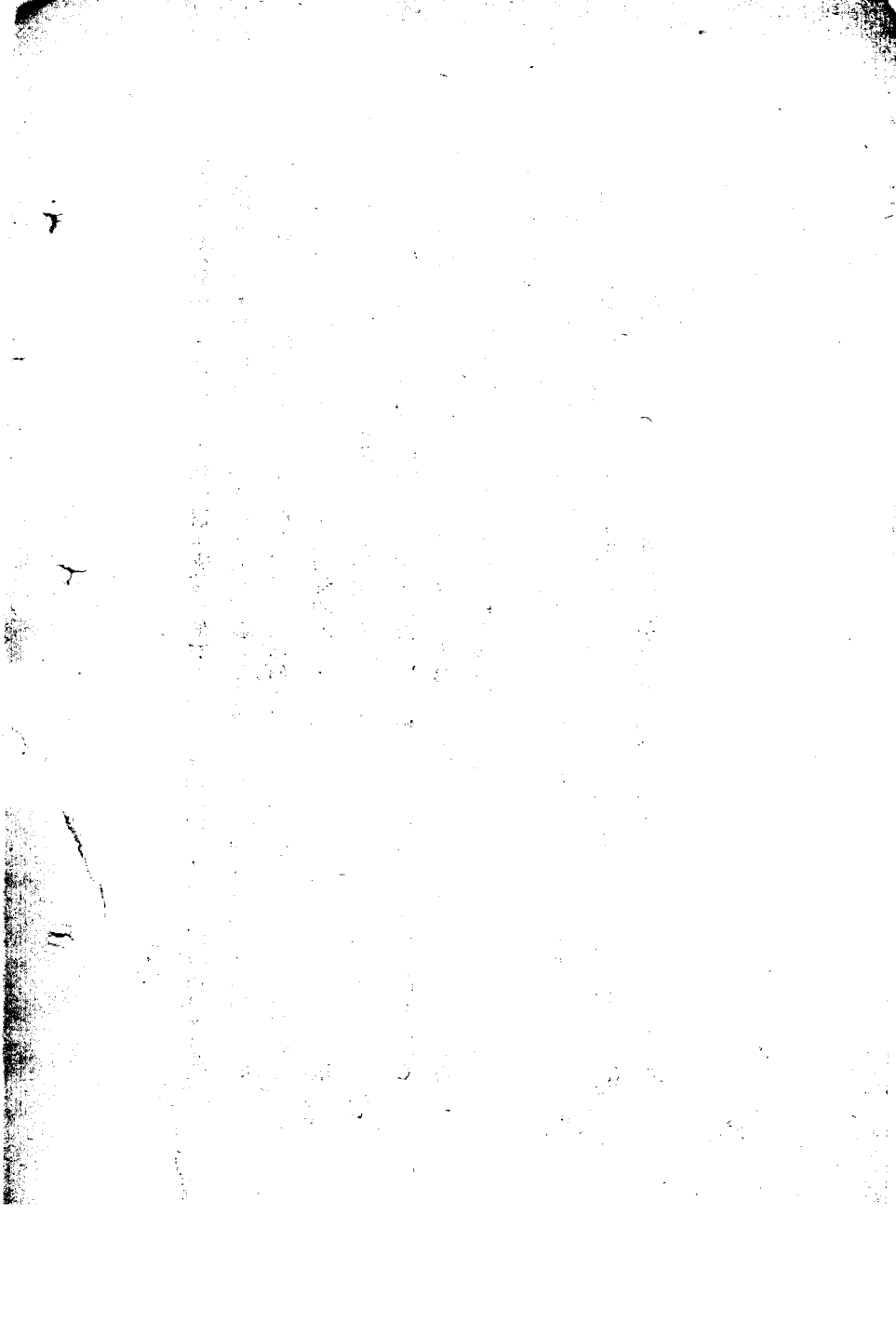
三·八四〇·三二四

在上面的比較之下，我們可以看到，進步天主教黨和共產黨的票數是比上次增加，而社會黨的票數比上次降得很多。若是我們加以分析，不難得到他們增減的原因所在。人民共和黨之所以很快的增加這是因為英美的扶持，所以在它勝利之後，英美反動報紙大為稱快，認為這是反共反蘇堡壘的加強，飛加洛報發表美國名記者李曼所著一文，稱共產黨若一旦得勢，英美即不免軍事干涉，來恫嚇法國讀者。社會黨反動領袖勃魯姆在華盛頓每日與社會黨總書記梅耶通電話，訓令社會黨在競選宣傳中所取的主要原則。第二是由於本國托拉斯和仍舊保持他們位置的「合作」份子，正在怠工破壞生產，並阻礙法國復興的傢伙的努力支持，這些人們為了保持他們的私人剝削特權和地位，始終不會停止過企圖扶植和團結隨雜珠崩潰而潰散的右派勢力，來對抗對他們不利的在

增長中的左翼勢力，他們以巨大的資財來支持這個右翼的天主教的政黨。第三個原因是因為他們利用宗教觀念，來騙取政治認識薄弱，而對宗教信仰有歷史傳統的農民，和婦女中落後一羣的選票。社會黨票數的跌落，這是因為社會黨反動領袖如勃魯姆和梅耶等的反蘇的「西歐集團」主張，和不願同共產黨合作的分裂工人階級力量的政策，深刻的受到勞動大眾和黨內一部份工人黨員的唾棄所致，因而左的走向共產黨，右的投入天主教黨，就無怪乎它的票數跌落了。

法共雖然處在目前不利的國際壓力之下，以及在國內碰到由社會黨反動領袖發起的右翼黨全體參加的反共陣營，但是它仍然能夠獲得比前更多的票數，這已證明了雖然反動勢力企圖以對共產黨造謠侮辱之方法來分裂民主勢力，並反對民主勢力與共產黨聯合運動，但是終未達到他們所預定的目標。

法國共產黨，有它英明的領袖如多烈士等的領導，有過人民戰線和在反法西斯鬥爭中民族戰線的經驗，有過戰後各黨派合作與鬥爭的實習，經過戰爭烽火鍛鍊，有了一百萬以上的黨員，有五百萬選民的擁護，必然能夠在國內外反動勢力總攻擊的威脅之下，團結一切民主力量來反抗黑暗與倒退的。



譯後誌

這本冊子，前一部份（從第一章到第七章），是多烈士所作的「人民之子」；後一部份（從第八章到十一章），是多烈士所作的「康邊降約簽訂後的法國」；最後的附錄，是譯者編補的，主要的材料還是根據他的言論主張。

在「人民之子」一部份裏，敘述他個人的出生、成長以及在他領導下的法國共產黨在各時期中的政策主張和鬥爭。

在「康邊降約簽訂後的法國」一部份中，主要是敘述在此期中法國人民的優秀子弟們的反抗運動，當然在這個運動中，法共是起着決定性的領導作用的。

爲了使讀者明瞭法國光復後的法共情形，譯者編補了一個附錄，但以條件的限制，只是極簡略的補充而已。

名之爲「多烈士自傳」，只是指「人民之子」的部份而言；若是用「人民之子」爲題的話，也可以包括本書的全部。當然這個「子」是多數的，是指法國人民的優秀和英勇的子弟們。

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礦工是怎樣成爲法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的，可以使我們了解法國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在每個時期中的主張、政策和英勇鬥爭，因此我們也就可以了解法共成爲目前在資本主義先進國裏第一個工人階級的大黨，並不是偶然的了。

本書因爲是在復員期忙亂中把它譯編出來的，錯誤想必難免，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本書所提人物介紹

Balzac (Honoré) 巴爾扎克，1799——1850年。法國著名小說作家，“人間喜劇”的作者，這本小說生動有趣地描寫出他那時代的社會。

Barbusse (Henri) 巴比塞，1873——1935年。他是一個寫實主義的小說作家，是退伍軍人共和協會的組織者。他爲了保衛蘇聯、保衛自由與和平用盡了心血。他的著作有“火線下”和“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後者中譯本書名爲“斯大林傳”徐懋齋譯，由新知書店出版。

Basly (Emile) 巴斯里，1873——1935年。生於瓦期西埃 (Valencennes)。曾參加一八八四年昂杉 (Anzin) 的大罷工。一八八五年被巴黎人民選爲下議院議員，一八八九年落選，一八九一年又在期斯 (Lens) 被選。他作礦工工會主席直到臨死。

Beethoven (Louis) 悲多芬，1770——1827年。德國著名音樂家，一生貧困多難。

Bismark 俾斯麥，1815——1898年。普魯士的政治和外交人物，一八七一到一八九〇年，日爾曼帝國的「鐵血宰相」。在一八七一年，他有效的幫助底埃爾 (Thiers) 消滅了巴黎公社。

Charles-Quint 查理·干特，1500——1558。日爾曼皇帝兼西班牙國王。他從四面八方來圍困法國：從萊茵河面，阿爾卑斯山脈方面從皮爾牛斯山脈方面。佛朗索瓦第一 (François Ier) 爲了打破這個鐵的包圍而鬥爭。希特勒夢想在歐洲重建查理·干特的帝國。

Clemenceau 克里蒙梭，1841——1929。法國政治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法國政府領袖。

Deroulede (Paul) 戴魯賴德，1846——1914年。法國沙文主義的煽動家，愛國同盟的創建人。詩人，曾作“士兵之歌”。

Diderot 底特洛，1713——1784年。十八世紀法國的最著名的唯物論者。

Doumergue 杜邁格，1863——1937年。法國政治人物，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一年曾任法國總統。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法西斯勢力高漲時又把他推為內閣總理。

Durer (Albert) 杜雷，1471——1528年。德國著名雕刻家和畫家。

Einstein 愛因士坦，德國著名哲學家。相對論的創造者。被希特勒政府把他驅逐出德國，現在美國。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1820——1893年。科學社會主義創造者之一，馬克思的知己朋友和合作者。

Ferry (Tules) 懷里，1832——1893年。法國政治人物。作公共教育部長時，曾致力於大學的改組，曾經通過免費教育和排除學校教會教育的法律。

• Fourier (Charles) 傅利葉，1772——1873年，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他曾「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世界物質與精神的貧困」（恩格斯語），主張以和平的方法改造社會，幻想一個將來的美滿社會，在那社會裏共產主義者大家共同的合作的生活在「公舍」裏。馬克思曾指出傅利葉主義的烏托邦特質，同時也給了他以相當的估價。烏托邦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來源之一。

France (Anatole) 法耶士，1844——1924年。法國著名作家，他們的作品都是用最清楚的文字寫出來的。

Francois Ier 佛朗索瓦第一，1494——1547年。法國君王，在他統治的時代是法國復興的時代，是反查理·千特戰爭的時候。

Goethe 歌德，1749——1832年。德國最大詩人。他在一開始就懂得法國大革命的重要性，在瓦勒密戰爭的時候曾寫：「從這裏和從今天，開始了人類史上一個新的時代，你們可以說：我曾經在這裏。」

Guesde (Jules) 蓋斯德，1845——1922年。馬克思主義的庸俗派，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曾同馬克思、恩格斯共同起草法國工黨綱領。曾以馬克思正統派的名義攻擊工團主義傾向，無政府主義傾向，普魯東主義傾向，機會主義，實行派社會主義（只努力於立可施行實際的改良）和修正主義。曾竭力的打擊社會主義的參加政府主義（密勒昂主義）。到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時，蓋斯德參加國防政府作了不管部屬員。

Gutenberg (Jean) 格當伯格，1397——1488年。印刷術發明者。

Heine (Henri) 海涅，1799——1856年。德國大詩人，生在德國死在巴黎。是馬克思的朋友。在一八三〇年革命開始時，他就跑到法國。

Helvetius 埃勒佛底，1715——1771年。法國哲學家。

Holbach 費爾巴區，1723——1789年。法國唯物哲學家。

Hugo (Victor) 雨果，1802——1885年。法國十九世紀最有權威的最傑出的詩人。在路易·崩納巴政變之後被逐出國，在外流亡了十八年。

Jaures (Jean) 若岩斯，1858——1914年。杜魯斯大學的哲學教授，社會主義者，他致力於馬克思主義與觀念主義的調和。是個法國社會主義最有力的領導者。他一般的總是處在運動的右翼。一九〇四年創辦“人道報”（即今天的共產黨機關報），他領導這個報紙直到臨死。他是現世最著名的演說家之一。他竭力的反對軍國主義和竭力宣傳人民軍隊的主張。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戰爭開始時被波蘭的國家主義者所暗殺。

Jeanned'Arc 貞德，1412——1431年。法國民間的女英雄，她領導着反英國佔領軍的戰鬥。後為法奸出賣給英軍活活的被燒死了。

Kant (Emmanuel) 康德，1724——1804年。德國哲學家。

Jugelmann (Ludwig) 顧惹滿，馬克思的忠實友人。

La Bruyere (Jean de) 1645—1696年。批評世風的著作家。“特性”一書的作者。

Lafargue, (Paul) 拉伐格。1842—1911年。馬克思的女婿，是法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傑出的宣傳家。國際工人協會的會員，曾積極的參加巴黎公社活動。同蓋斯德一道組織法國工黨。

La Fontaine 1621—1695年。法國最著名的寓言家。

Lamendin (Arthur) 拉芒丹，1825—1920年。礦工，巴斯·德·加萊礦工工會總書記和組織者。里埃宛選出的下議院議員。

Leibniz 李卜尼茲，1646—1716年。德國哲學家。

Lessing 李星，1729—1781年。德國詩人。

Lebknecht (Karl) 李卜克內西，1871—1919年。唯喲姆。李卜克內西的兒子。從一九一四年大戰起，他就反對社會民主黨國會中黨團（一百一十個議員）的擁護國防政府。因為他的國際主義的活動被判處兩年勞役。他領導一九一九年柏林的起義。同盧森堡在同時（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被反動者所殺害。

Luxemborg (Rosa) 盧森堡，1870—1919年。德國、波蘭和俄國工人運動的女戰士。她不停的打擊修正主義，同俄國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布爾塞維克）合作。被捕在獄中，她用Junius這個筆名寫了一本“社會黨的危機”，這本書指出第二國際的衰亡和創立第三國際的必要。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被害。

Marat (Jean-Paul) 馬拉，1743—1793年。他是個偉大的革命家，貧民的保衛者。他的報紙叫“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 在一七九三年被查錄特·高戴所暗殺。

Marx (Karl) 馬克思，1818—1883。生在德國的特萊烏城，死在倫敦。他同恩格斯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

Metternih，米特尼區，1773—1859年。奧地利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家。他一生致力於兩大工作：推翻拿破崙的統治和維持奧地利的威權。

Moliere (Teau-Baptiste) 莫里哀，1622—1673年。法國喜劇作家。

Montaigne 蒙戴涅，1533—1592年，法國名作家。

Nerval (Gerard) 奈瓦爾，1800—1855年。法國浪漫主義作家。

Pitt 皮特，1759—1805年。英國政治人物。在法國大革命時，他支持貴族和僧侶，封鎖法國海口，強奪法國殖民地，是個反法國戰爭的組織者。

Poincare (Raymond) 普安加萊，1860—1934年。法國政治人物。曾經幾度作總理和部長。在一九〇三到一九二〇年作過法國總統。

Pyrhus 比羅斯，紀元前316—272年。埃比爾 (Epire) 國王。在一次以重大犧牲打敗羅馬之後，他對慶賀他的將軍們說：『再來一次這樣的勝利，我就完了。』『一個比羅斯的勝利』（得不償失的勝利）就出典於此。

Renaudel (Pierre) 厄諾代爾，1871—1935年。在若岩斯死後，他主持人道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將結束時才由加善代替。一九一四年被瓦爾地方人民選為下議院議員。在一九三三年離去社會黨，組織「新社會黨」。

Richelieu 李斯里厄，1585—1642年。紅衣主教和法國政治人物，他打敗了四面包圍法國的奧地利王室。

Rolland (Romain) 羅曼羅蘭，1866—1944年。法國現代第一個作家。曾獲諾貝爾獎金。

Rouget (De Lisle) 盧熱特，1760—1839年，工兵隊軍官，“馬賽曲”作者，這個革命的歌曲是法國人民在攻打高伯蘭茲流亡者後代時唱着。

Schiller 席勒，1759——1805年。德國詩人，立憲會議舉他作法國的公民。

Voltaire 伏爾泰，1694——1778年。法國著名作家和哲學家，自由思想家。他的作品給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巨大的影響。

Zetkin (Clara) 蔡特金，1857——1934年。德國女革命家。她是巴黎大學學生，積極的參加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一九二〇年，被選為德國國會議員，她曾組織共產主義派。曾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參加法國社會黨在都爾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

Zola (Emile) 左拉，1840——1902年。法國偉大小說家。自然主義學派的領袖。他曾積極的領導要求修改德萊夫斯案件判決的運動。